新建設

第五卷 第二期

學習「毛澤東選集」特輯

慶祝「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　陶孟和

創造的馬列主義底傑出典範　沈志遠

讀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林礪儒

讀「井岡山的鬥爭」　劉桂五

讀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後　楊榮國

「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讀後記　金克木

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偉大成就　李琪

三十四年來蘇聯歷史科學的發展　朱慶永

人民經濟的利潤形態　許滌新

學習斯大林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　王南

關於漢字改革問題的提法　迭肯

蘇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產物　蘇·A·米丁著　郭從周譯

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馬克思著　季美林、曹葆華譯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

專著

學習毛澤東思想

慶祝「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陶孟和（一）
創造的馬列主義底傑出典範……沈志遠（三）
讀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林礪儒（九）
讀「井岡山的鬥爭」……劉桂五（一〇）
讀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後……楊榮國（一一）
「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讀後記……金克木（一三）
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偉大成就……李　琪（一六）
三十四年來蘇聯歷史科學的發展……朱慶永（二一）
人民經濟的利潤形態……許滌新（二六）
馬克思的「資本論」爲什麼從商品分析開始……劉及辰（三三）
學習斯大林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王　南（三五）
關於漢字改革問題的提法……迭　肯（三九）

譯文

蘇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產物（特稿）……蘇·A·米丁著 郭從周譯（四四）

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原著 季羨林、曹葆華譯（四六）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戰爭和軍隊的理論（續）……蘇・赫里斯多夫著 曹汀譯（四九）

書評

評莫爾頓著「英國史」……蘇・車爾涅也夫著 張蓉初譯（五三）

評「中蘇外交史」……林之樵（五八）

學術論文提要

「毛澤東選集」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最完全的典型（鄭昌）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王亞南）
怎樣學習祖國歷史（尹達）
孔子思想的進步性及其限度（嵇文甫）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對於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П・尤金著、秋江、列岳譯）
論中國自然科學的歷史命運（華崗）
論科學的特點（康士坦丁諾夫著、龔育之譯）
無神論（Ф・奧列楚克著、韓靈銳譯）
新中國貨幣制度之史的發展（陳元燮）
勞資兩利與階級鬥爭（施復亮）
蘇聯文學中的愛國主義（彭慧）
中國歌謠中所表現的醒覺意識（鍾敬文）（六〇）
論「阿Q正傳」（馮雪峯）
我對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認識（董純才）
美術工作與提高技術問題（江豐）

國外期刊重要學術論文介紹……（六四）

學術簡訊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蘇聯紀念「鬥爭報」創刊五十年——莫斯科文化科學界紀念魯迅逝世十五週年——蘇聯新書介紹

學習毛澤東思想

慶祝「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

陶孟和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二日，將永遠成爲歷史上一個最可紀念的日子。在這一天，出現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光榮的事件——一位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半生以來主要的言論，由一個委員會彙集在一起，作了縝密的註釋編訂，又經過作者本人的校閱，第一次與世相見了。

我們對於這個重大光榮事件——「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出版——應該熱烈地歡迎和慶賀。

「毛澤東選集」出版的重要性，首先因爲作者是一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作者半生以來堅持不懈的奮鬥曾經完成了許多驚人的、劃時代的、極端艱鉅的任務。他扭轉了自己同胞五萬萬人的運命，使他們脫離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桎梏。他的偉大的功績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大大地增强了他們爭取獨立解放的意志。他已經成就的和他現在所進行的都正在轉變整個世界過去的趨勢，繼續鞏固並加强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不用說，這樣一個傑出人物的寫作，絕不會是普通、泛泛的文章。他的每篇著作，必然與近三十年來的歷史變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的。

「毛澤東選集」裏的著作與近三十年歷史間的關係，不可能是浮泛的或皮相的，因爲其中任何一篇都是與實際，與某種情況、某椿事件、或某個問題，親密地、切要地相結合的。應該指出：它不單是對於某種情況、事件或問題作出一個科學的分析或寫成一個周密詳盡的說明，同時它還更進一步，根據所分析的或所說明的，指出應該如何行動，應該如何應付那個情況，如何處理那個事件，如何解決那個問題。這就是說，這些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至可寶貴的文章並沒有停留在理論探討或學術討論的階段，而進到高一級的水平，它指示了行動和革命的正確方向。因此，這些文章，無論所指示的是什麼，或是中國革命的途徑，或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或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或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不但是緊要關頭的文章，而且還解決了當時某個緊要關頭的事件。這些文章都曾發生過扭正革命方向、旋乾轉坤的巨大作用。用一個譬喻來說，「毛澤東選集」裏的文章，都是「有的放矢」的。而且每放一矢，都能射中要害，眞所謂百發百中，所以，它能有効地達到預定的目標。

毛澤東主席所以能有這樣偉大的觀察力與見解，並且將它們發爲言論文章，主要地當然是因爲他是一個最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靈活地、巧妙地應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以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各方面。而對於這個問題，他確乎已經勝利地解決了。因爲他是一個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以他既是一個思想家，又是一個革命行動者；既是一個文學作家，又是一個革命領袖。因此，他的思想與他的行動，他的言論文章與他的革命工作是不能分開的。「實踐論」的最末一節裏這樣說：

「通過實踐而發現眞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眞理和發展眞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

作者自己便是最忠實地實踐這一段話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必須指出：毛澤東主席並非單純地作爲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的貢獻遠在這個之上。他爲解放中國人民、爲抵抗日寇侵略、爲發揮中國人民力量以保衛和平，誠然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可是他所面臨的環境，他

所遭遇的情況，他不得不去處理或解決的問題常是非常困難的、極端嚴重的，而且完全是嶄新的，沒有前例可循的。他是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他的同胞對於幾千年封建制度的壓迫，一世紀以上帝國主義的剝削，進行一番翻天覆地的鬥爭。因此，他對於每個情況或問題絕不是機械地、因襲地採用死板板的公式教條，求得解決，而是正如「實踐論」所說的，能動地發展理性認識、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於是他的言論文章都指示人們具有高度創造性的認識與實踐，構成了今日大家所學習的「毛澤東思想」。他不是一個單純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因爲他是偉大的中國民族一個空前優秀、空前偉大的兒子。在他的背後，曾經出現過四千餘年世界無比的光輝燦爛的歷史。他承襲了這個歷史所遺留下來的高貴的文化的精華。因此，在他發展他的革命理論被實踐的時候，無可疑的，他必然吸取了、保存了中國文化精華裏最可珍貴的成分。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主席、作爲中國民族一個空前優秀空前偉大的兒子、對於中國革命研究與實踐的成果。這個成果已經大大地發展、並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然而，它本身依然是典型的、毛澤東主席的天才的產物。而且他自己對於這個產物，還正在繼續發展着。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所刊出的，都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年的著作。在今日——在中國革命的發展一切均正如作者所規測的、所指示的、所預料的實現的今日——讀這些十五年乃至二十五年以前的文章，更不得不增加我們對於作者天才的智慧的敬仰。他的觀察如此地正確，知識如此地廣博，思想如此地周密，見識如此地宏遠，指示如此地明確而有效，我們對於這樣的偉大天才只有衷心地折服感歎，努力向他學習，跟着他走。最後，我們不得不提到他那吸引人的文字表達的能力。他的謹嚴、簡潔而生動的文體，表示他是一個偉大而聰明可愛的人格。「毛澤東選集」不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裏的一部傑出著作，同時它也是中國人民文學裏的一部傑出著作，將已經有過偉大發展的中國文學更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毛澤東選集」不單是我們中國人民的，並且也是全世界爭取獨立自由的人民的經典。它的主題，雖然是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然而，它的分析，它的指示在在足以供一切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爲獨立、民主、和平而鬥爭的人民的採用。我們爲這個有全世界重要性的偉大作品的出版而感到驕傲。

這部系統編訂的、詳細註釋的「毛澤東選集」的出現，使每個人可以得到一個更好的、更方便的課本，一定要大大地加強並促進現在已經普遍而且熱烈的毛澤東思想的學習。關於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應該順便地指出兩點。第一，毛澤東思想不單是理論，也不是教條，它包含着行動的指南。因此，我們所研讀的，不是呆板的格言，而是生動的、與實際攸關的訓諭。我們不能僅以能背誦毛澤東主席的文章爲滿足。我們必須能夠時時用他的話緊密地聯繫到我們自己的思想行動，以省察自己，以執行我們自己的任務。第二，毛澤東主席是中國新社會科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指示了我們研究社會現象的方法，建立社會制度組織的理論，進行社會革命、社會改造的策略。他是一位眞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科學家。在我們正在建立新社會科學的今天，中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加倍努力地鑽研「毛澤東選集」，向這位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社會科學大師學習，以推進我國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

創造的馬列主義底傑出典範

——爲慶祝「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出版而作

沈志遠

一

全國渴盼已久的「毛澤東選集」，其第一卷已於十月十二日正式出版並在全國開始發行了。這是中國人民思想和政治生活上的一件大事，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發展史中的一件大事，是值得每一個人歡欣鼓舞的。

「毛澤東選集」的出版，對於我們中國人民爲什麼是特別值得熱烈慶祝

呢？那是因爲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底暴政壓迫之下獲得解放，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底勝利，是在毛澤東思想底指導之下達到的；而「毛澤東選集」正是這種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底結晶產物，是勝利的中國人民革命底思想武庫。過去中國人民曾在黑暗反動統治底重重壓迫與極不自由、極端艱苦的條件之下使用了這一思想武庫裏的武器，却已使中國革命獲得了這樣偉大的勝利。今天我們是在自己做了國家主人翁、享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條件之下來使用和學習使用這種思想武器，那末我們將在世界持久和平的事業上，在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及其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事業上，創造更加偉大的勝利，是可以確信無疑的。

應當着重指出，中國人民革命底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佔全球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中的勝利，而這個國家底情況具有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頗不相同的種種特點，因此指導這個國家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不能光是一般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而必須是與這個國家底特殊條件、與這個國家底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與中國革命底具體實踐相結合、並且勝利地解決了中國革命實踐所提出來的一切基本問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便是結晶於「毛澤東選集」中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正如陳伯達同志在其「論毛澤東思想」一書中所說，中國人民革命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的另一種典型的大革命。這一革命所以是另一種典型，乃因它發生在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國家內，而這一典型的大革命在思想上理論上的集中表現，便是搜集在「毛澤東選集」內的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各個時期所作的一切重要著作。

應當認定，毛澤東思想是列寧所稱爲創造的馬克思主義（同時也是創造的列寧主義）底傑出典範。毛主席從來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導師們底字句當作教條來崇奉，可是他却能最嚴格地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底立場、觀點、方法，最忠誠地遵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底精神實質，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底一般指導原理非常精練地應用於中國革命底具體實踐而達到了偉大的成就。因此，毛主席無疑地是列寧、斯大林以來世界上最傑出的一位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巨匠。

與教條主義者相反，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傑出代表毛澤東同志是澈底地體會和實踐了列寧、斯大林底下列偉大指示：

「我們並不把馬克思底理論視爲一成不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巧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爲一個科學奠定了基礎，而社會主義者若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個科學向前推進。」（列寧語，轉錄「列寧主義問題」第九三六頁）

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底「結束語」裏寫道：

「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善於拿革命運動底新經驗來豐富它，要善於拿新原理和新結論來豐富它，要善於發展它和推進它，……」

毛主席底著作完全證明他並不把馬克思、列寧底理論視爲一成不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證明他是最善於拿中國革命運動底新經驗、新原理和新結論去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是最善於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底精神實質，結合中國革命實踐諸問題，來獨立地、創造地發展馬克思、列寧底理論，並且從各方面——從建立新民主主義革命底理論體系方面，從革命民主統一戰綫底策略思想方面，從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由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及達到全國革命勝利的戰略路綫方面，從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人民革命戰爭底全部軍事思想方面，從布爾塞維克化的黨的建設原理方面，從辯證法唯物論方面特別是認識論方面，以及從爲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思想等等方面——都把這一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向前推進了。這正如毛主席自己所說，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矢」來射中國革命之「的」。

二

在這篇文章裏，我們只想簡單地闡明一下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所發揮的毛主席對於中國革命一、二個有決定意義的問題的見解和主張，藉以證明毛主席底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底高深造詣及其豐富與發展這種科學理論的傑出天才。

我們要談的，一個是人民民主革命中的統一戰綫問題。

誰也不能否認，三十年來中國革命底發展，是和中國人民底革命民主統一戰綫底發展分不開的。革命的統一戰綫正確地建立起來了、壯大了、發展了，革命就節節走向勝利；相反，當這個統一戰綫由於革命領導方針的錯誤而削弱了、縮小了或分裂了，革命就遭受挫折。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底經驗，是最雄辯的證明。毛主席正是早在這一時期（他的重視農民底革命力量，認定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底中心問題，甚至更早），正是在這個對革命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表現了他布爾塞維克的澈底正確性和馬克思列寧

主義的偉大創造性。

大家知道，關於革命統一戰綫的理論，主要地包括三個問題：工人階級底領導權問題，與農民聯盟的問題，對待資產階級的態度（或對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估計）問題。

一九五〇年俄國革命中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底基本政治分歧，也就在這些問題上。列寧底重要文獻之一「兩個策略」，就是說明這兩條政治路綫底分歧點並向孟塞維克底機會主義路綫作猛烈進攻的戰鬥文獻。以列寧爲首的布爾塞維克派主張工人階級應當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爭取領導權，應當與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應當積極爭取和參加革命民主政權，從而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孟塞維克派則認爲革命既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性質，則革命底領導權應讓給資產階級，工人階級不應與農民接近，而應與自由資產階級接近，也不要爭取參加革命民主政權，以免嚇退（！）資產階級而使革命力量削弱。

類似的兩條政治策略路綫底鬥爭也發生在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先鋒隊內。堅持孟塞維克路綫的，是當時黨的領導——右傾機會主義的陳獨秀派。他們認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民主革命底前途就是讓資產階級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與權利」。陳獨秀根本不認識廣大農民是無產階級底可靠的、主要的、天然的同盟軍，因而他不但不去堅決支持當時蓬勃發展中的農民運動，反而做着反動派底應聲蟲，大埋怨其農民運動「過火」，甚至採取抑制農民運動的卑劣手段，企圖夢想討好和穩定國民黨中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分子，使他們不離開革命陣營，以便「挽救革命」。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眞是十足的向資產階級的投降路綫。因此，陳獨秀派當然也就完全看不見、甚至根本不會夢想到人民民主共和國及由此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這種民主革命底光明前途了。

另一方面，以張國燾爲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則根本反對與國民黨合作，忽視農民底革命作用，認爲只有工人階級能革命，只要搞工人運動就行。這是孤立自己、助長敵人的路綫。這派底主張表面雖似與陳獨秀派相反，兩者底實質却是一致的：反對以毛主席爲代表的布爾塞維克路綫，不要革命的統一戰綫，把革命底領導權雙手奉送給資產階級、地主集團。

正確建立和澈底堅持中國革命底布爾塞維克路綫的，是毛澤東同志。黨底第三次代表大會雖然拒絕了右、「左」兩派機會主義的主張，實行了國共合作，建立了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綫，因而促成了大革命的爆發，但是對於一系列革命成敗的關鍵問題——在這個統一戰綫中，領導者應該是那一個階級，是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底主要同盟軍是誰，是農民羣衆還是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應取怎樣的態度？怎樣認識這一革命底前途，是人民共和國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對於這一切革命底基本問題，當時以陳獨秀爲首的黨底領導，是完全持着錯誤立場的。

從一九二五年夏到一九二七年春，革命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內如火燎原地發展起來，而陳獨秀却對所有這一切革命成敗的關鍵問題是黑漆一團，這是中國革命底第一個緊急關頭。正在這樣一個緊急關頭，毛主席表現了他作爲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舵手底偉大天才：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及以後幾篇有關著作中，充分表現了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傑出創造性和布爾塞維主義的澈底正確性。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是近代中國革命史中第一次用澈底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方法來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底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及奠定革命統一戰綫之理論基礎的偉大嘗試。這是一次非常正確、非常成功的嘗試。這個著作底目的，是要解決一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即分辨誰是革命底敵人，誰是革命底朋友，從而「注意團結我們的眞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眞正的敵人」（「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三頁），換句話說，也就是要解決革命統一戰綫的問題。

爲了解決這一革命底首要問題，毛主席嚴格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學說和科學思想方法，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底具體情況作了科學的分析。他明確地指出：「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第一卷，第三頁）因而他們是「極端的反革命派。」更重要的是毛主席非常精確地說明了中國資產階級不同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的種種特點。依照毛主席的分析，當時中國資產階級底一個特點是它有兩個類型：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另外一個有更大實踐意義的特點是民族資產階級具有革命和妥協的二重性（或兩面性）：他們依據自身的階級利益，有時需要革命，贊助革命，有時又懷疑革命，害怕革命。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底這種特有的二重性和軟弱性，就決定了他們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和領導革命的不可能性。至於這個階級抱着一種如毛主席所說的「實現民族資產階級國家」（按即如陳獨秀所憧憬的「資產階級共和

國」）的企圖，那毛主席斷定是「完全行不通的」，這種思想「僅僅是一個幻想。」（以上引語均見第一卷，第四、五頁）

接着毛主席又深刻而具體地分析了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底情況和特點。他指出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有右、中、左三派，大體說來他們都可以參加革命的。以貧苦農民爲主體的半無產階級則是革命底可靠同盟軍。工業無產階級則由於他們比之其他任何階級是最集中的，兩手空空沒有任何生產手段的，以及經濟地位惡劣而受着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底三重壓迫，所以他們是中國最進步、最富有戰鬥性的階級，是革命底領導力量。

毛主席依據以上的科學分析而得出結論說：「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按毛主席在這裏是指民族資產階級——沈），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綫」。（第九頁）「這樣，——正如胡喬木同志所說，——毛澤東同志就既反對了陳獨秀的只看見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而看不見農民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反對了張國燾的只看見工人而看不見農民的「左」傾機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第十五頁）

關於農民問題，特別是關於工農聯盟的問題，關於農民是工人在革命統一戰綫中的主要同盟軍的問題，毛主席是最早給予肯定解決的一個人。他早在一九二四年底就着手研究湖南的農村狀況，並領導農民的革命鬥爭。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毛主席又在廣東主持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努力於農村革命幹部的訓練。一九二七年三月，正當湖南農民運動猛烈發展，黨內外響起一片反對聲和「過火」聲之時，毛主席發表了他的另一傑出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痛斥了黨內外一切懷疑農民、指責農民的議論，指出反對農民運動的見解是反革命的。他堅決主張放手發動羣衆、組織羣衆和依靠羣衆。報告充分估計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建立了工農聯盟底理論基礎。毛主席底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反對地主的反封建鬥爭底布爾塞維克策略思想，也早在此時已經樹立起來。同時他還提出了建立農民政權和組織農民革命武裝之必要等偉大的創造性主張。

綜上所述，可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體現中共黨內布爾塞維克路綫的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底經典文獻。在這兩個文獻中，毛主席底傑出的創造天才是表現得極其深刻而且豐富的。這主主要地表現於下列幾點：

第一，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準對中國社會底特殊情況，特別是依據中國革命底獨立經驗和他自已獨立的思考能力，確定了中國民主革命中布爾塞維克的統一戰綫基本方針，即以無產階級爲領導、以廣大農民爲同盟軍、聯合小資產階級、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又團結又鬥爭的統一戰綫方針。這裏有一個事實是特別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列寧、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關於工農聯盟、關於中國資產階級底軟弱性等等思想的著作，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還很少傳到中國來，即或有之，亦因被當時的機會主義者有意無意地阻撓其在黨內傳播，並因文字的條件和反革命的阻隔，致使毛主席及許多革命同志都不能有系統地閱讀列寧、斯大林底有關著作；斯大林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所作的一些指導中國革命的重要文獻，如「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一九二七年）等著作，根本還沒有來得及送入中國境內來，而毛主席却已在差不多同一時候，通過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兩種著作，依據中國革命底獨立經驗和運用自已的獨立思考，做出結論，完全與列寧、斯大林的原則相符合，而規定了切合中國實際的具體內容。這完全證明了毛主席底傑出的創造智慧和偉大的勇敢氣魄。

其次，與規定這種布爾塞維克的統一戰綫底政策方針同時，毛主席在這兩篇著作中又形成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底根本思想，後來毛主席便依據這一根本思想而把由這一革命所建立的革命政權，稱之爲「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種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告形成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底根本思想，及以後發展到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理論，又是毛主席對列寧、斯大林關於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學說的發展和豐富化。

第三，毛主席底統一戰綫思想和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底基本原理和方針，歸根結底又是以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底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分析爲根據的。毛主席是第一次對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底社會階級構成和階級諸關係作了具體的科學分析的人；特別是他對中國農民階級的分析，對農民底革命作用的極端重視，以及他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底兩面性及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方針的規定，這證明毛主席是創造地豐富了和發

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理論。

三

前面我們簡單地說明了毛主席關於中國革命底決定關鍵之一——統一戰綫問題——底根本思想。以下我們要來談一談毛主席關於另一個有決定意義的關鍵問題之布爾塞維克的偉大創見，那就是革命根據地和武裝鬥爭的問題。正如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軍事著作中所說：「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覆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底具體革命實踐對於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新問題；對於這個完全新的、並且異常複雜的問題，毛主席根據中國革命底具體情況和獨立經驗，運用他的非凡智慧以進行獨立思考，給予了澈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決。毛主席的依靠工農革命武裝、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由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達到全國的革命勝利的革命路綫，是一個更偉大的創造，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實庫中的新的光輝貢獻。這種新貢獻底代表作，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內，就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重要著作。（均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毛主席根據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國內革命與反革命底階級力量對比，根據當時中國經濟和政治底特殊情況及革命形勢底戰略策略的要求等等，得出了組織革命武裝和建立革命根據地之必要與可能、及從小塊農村根據地發展到全國革命勝利之可能與必然的有革命決定意義的結論。

爲什麼建立革命根據地與組織革命武裝鬥爭是有必要呢？那是因爲在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國內革命與反革命力量對比是大大地不利於革命方面，反革命力量（首先是帝國主義的力量）大大地超過了革命的力量。正如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五月間所說：「中國革命的敵人太多，太强，內有張作霖、蔣介石、大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等等，外有帝國主義者。」（「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同時，革命戰爭的失敗，使革命隊伍遭受了極嚴重的損失：在全國範圍內，黨的很多優秀領袖、大批革命的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遭到了殘酷的屠殺；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者都紛紛脫離了革命。在這樣的反革命力量大大超過革命力量的形勢面前，爲了繼續進行革命鬥爭，就必須培養革命力量；爲了保存、積蓄和鍛鍊革命力量，黨就必須採取革命的戰略防禦，必須實行必要的退却，特別是必須將革命的工作重心從敵人力量比較强大的城市轉移到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農村裏去。因此，在農村中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任務就發生了。同時，爲了保衛革命根據地、保衛紅色政權，武裝鬥爭底必要也發生了。而且，這樣的革命鬥爭必然是長期性的，極殘酷的。

當時陳獨秀等已開始墮落爲反革命的取消派，他們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由資產階級底勝利而結束，中國無產階級應當放棄革命鬥爭，轉入合法運動。以毛主席爲代表的中國布爾塞維克派則與陳獨秀派持完全相反的見解，實行完全相反的路綫：假使說陳獨秀派底見解是對革命形勢和革命發展前途完全黑漆一團，因而採取了乾脆取消革命的叛徒路綫，那末布爾塞維克的毛澤東路綫就是建立農村根據地、組織工農武裝、向人民指出繼續革命鬥爭的必要、以及由農村根據地包圍城市、奪取城市、以走向全國革命勝利的革命路綫。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確地指出，必須建立革命根據地，那怕開始只是一些小塊的地區，只要堅持下去，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羣衆的信仰，如蘇俄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眞正地創造紅軍，成爲將來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第一卷，第一〇四頁）毛主席底這一偉大預見，完全被後來革命發展的事實所證實了。

然而當陳獨秀派澈底破產、墮落爲公開反革命，革命形勢轉入顯然低潮的時候，革命陣營內部的主要危險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却是「左」傾盲動主義了。盲動主義者根本不承認革命底失敗，無視革命與反革命力量對比底不利形勢，不懂得布爾塞維克的戰略防禦及暫時退却、積蓄力量、以備再起的策略方針，根本否認中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否認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同時他們又根本沒有認識革命底長期性，以爲革命是能够速勝的。於是盲動主義者就採取了向大城市進攻的冒險政策，結果使革命精銳力量遭受了更嚴重的損失。

準對着這一革命底主要危險，毛主席就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間寫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特別是「中國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兩篇，來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左」傾急性病的盲動主義思想，宣揚實事求是的布爾塞維克主義路綫。

毛主席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堅貞不屈地爲這條正確路綫而艱苦奮

門。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後，毛主席曾率領一支新成立的工農革命軍退到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崗山地區，在那裏成立了湘贛邊區工農民主政府，並且開始領導農民分配土地；後來又與南昌起義部隊相會合，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與敵人進行多次勝利的鬥爭之後，以井崗山爲中心的革命根據地就逐步擴大和鞏固起來了。一九二九年又向贛南閩西發展，終於成立了以瑞金爲中心的廣大的「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這些紅色軍隊和紅色政權的建立，「成了蔣介石反革命統治的重大威脅和全國勞動人民的最大希望。」（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

毛主席對於建立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不但根據客觀形勢底要求和革命主觀方面底需要，得出有這樣做的必要的結論來，而且他還非常精練地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從矛盾的觀點、全面聯系的觀點和由量變到質變的觀點，天才地論證了堅持和發展革命戰爭和革命根據地有達到勝利的充分可能性與必然性。以下就是毛主席運用唯物辯證法於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經典文章：

「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微弱的資本主義與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近乎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與停頓在中世紀式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幾百萬產業工人與幾萬萬舊制度下的農民同時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軍閥與管理各省的小軍閥同時存在，正規軍隊與雜牌軍隊同時存在，若干的鐵路航路汽車路與普遍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脚走的路與用脚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的不統一，影響到中國統治集團間的不統一。數國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和一國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區別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

中國經過了一次大革命——準備好了紅軍的種子，準備好了紅軍的領導者即共產黨，又準備好了參加過革命的民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八七頁）

這裏，毛主席對於中國經濟政治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即發展的不平衡）作了精闢的分析，對於革命底主觀和客觀各種條件作了全面的（亦即從聯系中）觀察，從而得出了堅持革命根據地、進行革命戰爭之勝利的可能與必然的結論。早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毛主席就在「中國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够存在？」這一篇成爲革命繼續發展之引路燈的經典文獻裏，亦已作了同樣精闢的分析。毛主席在分析中指出紅色政權能够長期存在的主要條件有五個：一、地方性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和剝削政策，這造成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分裂和戰爭，使若干小塊的紅色區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發生和堅持下去；二、紅色政權存在的地區，是受過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革命戰爭洗禮的地區，這些地區的工農羣衆受過了強烈的革命影響，有革命鬥爭的覺悟，能積極支持紅色政權；三、全國革命形勢的繼續發展，有利於紅色政權的長期存在；四、工農紅軍的存在和發展；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政策的正確。（參閱第一卷，第五三——五四頁）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主席與當時黨內一部分抱悲觀情緒的分子截然不同，他充滿着革命的信心，抱着典型布爾塞維克的堅定性而寫道：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爲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來看，便大大不然。這裏用得着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裏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以後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看事情必須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嚮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第一〇五頁）

以上兩段文章，又充分表明毛主席不僅是一位有偉大氣魄和遠見的革命導師，而且同時是一位傑出的辯證法家。他對紅色政權所以能够存在的五個條件的分析，表明他不但善於掌握中國經濟和政治形勢中的矛盾、分析矛盾和運用矛盾，而且又善於對當時經濟、政治、軍事及革命底主觀客觀諸因素作全面聯繫、相互制約的觀察。在後一段文章（及其他重要軍事著作）中，充分表明毛主席是何等精練地掌握了由量變到質變、把希望寄託於新生的、微小的、但是有發展前途的東西這一辯證法原則。由於毛主席是這樣一位傑出的唯物辯證法家所以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三十年中，始終是持着正確的革命路綫的。

毛主席之偉大，簡單地說，就在他是永遠正確的。毛澤東——這是眞理底象徵，是勝利底旗幟。

爲了掌握眞理，保障勝利，我們大家必須認眞的學習「毛澤東選集」。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六日，上海旅次。

讀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林礪儒

我讀了這篇文獻之後，深深地體會到在階級社會裏人們認識事物，有一種很常見的情況，這就是：「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得出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與『好得很』是一例，『痞子』與『革命先鋒』又是一例。」這兩種是什麼相反的看法呢？一種是漢口長沙的紳士們的看法，是反革命的看法；又一種是革命的看法，是毛主席的看法。這兩種看法反映出兩種階級的立場，地主階級或資產階級的立場與無產階級的立場。是不是眞理原來就有兩種呢？不是，決不是！客觀的眞理只有一種，只看誰人看得眞切罷了。

「農民有了組織，便行動起來。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爲劣紳土豪、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思想制度，城裏的貪官汚吏、鄉村的惡劣習慣。」他們「眞是說得出，做得到……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停止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這是當時的事實。可是這個事實反映到紳士們的耳目，便是「糟得很」；「很革命」的人和「很進步」的人們也都無法完全否認這個「糟」字。惟有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看見這個事實，便能夠立刻認識到這乃是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推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都做到了。這是「好得很」。眞理當然是在這一面，無疑是「好得很」。可是只有堅定地站在農民一邊，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纔能看明白這眞理。紳士們就看不見，甚至於「很革命」「很進步」的人也看不見。甚麼東西障礙着他們的眼睛呢？是反動的統治階級的立場，其中主要的是地主階級的立場，

號稱很革命的人，「受了那班滿城風雨的『糟得很』派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情狀，也居然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這幾行文章活像一幅絕妙的寫生，把一班只從書本中接受了一些革命理論的知識分了寫得繪影繪聲，令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語。一些從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平時感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反動政權的壓迫，比較容易激發多少革命情緒，再從書本上學得一些革命議論，往往自信爲進步的革命的人士，而一經考驗，便很容易暴露「頭重脚輕根底淺」的原形。他們腦子裏滿裝着教條，所以頭重；立場依然在小資產階級，所以脚輕；一旦看見了革命的眞場面，便不覺間戰慄起來，動搖起來，表演「葉公好龍」的喜劇。這便說明了長久歲月養成的小資產階級意識，雖非不可改造，然而決不是慷慨激昂地發幾趟議論，「入乎耳出乎口」地讀幾本書，寫幾篇漂亮文章所能轉變的。唯一的辦法是堅決地和工農結合，追隨着革命隊伍去實踐。到今天，人民的政權已經建立起來，就給知識分子以自我改造的優越的環境，然而要得到改造的成功，也還要依靠知識分子自身的堅持不懈的實踐。

知識分子的大毛病是一向輕視工農大衆，更不屑向羣衆學習。而毛主席在這篇報告裏指出：「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只有一種人，就是貧農。從秘密時起，一直到公開時期，都是他們在那裏奮鬥，組織也是他們在那裏組織，革命也是他們在那裏革命。」更鄭重地指出：「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但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淸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匪患潛踪。有些地方眞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這樣說明了在革命洪流中，貧農的高貴的道德品質纔得新生，農村中的新紀律新秩序纔勃然興起。這種新道德新紀律的眞實性和嚴肅性，也不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所能想像得到的。事實證明了最革命的是貧農，最勇於改過自檢的、最堅決愛護公共紀律的又都是貧農，甚至改變貪汚縣長爲循良廉吏的，也是貧農爲中堅的農會，如果還硬要誹謗人家是「痞子」，便無法否認「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

知識分子還有一點毛病是沾沾自喜他們所有的那一點兒知識，因而孤立地尊重教育文化，認爲無上至實。而毛主席在報告中首先指出：中國歷來所謂教育文化都是地主剝削農民身上的血汗所造成的，只是地主們所有，而與農民不

相干，因而一向為農民所痛惡。可是「農村裏剝削階級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如今他們却大辦其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有些已經舉辦，有些正在籌備，平均每一個鄉農民協會有夜學一所。他們非常熱心開辦這種夜學，以為這樣的學校才眞正是他們自己的」。「農運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自然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千所學校在鄉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今天我們新中國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區，其教育景象正是如此，而毛主席早在二十四年前預告了我們。

原報告十四件大事之中，「文化運動」這一件原非佔全篇中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若從教育史的角度看來，這一段文章確是現代中國教育史的空前重要的文獻。中國的現代教育，一開始便被改良主義者利用來做廻避革命的幌子，從來沒有革命的氣味。要找尋破天荒的革命的教育，就是這一回湖南農會所創辦的農民學校。把這種農民學校和先後同時期的定縣平民教育，鄒平鄉村建設學院及曉莊師範的鄉村教育比較一下，便曉得那班教育家所自畫自讚的，其實是葉公子高所喜愛的「似龍」罷了。

一九五一、十、十九、於北京

讀「井岡山的鬥爭」

劉桂五

一九二七年四月到七月，蔣介石、汪精衛的國民黨反動派相繼叛賣革命，殘酷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中國共產黨不能不「將黨的組織一部分轉入反革命比較薄弱而革命比較有基礎的農村，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和游擊戰爭。」井岡山是毛主席親手創立起來的第一個農村的革命根據地，「井岡山的鬥爭」一文，就是毛主席在創立這個農村的革命根據地時總結出來的經驗。我們在這篇著作，中不但可以了解毛主席在那種艱苦環境中的鬥爭經過，並且可以學習毛主席分析問題的方法；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觀點來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方法。

毛主席首先根據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分析其基本矛盾，得到在農村可以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結論。他說：「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各個帝國主義國家都企圖在中國擴展勢力。都在指揮自己所支持的軍閥、官僚、買辦對另一派別進行混戰。在這個時期，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競爭日趨緊張，中國的混戰也日益增多。一九二七年九月，唐生智在武漢進行反對蔣介石南京政府的活動。南京政府下令「討伐」，派桂系軍閥李宗仁和在江西的軍閥朱培德等率兵進攻。唐生智失敗，退守湖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粵桂戰爭爆發，李宗仁在武漢站穩以後，繼續向湖南發展，企圖扶植唐生智餘部何健，打擊親近蔣介石的另一湘系軍閥魯滌平，這個活動遭到美國的新走狗蔣介石的嫉視，結果，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又爆發了蔣桂戰爭。此後，美國支持蔣介石進行「統一」運動，日本援助其他軍閥進行分裂運動，產生了連年不斷的內戰。在這種政治情況下，以井岡山為中心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才建立起來。

中國的特殊情況準備了建立農村的革命根據地的條件，並不是說隨地都可以建立起根據地來，它還需要其他方面的條件。正如毛主席所說：「還需具備下列的條件：（1）有很好的羣衆，（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够給養的經濟力」。這些條件都是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着中國人民努力爭取的，而首先領導人民促成這些條件的成熟的，不是別人，正是毛主席。毛主席在北伐戰爭以前，就在湖南從事農民運動，組織了好多農民協會，使農民們開始了解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北伐軍到達湖南，湖南農民運動蓬勃發展，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農民協會會員人數已有一百三十多萬，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增加到五百一十多萬。井岡山附近的茶陵、攸縣、酃縣等縣，都成立了縣農民協會或者是縣農民協會籌備處，攸縣有農會會員十萬以上，茶陵有五萬多，酃縣和桂東各有一萬多會員，這些會員因為受過革命的影響，覺悟程度相當高。從羣衆條件方面看，是有利於根據地的建立的。再說井岡山不但四面山峰環繞，地勢險要，山上還有一片平地，周

圍有十九個圩場(即集市)，中間有上井、中井、下井、大井和小井五個村莊，山周都是梯田，出產豐富，當地人民早就有武裝鬥爭的傳統，這時期井岡山有一支武裝，約有數百人，帶頭是洪幫首領王佐、袁文才，兩人一文一武，分工合作，王善於打仗，袁善於計謀。一九二六年九月，共產黨員龍超清（毛主席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到了井岡山，和袁文才發生聯繫，袁就參加了革命工作，在當地組織人民委員會，以龍超清爲委員長。到一九二七年，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工會、商會等都繼續成立，袁文才所領導的武裝也在逐漸擴展。從作戰地勢、經濟力量、武裝力量方面看，也是有利於根據地的建立的。所以毛主席在秋收起義以後，決定在羅霄山中段（即井岡山）建立軍隊和政權，毛主席率領着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到井岡山去。袁文才等聽說有人到井岡山來匯合，就派陳慕平（也是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出來迎接，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進入井岡山，在這裏建立了革命根據地。這是中國人民大革命中所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這是中國革命從城市轉到鄉村的轉折點，這是毛主席根據中國社會情況規定新戰鬥方針的具體實踐。

毛主席又提出如何鞏固根據地的問題。當時革命的敵人是强大的，它有全國性的政權，控制着全國政治經濟的樞紐，掌握着相當强大的武裝，還有世界帝國主義集團的支持。反之，革命力量是很小的，紅軍的數量很少，武器不够，給養也很缺乏。革命與反革命的力量既如此懸殊，毛主席就提出要「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要作好根據地的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等工作，其中尤以武裝問題爲最迫切，毛主席說：「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黨和羣衆不能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因此，毛主席在與朱德同志會師以後，就建立了紅軍一整套的軍政制度，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目的是使出身於工人、農民、和游民無產者的人變成有組織、有紀律、爲人民服務的革命軍隊。紅軍中的黨代表經常教育士兵：紅軍工作的目標是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是發動廣大勞苦羣衆向反動勢力作鬥爭，奪取政權，建立革命政權，每個士兵都要學習共產主義的知識，遵守紅軍紀律。紅軍士兵在黨代表的領導下，組織士兵委員會在這個會裏，士兵可發表意見。士兵經過這個會可以組織識字運動，文化娛樂活動，也可以管理厨房伙食和清算賬目，還可以向羣衆作宣傳工作。士兵們有任務可以在會裏動員，有錯誤可以在會裏批評，有問題也可以在會裏討論，這樣使官與兵之間，兵與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感情融洽，毫無隔閡。戰鬥力也因而增强。紅軍的黨代表制度和民主主義制度使紅軍變成一支有階級覺悟的不可戰勝的革命武裝力量。赤衞軍是地方武裝，是保衞地方革命政權，協助紅軍作戰的重要力量，所以，毛主席對赤衞軍也注意訓練。每個赤衞軍的隊員都要學習軍事知識，如駐軍、作戰的常識，士兵的技術，都是要學習的。赤衞軍既經常配合紅軍作戰，遵守紀律也是很重要的事，如赤衞軍的隊員必需絕對聽指揮，打土豪要歸公，不拿老百姓一點東西等。此外，赤衞軍也和紅軍一樣的受到政治教育，也可發動羣衆參加革命活動。因爲毛主席對赤衞隊的重視和注意訓練，赤衞隊在作戰時，特別在地主武裝進犯的時候，起了很大的作用，成爲紅軍的預備隊。

毛主席還根據中國特殊情況，創造了新戰略，使革命武裝掌握好這個戰略來進行戰鬥。在這篇文章中，他說：「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分裂時期，……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若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則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推進的」。他又說：「紅軍以集中爲原則，赤衞隊以分散爲原則。當此反動政權暫時穩定時期，敵人能集中大量兵力來打紅軍，紅軍分散是不利的。……赤衞隊則以分散爲有利，現在各縣赤衞隊都採取分裂作戰辦法」。這種戰略思想發展下去，就形成整套的革命游擊戰略，所謂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成爲全國革命戰爭致勝的法寶。毛主席所創立的革命武裝和所製定革命戰略，不但使根據地鞏固，而且使之擴展，跟着就有許多的革命根據地建立起來。

毛主席對於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其他重要問題，如土地革命問題，特別是如何爭取中間階級的問題；如政權建設問題，特別是如何重視工農兵代表會的權力問題，即如何推行民主制度的問題；如建黨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肅清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問題，也都作了非常明確的解釋和解決。

毛主席掌握住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點，準確地解決了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各個基本問題，所以，中國革命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逐步開展，先鞏固和擴展農村革命根據地，由農村來包圍城市，然後，配合城市革命工作，完全消滅反動政權，而有今天的勝利。這個勝利不是容易得到的，這是毛主席和團結在毛主席週圍的優秀幹部，分析並解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製定正確的工作路綫，克服黨內各式各樣的錯誤，領導中國人民打敗革命敵人，才得到這個勝利。我們珍視這個勝利，保衞這個勝利，更應該學習毛主席分析社會現象，解決基本問題的方法，把這方法應用到新中國的各種建設工作中去。

讀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後

楊榮國

毛主席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所寫的批判當時黨內的一種悲觀思想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這篇論著，我——這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讀了以後，有着下列的兩點體會：

第一：毛主席在這篇論文中，指出和批判了急性的毛病；這個，是我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所最容易犯的。我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遇事總是性急，——不論做什麼工作，總想馬上有所成就，馬上取得勝利，絲毫也不能耐性，這個是很不好的！對革命則更加有害！

因爲：

只是急性而不能耐性，於是便不能好好分析問題和處理問題。毛主席這樣說：當時黨內有一部分同志，他們之所以「沒有用這種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之所以只「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他們之所以具有這種錯誤的觀念，就是由於犯了急性病，而不肯對客觀社會作具體的分析，不肯從具體的分析中「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

只是急性而不能耐性，於是估量任何事情總容易從主觀主義出發，犯主觀主義的毛病。毛主席這樣說：「犯着急性病的同志們」，不是「把革命的主觀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便是「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後者所產生的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而前者「也要產生另一方面的壞結果」。

這個，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作品）中所駁斥的抗戰中的亡國論者與速勝論者，就是如此；前者就是把自己的主觀力量看小了，把敵人的力量看大了；而後者又與之恰恰相反；因之毛主席駁斥這兩者都不對，都犯了主觀主義的毛病，都是錯誤的！

同時，還有一點，只是對問題急於求解決而不能有所耐性，不肯詳加分析；這樣地來進行工作，自然容易受到挫折；而受到挫折以後，又不免悲觀失望；這，我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每每總是如此。毛主席這樣說：「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九年二月，約四個月期間內，敵人的第三次『會剿』臨到了井岡山的時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提出來」，就這樣悲觀失望；其實，若肯對問題作具體分析，「那時英、美、日在中國的鬥爭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蔣、桂、馮混戰的形勢業已形成，實質上是反革命潮流開始下落，革命潮流開始復興的時候」。怎的用得着悲觀呢？我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就是這樣，犯着急性的毛病，遇事只看表面，只看現象，而不觀察其實質，不肯對客觀的實質，加以科學的分析，所以容易這樣悲喜失常。這個是很不好的。這樣，就會對工作不利，對革命不利，我們要以此爲戒。

怎樣才是科學的分析方法，才不會爲表面現象所迷惑呢？毛主席在這裏作了更進一步的闡明，他這樣說：「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嚮導，一進了門，就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猶之乎我們當前的抗美援朝戰爭，在這抗美援朝的當中，美帝國主義因侵略失敗而向我們求和，接受和平談判的建議；這，固是我們所願，因爲我們抗美援朝的目的，就是爲了爭取遠東和世界的和平；如果美帝國主義對和平毫無誠意，而採取各種各樣的卑劣手段來威脅和平的談判，那，我們也不怕，我們自是毫無疑義地繼續援朝，繼續抵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因爲我們認清了美帝國主義的本質——它的實質是要侵略，於是不論它玩弄怎樣的花樣，擺怎樣的姿勢，我們對之既不怕，也不存任何的幻想。

其次，毛主席在這篇論文中還指示出：那衰亡着的東西，不論它一時的表面的力量尙如何大，但總歸是要衰亡的；可是，那發展着的東西，不論一時的力量尙如何小，但總歸是要發展的，所以他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來作比喻。

他首先從以往的革命事實來作分析：「它（指這點發展中的小小的力量，即星星之火）在中國的環境裏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

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以後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

接着說到當時：「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譁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他這一具體的分析，不僅是鼓舞了當時一部分悲觀失望的同志，給他們打了不少的氣；同時，也給予我們一個明確的認識，使我們認識到：

第一，這發展着的東西，不論它一時的力量還顯得如何小，還不時地遭受着各種各樣的打擊，但我們要堅定其信念，這發展着的東西，從我們百折不撓的努力中，一定要發展、要成長起來的。

第二，我們看問題，不要抓住一點來作孤立的看，要從發展中來看，要善於對發展中的社會歷史作具體分析，我們才既不致爲一時的表面的現象所迷惑，同時還可把握住這社會發展的動向。

第三，由於我們握住了這一前進的方向，我們就可明白而肯定地指示出來，如毛主席那時所指出的，說這一前進的方向，並非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而它，正「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這樣指示出來，堅定了一般人的信念，使大家都能向着這一個理想的目標百折不撓地奮勇邁進。

「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讀後記

金克木

「毛澤東選集」出版了以後，使我們接觸了毛澤東思想的寶庫，多了解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過程和其中的指導思想。這樣就使我們能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增强革命信心。由於理論認識的淺薄和實踐經驗的缺乏，我對選集中的許多篇文章，還是鑽研得不够，理解得很淺。現在只想就其中的一篇，「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寫下一點粗淺的體會。這當然只能算是開始學習的讀書筆記。

首先我感覺到，這篇文章通篇貫串着堅決相信羣衆，相信革命事業就是廣大羣衆事業，這樣一種思想。毛主席說：「眞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羣衆，是千百萬眞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羣衆。這是眞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却要打破反革命。」這樣的羣衆觀點就是我們要學習的。歷史已經證明毛主席的話是顚撲不破的眞理。

這樣的堅決相信羣衆，依靠羣衆，爲廣大人民羣衆服務的思想，「一刻也不脫離羣衆，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而不是從自己集團或自己個人的利益出發」（註一）的思想，就是進行一切革命工作的出發點。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第一〇九頁）中也敎導我們要「熱愛人民羣衆，細心地傾聽羣衆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裏的羣衆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羣衆之上，而是結合於羣衆之中。」這就是羣衆路線的工作方法。

有一種走羣衆路線的方法，就是多召集會議，多向羣衆徵詢意見，多要求羣衆負責，一切任務交給羣衆去執行；但是自己却不和羣衆打成一片，對羣衆的生活上的問題，工作上的問題，思想上的問題，一概不管；對羣衆只要求他們提意見，做工作，完成任務，而不認眞處理他們的意見，不關心他們的工作情形，不研究並幫助他們完成任務。

這樣，不關心羣衆的實際問題，只關心自己的任務問題，其結果就是羣衆很難動員起來，任務也很難完成。

這是沒有實質只有形式的羣衆路線。

毛主席告訴我們的不是這樣。他說：

「如果我們單單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一點別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呢？當然不能。……一切羣衆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他指出汀州市工農代表因爲大會「完全不理羣衆生活，後來就不高興到會了，會議也召集不成了。」

他又說：

「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實現任務的方法。……不解決方法問

題，任務也只是譜說一頓。……一切工作，如果僅僅提出任務，而不注意實行時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對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實際具體的工作方法，不拋棄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麼任務也是不能實現的。……像興國與贛東北的同志們，他們把羣衆生活和革命戰爭聯繫起來了，他們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務同時解決了。」

這就是說，必須顧及羣衆生活的全面，才能動員羣衆；必須與羣衆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才能走羣衆路線；必須使羣衆從實際生活中感覺到，而不只是聽說到，任務是他自己的，他才會積極努力來實現任務。抱着動員羣衆進行革命工作的態度才能走羣衆路線；抱着「不恥下問」「詢及芻蕘」的居高臨下的態度，儘管客客氣氣，還是會「訑訑拒人於千里之外」。

不發動羣衆的積極性，就不易實現任務，而羣衆的積極性是要靠他們的切身經驗來發動，不是靠交下任務來發動的。

列寧說過：「農民不會相信空話，而他們不相信空話，這是做得很對的。假使可要是他們一聽到宣讀法令和鼓動傳單就妄自相信，那倒是不好的事情。假使可以這樣來改造經濟生活，那末這種改造便一文不值。」（註二）

列寧的話和毛主席的話是一致的。如果不與羣衆打成一片，不注意實際生活中的問題並以解決這些問題爲動員羣衆實現革命任務的前提，那末再三再四提出任務要羣衆完成，也是不易達到目的的。

列寧的話是爲對中農的工作說的，這就是說，是指出對應該團結和動員的羣衆的態度。毛主席的話也是爲動員廣大羣衆參加革命說的。我們現在已經推翻了反動派，建立了新國家，一切工作都要推動那些佔大多數的應該爭取團結的羣衆去做。如果一個革命工作者，尤其是領導人，眼睛只看見任務，而看不見實現任務的方法，把羣衆只看成一些單純的工作者，而不看成有實際生活而且暫時還是多關心於自己生活的人，我想，工作是會遭遇困難的。

熱愛人民，爲人民服務，就會關心羣衆利益，正確走羣衆路線，工作也就會順利。反之，只走形式的羣衆路線，就表現爲人民服務的思想還不澈底，工作也不會順利。

羣衆觀點還不僅是個工作方法的問題。斯大林說：「馬克思主義的基石是羣衆。據它看來，解放羣衆是解放個人的主要條件。這就是說，據馬克思主義看來，在羣衆未被解放以前，要解放個人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號是『一切爲着羣衆。』」（註三）可見羣衆觀點是帶有根本意義的。

我還覺得毛主席的這篇文章也教了我們唯物論的觀點。對於工作，有一種澈底唯物論的看法，就是看工作的全面，看工作對象的全面，把面前的人都當作活人，具體研究他們如何才能盡心竭力積極工作的問題。這也是辯證的看法。

有另一種對於工作的看法，就是只看一件任務，把羣衆當作完成任務的抽象手段，只管一件，其他不管，急燥地交代任務而不細心研究如何才能使羣衆主動地實現任務。這就是唯心論的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看法。

前一種是具體了解爲人民服務，而後一種是抽象了解爲人民服務。

毛主席是把革命工作當作具體的羣衆工作來指示我們的：

「要得到羣衆的擁護麼？要羣衆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麼？那末，就得和羣衆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羣衆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羣衆的痛癢，就得眞心實意地爲羣衆謀利益，解決羣衆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羣衆的一切問題。」

我想，不但是進行革命戰爭，就是推進教育工作，研究工作，編輯出版工作等等也莫不如此。因爲一切工作在今天都是羣衆工作，離開羣衆就要一事無成，而羣衆却是少聽信文告多聽信事實的。

我覺得毛主席的這篇文章也教導我們如何把局部和全體結合起來進行工作。

有一種工作方法，就是只看見大的政治任務，只談論大事。教書只抄教條，論事只談學理，實際也屬於這一類。

有另一種工作方法，就是只看見眼前具體問題，只管小事。教書只羅列事實，論事只糾纏枝節，實際也屬於這一類。

用前一種方法辦事就會發號施令，誇誇其談。用後一種方法辦事就會目光如豆，事必躬親。兩者的結果都是脫離羣衆。

毛主席教給我們的，恰好是大處着眼小處下手。他指出，爲了進行發展到全國的革命戰爭，就要重視廣大羣衆的切身利益問題。婦女要學犁耙，小孩子要讀書，木橋要修，生瘡要治，這些問題都是羣衆的當前利益問題，因此，也就和羣衆的遠大利益問題密切有關，因爲羣衆要「從這些問題出發，了解我們提出來的更高的任務」。羣衆覺悟了，他們才能把革命當做生命，才能爲遠大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用生命向國民黨決鬥」。要羣衆覺悟，只能從眼前利益與遠大利益的根本一致方面着手，而不能從兩者之間的部分矛盾方面着手。

這樣，組織革命戰爭，改良羣衆生活，兩大任務就可以結合起來。進行革命是爲了改善人民生活，而改善眼前生活也是爲了推進革命。看輕了中心任務的不是很好的革命工作者，而眞正看清楚了大的中心任務，就不能不重視爲動員羣衆所必需的羣衆切身利益問題的解决，因爲只有依靠羣衆，才能完成任務。

列寧說過：「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多關心每普特糧食和每普特煤炭吧！」（註四）他舉解放婦女爲例，指出公共食堂，托兒所和幼稚園，就是共產主義萌芽的標本，「也就是不帶半點浮詞誇語和堂皇氣勢的平凡日常手段，這些平凡手段實際能够眞正解放婦女，減少和消滅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作用上處於與男子不平等的現象。」（註五）他也提到要在「沒有飢餓者，沒有失業者，沒有富足的懶漢，」一直到「對於正常供給貧家每個小孩一瓶牛奶的事情做得多些」，這些問題上開展比賽。（註六）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寧會說：「工農羣衆進行革命時所力求的是什麼？他們所期待於革命的是什麼？大家知道，他們所期待的是自由，和平，麵包和土地。」（註七）列寧是決不忽視革命事業中的具體工作的。他說：「要向大的目標走去，就得從小的目標開始。」（註八）斯大林把「在工作中無論何時都不要拒絕小事情」作爲列寧的重要遺訓之一。

這樣具體了解革命，就把偉大革命任務和平凡日常生活聯繫起來，用兩者的根本一致性來解決其中的局部矛盾性。這就是用工人階級的眼光看世界，而不是用知識份子的高傲眼光或農民的狹隘眼光看世界。農民受到了工人的這樣教育，就成爲工農聯盟中的偉大力量，而知識份子受到工人的這樣教育，也就能逐漸成爲革命知識份子。

這樣在偉大目標下進行具體工作，既不致流於誇誇其談，也不致陷於事務主義。

我覺得毛主席這篇文章也教導我們如何推進革命工作。

他指出善於作工作的模範，又說：「這些同志負担着一種責任，就是應該向着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那些還不善於工作的同志，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先進的地方應該更加先進，落後的地方應該趕上先進的地方。」

革命工作必須全面推動才能勝利，而推動全面就要先突破一點。可是一點既破，就要帶動全局。先進的不帶動落後的，先進的就會孤立。領導者就要負責隨時調整先進與落後間的關係，以不斷推進。

這是革命戰爭中的眞理，這也是一切工作中的眞理。這就是辯證發展的客觀規律。

這又是值得我們反覆思考、體會、學習的一點。

我讀了毛主席的這篇文章，首先感覺到無比的革命熱情，堅定的羣衆觀點，然後由文章的措辭明快結構謹嚴看出其中思想的確切和完整，再一步步尋繹思想，愈研究、體會，愈聯繫實際，愈感到它的內容的深刻和豐富。這正是一切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特色。它們特別耐人尋味，就因爲它們正確地反映了客觀眞理，即客觀世界的本質和發展規律。也正因爲如此，它們才成爲能指導人在現實中前進的永不涸竭的思想源泉。

限於自己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貧乏，我從這篇重要文獻中所初步學習到的就是這些。

（註一）「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解放社版，第一〇八頁。
（註二）「列寧文選」，中文版，第二卷，第五五七頁。
（註三）「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東北書店版，第五頁。
（註四）「列寧文選」中文版，第二卷，第五九八頁。
（註五）同上，第五九九頁。
（註六）同上，第三一三頁。
（註七）同上，第八三頁。
（註八）同上，第六八七頁。

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偉大成就

——慶祝蘇聯十月革命三十四週年

李琪

一　十月革命開闢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時代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一個重大特色，是它在俄國由於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與資產階級的統治，因而也就把俄國境內六千五百萬非俄羅斯的被壓迫民族，從沙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取得了世界史上第一次民族解放的大勝利。十月革命澈底消滅了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實現了各民族之間從未有過的眞正的自由和平等，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從而開闢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時代。

十月革命前，俄國廣大勞動人民，不僅受着地主和資本家的階級壓迫，而且有很多人還受着大俄羅斯的民族壓迫。

大家知道，俄國是一個擁有百餘種民族的多民族國家，當時俄羅斯民族是這個國家中的壓迫民族，而實行民族壓迫政策的，則是俄羅斯地主和資本家們。他們壓迫各族人民，並且挑撥各民族之間的情感，藉以達到維護他們統治的目的。正如列寧和斯大林所指出的，沒有民族壓迫，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

由於沙俄實行民族壓迫政策的結果，就使俄國許多非俄羅斯民族喪失了民族的權利，受盡蹂躪，因而在俄國歷史上也就不斷引起各民族間的反抗和鬥爭。

十月革命前，關於俄國各民族在沙皇政府壓迫下的情況，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章中，曾作過如下的敍述：

「沙俄境內許多非俄羅斯民族，完全沒有權利，經常不斷地受到各種鄙視和侮辱。沙皇政府嗾使俄羅斯居民把民族邊區土著人民當作下等種族看待，正式把他們叫做『異種』，養成鄙棄仇視他們的心理。沙皇政府故意挑起民族齟齬，慫恿此一民族反對彼一民族，組織蹂躪猶太人的暴行，在南高加索挑撥韃靼人與阿爾明尼亞人互相殘殺。

「民族邊區所有一切或差不多所有一切國家職務，都是由俄羅斯官吏充任。各個機關和法庭內一切事務，都是採取俄羅斯文。禁用各民族語文出版書報，學校裏禁用本族語文教課。沙皇政府極力壓制一切民族文化表現，對一切非俄羅斯民族實行強迫『俄羅斯化』的政策。沙皇政府是屠殺非俄羅斯民族的劊子手，是拷打非俄羅斯民族的掌刑人。」（莫斯科外文出版局版，頁一四）

這種黑暗的民族壓迫與各民族之間的不和，在沙俄時代曾存在過好幾百年。一切非俄羅斯民族所受的民族壓迫是很殘酷的。貧困、愚昧、落後則是這些民族的特點，這是在長期民族壓迫下所造成的惡果。所以，列寧稱「沙俄是各民族的監獄」。這也就是爲什麼俄國無產階級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一開始進行革命時，就非常注意和關心民族問題，就把民族革命政策作爲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綱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因。列寧和斯大林指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要能够獲得勝利，就必須同時使一切非俄羅斯的被壓迫民族從大俄羅斯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並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人民才能實現，否則，無產階級也不能解放自己；反之，一切被壓迫民族要能够獲得自身眞正的解放，也只有與無產階級聯盟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實行民族殖民地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和地主、資本家的統治才能實現。否則，被壓迫民族也不能解放自己。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完全證明列寧、斯大林這一理論的正確性，——當然，這一理論的正確性，今天更爲中國革命及其他許多被壓迫民族革命勝利所證明。

二　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

俄國各被壓迫民族之澈底解放與各族人民的友愛合作的新的關係的建立，

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同時也是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實施的成果。

早在一九〇三年布爾什維克黨成立時，列寧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原則與俄國的具體情況，即製定了俄國黨的民族革命綱領，並創立了帝國主義時代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學說。以後，斯大林更向前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與殖民地革命的理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加豐富起來。斯大林同志在這方面有過許多傑出的天才的著作，正如聯共黨中央與蘇聯部長會議，當斯大林同志七十壽辰在其致斯大林同志的祝賀詞中所說的：「您的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著作，好像輝煌的火炬，照耀着殖民地與附屬國人民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在列寧與斯大林革命思想的啓發下，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力量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他們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學說的具體化，它是從以下幾個基本原則出發的：

（一）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民族問題，已不是一個孤立的、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已不是一個與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總問題無關的問題，而是應當看爲從帝國主義枷鎖下解放被壓迫民族的世界性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中的一部分，並且是服從於這個總問題的。

（二）民族壓迫是基於階級壓迫而產生的。現今的民族壓迫，則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侵略政策的結果。因之，只有推翻帝國主義、推翻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一切政權歸勞動人民，民族壓迫才能澈底消滅。而要推翻帝國主義與地主、資本家的統治，被壓迫民族就必須與無產階級聯盟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實現。

（三）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每個民族都有自由分離之權，實行區域自治，直到組織獨立的國家。當然，這絕對不是說，各民族彼此間應該分立而建立起許多獨立的小國家，而是要根據無產階級革命利益來決定各民族聯合的形式，一切以勞動人民利益爲轉移。事實上，解放了的被壓迫民族，在大國範圍內，是可以更好地保證迅速發展自己民族的經濟和文化、更順利地來進行新社會的建設。蘇聯各民族發展的歷史經驗，以及兩年來新中國各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的事實，都完全說明了這一點。

（四）不僅各民族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而且要使各民族獲得事實上的平等地位。因而，勝利的先進民族的無產階級，就需要在長期中有效地幫助落後民族文化與經濟之發展，以便把這些落後民族迅速提昇到最高的發展水平，趕上走在前邊的民族，這樣，使它們才有可能去充分享受「民族平等」之權利。斯大林同志指出：這是建立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親密合作與社會主義澈底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

（五）一國之內，一切民族的無產者，應成立一個不可分割的無產階級集團——一個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以領導各族勞動人民進行革命，這是戰勝帝國主義、推翻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澈底解放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保證。

（六）爲了實現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政策，澈底解放各民族，就必須時時刻刻和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作鬥爭，一方面反對大民族中的排外愛國主義即大民族主義，另方面則反對少數民族中的地主的狹隘的民族主義。

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解決俄國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是解決世界各國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它引導俄國各族人民永遠擺脫了民族壓迫，建立起各民族自由平等友愛合作的統一的大家庭，使一切落後民族都迅速地趕上走在前邊的民族，並一道兒爲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從而在蘇聯就出現了人類史上第一批的具有高度文化發展的自由平等與友愛合作的社會主義的新民族。這種嶄新的社會主義民族的特點，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時曾作過如下的說明：

「工人階級及其國際主義政黨是鞏固和領導這些新民族的力量。爲了消滅資本主義殘餘和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而在民族內部建立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底聯盟；爲了各個民族及少數民族底不等權利和自由發展而消滅民族壓迫底殘餘；爲了樹立民族間的友誼和奠定國際主義精神，在反對掠奪及掠奪戰爭的政策的鬥爭中，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與一切被壓迫的和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結成統一戰綫。——這就是這些民族底精神和社會政治的面貌。

這種民族應該歸入社會主義民族範疇之內。」（曹葆華譯：「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

斯大林同志在這裏嚴格區別了資本主義民族範疇內的民族與社會主義民族範疇內的民族之不同，指出後者乃是「由於資本主義被消滅，憑著按照社會主義精神來根本改造舊民族的辦法，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同上）以及對於新的社會主義民族特點的闡明，乃是對於馬列主義民族理論更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也是聯共黨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建設時期在民族政策方面的根據。今天蘇

聯各族人民，在偉大的聯共黨的領導下，就是依照着斯大林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民族的理論，依照着最澈底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各族勞動人民，努力地建設着自己偉大的祖國，並警惕地保衛着世界和平。

三　蘇聯各族人民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成果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保證了澈底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切前提，爲各族人民間的眞誠合作掃淸了道路。在列寧、斯大林光輝的民族政策的指導下，俄羅斯民族不再是一個壓迫民族了，而是積極扶助其他落後民族的先進民族；而一切非俄羅斯民族，也不再是被壓迫民族，在俄羅斯民族的無產階級幫助下，而成爲社會主義各族人民統一大家庭建設的積極的參加者，成爲眞正自由平等的民族。斯大林同志說：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當我們展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推翻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的時候，我們的導師、我們的父親和養育者偉大的列寧曾經說，今後不應該再有統治的民族和附屬的民族了，一切民族都應該是平等和自由的了。他用這句話埋葬了帝俄和資產階級的舊的民族政策，宣佈了新的布爾什維克的政策——我國各族人民間友好的政策，兄弟團結的政策。」（列寧、斯大林：「研究聯共（布）黨史文集」第三卷，頁六六〇）

從十月革命勝利最初幾天起，布爾什維克黨就在事實上實施了這個政策。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公佈的「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宣告了俄國各民族平等自由，以及他們有直到脫離並組織獨立國家的自由分離權。這就使得有可能充分發揮俄國境內一切民族的創造力量和它們的積極性，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來進行爲建設社會主義和消滅各不同民族間的實際的不平等而鬥爭。同時成立了俄羅斯聯邦，以便從各方面來發展各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一九二一年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屆黨代表大會上關于「黨在民族問題的迫切任務」報告中說：「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民族問題的本質，就在於消滅那我們承繼自過去的各民族的落後性（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以便使各落後人民在國家關係上、在文化關係上、在經濟關係上，得以趕上中央俄羅斯。」（「論民族問題」，抗戰書店版，頁一七一）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第一次全蘇聯蘇維埃大會上，根據列寧和斯大林兩人的提議，成立了各蘇維埃民族自願成立的國家聯合，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最初加入蘇聯的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及別洛露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久又在中亞細亞成立了三個獨立盟員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即烏玆別克、土耳克明與塔什克。今天蘇聯已增加到十六個加盟共和國，它們按照自願和平權的原則聯合起來，組成了蘇聯。蘇聯的成立，正如「聯共（布）黨史」所指出的，「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布爾什維克黨列斯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莫斯科中文版，頁三二一）

由於蘇聯的成立與各民族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親密合作，這就使得各落後民族在經濟上文化上迅速地發展起來。各族人民在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領導下，經過幾個五年計劃之後，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蘇聯各民族以及蘇聯整個國家的面貌，即已完全改觀，它不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而成爲世界上頭等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家。至於原來那些落後的民族，也都已完全克服其落後性，而成爲掌握着現代科學技術具有強大的工業基礎並在精神上滲透着國際主義思想的新的社會主義的民族。

例如：卡薩赫民族在十月革命前，是一個靠遊牧爲生的落後民族，現代工業根本沒有，即原始技術的小工業也是少得很，幾乎沒有從事工業的人。在文化上更形落後，一百個卡薩赫人中，文盲就佔了九十八個人。十月革命後，在俄羅斯兄弟民族的幫助下，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建立起它們的民族政府，先成爲一個蘇維埃自治共和國（一九二〇年），後來成爲一個聯盟共和國（即現今的卡薩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九三九年成立），這個共和國今天已發展成爲頭等的工業國家。一九二〇年當卡薩赫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初告成立時，它的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總生產中所佔之比重，祇有百分之六・三，但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總結時，這一共和國工業生產的比重，即已升到百分之五六・八。今天卡薩赫斯坦成爲蘇聯非鐵金屬工業最大的中心，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製鉛工廠，有強大的機器製造業、冶金業和軍事工業。卡拉干達煤田，則是全蘇聯最大煤炭根據地之一，一九五〇年煤產已增至一千六百四十萬噸。此外，其他石油工業、化學工業、食品工業等，也都迅速地發展起來。

卡薩赫農業隨着工業的發展，也成爲頭等農業集體化的國家。一九四一年，共和國的耕作面積已增至百分之七十七・六，現在已有着二萬五千輛拖拉機和一萬二千輛收刈機。在廣大的農村裏，都已實現了電氣化的計劃。

卡薩赫的牧畜業也完全改觀，只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一年的五年中，其羊、牛、馬的頭數，就幾乎增加了兩倍。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儘管條件非常困

難，其牲口數也還增加了三百萬頭。

隨着經濟的迅速發展，卡薩赫人民的文化也迅速發展起來，成爲科學文化發達的民族。過去沒有一種報紙是用卡薩赫文印的，現在這個共和國裏出版的三百五十種報紙中，就有一百七十種是用卡薩赫文字印的。過去科學研究機關只有一個，高等學校和卡薩赫民族戲院一個也沒有，今天卡薩赫共和國已有了自己的科學院和五十所其他科學研究機關，有一所大學和二十三所其他高等學校，有三十五個戲院，一個國家歌劇和舞蹈戲院以及許多藝術陳列館。共和國的國家出版局出版着數百萬部卡薩赫語的書籍。一九五〇年，共和國就學的學生，即達一百十三萬人（其全部人口爲六百十四萬六千人）。卡薩赫民族由於社會主義經濟文化高度的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已向着共產主義社會邁進，在許多地方已澈底消滅了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之間的界限。

如該共和國阿木阿圖省屈里克區馬拉白村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一九一〇年時，該村有二百居民，都是文盲，由於全村沒有識字的人，看一封信都得跑到鄰村去找鄉書記。革命後，在蘇維埃制度下，在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實施下，至一九三九年該村即已完全掃除了文盲。一九五〇年，該村機關及八百居民，每天平均要收到二百五十封信，此外，郵局還要送三百十份區的「集體農莊勞動」報給他們。現在，該村共有四個集體農莊，都是機械化、電氣化的大農莊，每個農莊都成立有自己的圖書館，各圖書館藏書總計已超過五千種。經常閱讀的有三百八十五人。該村除了公共圖書館以外，許多農民家中都還有私人的書齋。如普通莊員沙德瓦柯夫有私人書籍二百八十二本，養羊場主任巴査羅夫的私人書齋中計有二百九十冊書籍，集體農莊的主席達爾文古洛夫有三百多本書，在其他集體農莊莊員的書架上也都放着不少的書籍。該村經常組有各種文娛活動，農民們在自己的俱樂部裏，經常可以看到各種戲劇和新出的影片。另外並成立有農業學研究小組，動物飼養獸醫學研究小組以及聯共黨史研究小組，進行着各種科學研究和學習。這就是今天新的社會主義的卡薩赫民族的農村面貌，它與十月革命前的落後的被壓迫的過着可憐的遊牧生活的卡薩赫民族來比，眞不知相隔了多少世紀啊！（上述馬拉白村文化發展的情形，是根據今年五月卅一日大連「實話報」上連載的「昭然在目的共產主義輪廓」一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需要幾百年的時間才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幾百年的時間以至永遠也不能做到的事情，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二三十年內就實現了，這眞是人類歷史的奇蹟！是二十世紀的奇蹟！在這裏，我們也就很明白地看到了社會主義與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偉大力量，看到了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之所在。

在蘇聯各族人民中，像這樣的奇蹟，是舉不勝舉的。蘇聯各落後民族之所以能够迅速提升到先進民族的地位，趕上走在它們前邊的民族，獲得今天這樣偉大的勝利，是與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分不開的，是與先進的俄羅斯兄弟民族的幫助分不開的。十月革命前，俄國現代工業主要是俄羅斯民族的工業，其他許多民族或者工業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正如斯大林所說的：「……在這裏，好多民族沒有來得及踏入資本主義，有些民族還完全沒有踏入資本主義，它們沒有或者完全沒有自己的無產階級。」（「論民族問題」，頁一九〇）所以，勝利的俄羅斯無產階級對於各兄弟民族的幫助，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就具有着決定性的意義。蘇聯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以及電氣化的過程，就是在俄羅斯民族幫助下克服一切非俄羅斯民族的落後性的過程，就是工農聯盟日益加强和鞏固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各族人民互相信任親密團結合作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俄羅斯民族及其工農業也獲得了澈底改造。無疑的，這一過程一定會使蘇聯各族人民迅速地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四　社會主義社會各族人民的友愛是蘇維埃愛國主義的源泉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各民族的生活和關係，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列寧、斯大林的名字也就成爲從資本主義奴役的黑暗中拯救出各族人民的偉大的解放者的名字，各族人民衷心地熱愛着自己的導師，熱愛着自己的國家，不知疲倦地爲自己祖國的繁榮而工作着。因而，各族勞動人民間兄弟般的友愛合作，也就成爲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基礎，成爲社會主義祖國的强大力量的來源之一。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五年時就曾指出：「蘇聯各族人民間的友誼，是很大的重要成就。因爲當這一友誼存在的時候，我國各民族是自由的和不可被戰勝的。當這一友誼存在並永存的時候，不論是內部的或外部的敵人，我們都是不怕的。」斯大林同志的這些指示，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得到了事實的證明。大家知道：希特勒匪徒們曾錯誤地估計蘇聯在衛國戰爭困難的年份裏各民族的合作會發生分裂，從而打敗蘇聯，以實現其奴役蘇聯各民族的侵略目的。然而事實說明，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蘇聯各民族的友愛合作是牢不可破的，是永

還不可被戰勝的，而法西斯侵略者們，正就是在蘇聯各民族友愛合作所產生的強大威力的面前遭受到澈底的殲滅的。戰爭結束後，在恢復和發展戰後經濟中，蘇聯各族人民的友愛更以新的力量表現出來，他們熱烈地響應着斯大林同志的號召，要「在最短的時期內醫治好敵人帶給我們的創傷並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的戰前水準，以便於最短時期內大大地超過這一水準，提高人民的物質福利並進一步鞏固蘇維埃國家軍事經濟的威力。」戰後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就是蘇聯各族人民對斯大林這一偉大號召的回答，它是蘇聯戰後經濟威力發展的新的高潮的標誌。今天蘇聯各族人民不僅醫治了戰爭的創傷，把經濟恢復到戰前水準，而且是大大地超過了這一水準，並正向着共產主義社會邁進。蘇聯各族人民的友愛與戰後經濟軍事力量的空前增長，這就嚴重地打擊了美英帝國主義集團的侵略政策，使世界和平獲得保證，因而也就大大地幫助了各被壓迫民族，特別是中國人民與朝鮮人民的反帝鬥爭，並鼓舞着全世界人民爲和平而鬥爭的勝利信心。

五　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

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以及他們關於民族殖民地革命的許多著作，是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有力武器，是各國共產黨在爲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指南。這一民族政策的基礎，是建立在國際主義、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各民族自由平等的生存和發展之上的。蘇聯各民族解放的道路，鐵一般地說明了，只有在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下，被壓迫民族才能獲得澈底的解放，才能澈底地消滅民族壓迫。

蘇聯各族人民澈底解放的事實，鼓舞着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人們，在蘇聯的幫助下，今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已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度。東南歐許多被壓迫民族，在蘇軍的直接幫助下，都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而獲得民族的獨立解放，並且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東方，則有朝鮮人民共和國和越南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以及印尼、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緬甸等等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之興起。特別是擁有五萬萬人口被壓迫的中國民族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依靠馬列主義的偉大理論，獲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並以中國革命的豐富經驗，向前發展了馬列主義，使馬列主義關於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學說更爲豐富起來。中國民族之解放，這是繼十月革命後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最大成就，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大勝利。中國今天對外已取得了民族的獨立解放，對內已實現了各民族的友愛合作。由於推翻了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了勞動人民的政權，因而，也就澈底地改變了國內各民族間的舊的關係，而建立起從未有過的眞正友好的新的關係。新中國成立後僅僅兩年，由於勝利的先進的漢民族工人階級的幫助，各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已獲得輝煌的成就。當然，這些成就，還祇是一個開端。無疑地，今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將會獲得更大的勝利。另一方面，也祇有長期地和有效地從各方面對落後的少數兄弟民族進行大力幫助，發展它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也才能爲建立中國各民族間友愛合作打下鞏固的基礎，而各民族間的這種友愛合作，却是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和澈底戰勝帝國主義所必需的。

十月革命到今天，已是三十四週年了。由十月革命所開闢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現在已獲得了世界性的決定勝利。八萬萬以上的人民從帝國主義民族壓迫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另外還有許許多多的被壓迫民族，已日益覺醒或者已經在爲着自己民族的獨立解放而英勇戰鬥，這就使得帝國主義及其民族侵略政策遭受到殲滅性的打擊。歷史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理論與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百戰百勝的力量，是各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有力武器，它高舉着國際主義的旗幟，使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緊密地團結起來，團結在世界工人階級偉大領袖和導師斯大林的週圍。帝國主義的民族侵略政策必然要失敗，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的民族友好政策必然會勝利，這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三十四年來蘇聯歷史科學的發展

朱慶永

一 列寧斯大林對於歷史科學的貢獻和指示

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曾經嚴重地勸告從事史學研究工作者，要他們把所有的歷史都重新開始研究。他指出這種研究的意義說：「如果要從不同的社會結構中求得和它們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美術、哲學、宗教的等等觀點，先應該研究各該不同的社會結構存在的條件……這是十分重要的。」

從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來，蘇聯史學家曾把過去的歷史重新作了研究。列寧號召史學家去「澈底發揮唯物主義，把唯物主義用到社會現象上去」，就會消滅以前歷史理論上的重要缺點。斯大林對於史學家的指示更精確、更詳細。他說：「研究社會歷史規律的關鍵，並不是要到人們的頭腦中、到社會的觀點和思想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會在每個一定歷史時期所採取的生產方式中，即要到社會的經濟中去探求」；「歷史科學要想成爲眞正的科學……首先應當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歷史，勞動羣衆的歷史，各國人民的歷史。……歷史科學的首要任務是要研究和揭示生產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的規律，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因此，他一再強調：「歷史發展的基本法則，在於運動和發展之永續不斷，在於舊東西衰亡和新東西生長，在於新與舊的鬥爭，在於舊的走向新的那種革命的過渡」。

列寧和斯大林不僅給予歷史家許多寶貴的指示，而且他倆自己都是眞正偉大的史學家，他們終身研究階級鬥爭的歷史，並指出無產階級取得勝利的道路。他們完成了很多有關歷史的著作，並爲歷史家創造了嶄新的研究對象。列寧在他的初期作品「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及「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兩書中，曾經根據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指出俄國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他說：俄國封建社會制度的確立，是在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的萌芽，是「大約起自十七世紀」。這兩個重要的指示，對於蘇聯史中的分期，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給予蘇聯史學家極大的幫助。在他的「帝國主義論」一書上，又將資本主義的發展劃分爲兩個階段，指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便這樣把馬克思主義向前發展了，他的這種劃分，就是現代世界史中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斯大林所處的時代較晚，他不但可有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偉大革命著作作爲參考，並且領導了蘇聯社會主義的國家建設，所以，他對於歷史科學的貢獻和指示，就更其顯得精緻和具體了。他對於人類歷史自古代至近代的重要發展階段，早就這樣指出：「歷史上有五種基本生產關係：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他說明了每一種制度的特點，特別強調指出各個歷史階段的經濟結構和階級鬥爭的意義。今日全世界的進步歷史學家，都把斯大林關於社會發展史的分期，作爲研究和著述的指南。斯大林是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研究歷史發展的，所以，他使過去乾燥的事實變爲活潑生動的東西，而不再像以前資產階級史學家所描寫的那樣虛玄混亂了。

斯大林在每一本著作和每一篇演講裏，都論述到歷史問題。他的宏論，不只對蘇聯歷史學者，就是對那些研究個別國家史和世界史（不論是現代的和古代的）的各國進步學者，也是同樣重要的。他曾經給予「民族」下過精確的定義，指出民族的來源和它的發展；分析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原因；以及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中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規律。

斯大林最重要的兩本有關歷史科學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和「聯共黨史簡明教程」。自從「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問世後，十九世紀歷史中最重要的民族運動問題便得到精確的解釋。在這本經典著作沒有問世以前，在各國歷史的文獻裏從來沒有出現過有關民族問題的科學定義。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只爲資本家服務，因此，他們關於這個重要問題的著書立說，都是反動的、歪曲事實的。而斯大林却給我們下了一個科學的定義，他說：「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經濟生活以及有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他指出現代的民族是歷

史的產品，它和生活中的一切其它現象一樣，也是在發展着的。

從十九世紀以來，民族問題一直是一個嚴重的國際問題，由於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所以它往往爲反革命份子所利用。但是，自從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發表以後，反革命的勢力便無法利用民族問題來削弱革命陣營了。

「聯共黨史簡明教程」是俄國三次革命的歷史，是俄國工人鬥爭的歷史。它是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觀點所寫成的，所以，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結晶，它向全世界無產階級指明出來，爲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武裝的工人階級的黨，是不可戰勝的，是一定可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和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

二　蘇聯歷史科學發展的各階段

蘇聯史學家在不斷研究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就是遵循着他倆的重要原則性的指示而穩步前進的。蘇聯史學界成績之所以琳瑯滿目，絕對不是偶然的。

在這三十四年的發展過程中，蘇聯的史學研究工作，也曾經歷了下列各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鬥爭時期（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四年）。在這段時期，革命剛剛成功，資產階級的史學家在各學校和研究機關裏仍舊居於領導的地位。這些人不但不能認清革命的意義，有時還不斷地公開攻擊新政權。爲了訓練新幹部，蘇聯政府創立了很多新型的學校和研究機關：如共產黨高等學校、司威爾德洛夫共產大學、紅色教授培養所。共產學院和馬恩研究所則爲新政權的學術研究中心。中央檔案保管處的成立，對於歷史科學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幫助。當時曾經決定以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革命及社會運動史、廿世紀史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等問題作爲研究的中心課題。像「革命紀年」和「紅色檔案」等。很多有關黨史和國際關係的文獻，都是在這一期間出版的。

第二階段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論在歷史科學中樹立的時期。（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六年）在這一階段的初期，資產階級的學者仍以各種方式傳佈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特別在討論重要問題的時候，他們非常活躍。那時，東方問題專家曾舉行過「封建主義之和平轉入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蘇聯史家還曾有過「列寧主義之得自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的繼承性」問題的討論。這種討論，都企圖爲右翼機會主義的理論製造歷史上的證據。當黨宣佈消滅富農階級時，他們却高聲頌揚小農生產的優點。在討論歷史問題——討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討論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性質、討論俄國金融資本、討論十月革命的雙重性等問題——的掩護下，他們實際是在宣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荒謬議論，他們的陰謀就是要從歷史上證明社會主義不可能在蘇聯一國獲得勝利。

針對着這種情形，斯大林曾一再昭示蘇聯人民要提高警惕，偵防各式各樣的敵人。他號召學術工作者深入研究理論問題，他說：「爲要不落後於實踐，就必須立刻根據新環境來研究一切問題。不然的話，我們對於各種糾纏我們實際工作者的頭腦的資產階級理論，就無法予以揭穿，……因爲只有對理論中的資產階級成見進行鬥爭，才能鞏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陣地」。一九三一年，在他給編輯者的一封信裏，他要求不給歷史的誹謗者和僞造者以任何發言的機會，要他們與腐敗的自由主義在理論問題上作無情的鬥爭，他號召蘇聯史學家展開積極的和創造性的工作，把黨史研究的工作，放在科學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水平上。

爲了促進歷史科學的發展，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中央在一九三四年公佈了「關於蘇聯各學校中教授本國歷史」的決議，指出各學校中歷史教授方法不能令人滿意，「教科書及教授本身都帶着抽象的和公式主義的性質，提供學生們一些社會經濟形態的抽象定義，而不用生動有趣的方式和依照年代的秩序講述最重要的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的特點等以教授本國史。」決議中指定成立五個小組，準備審查、編訂的五種歷史教科書。各大學中的歷史學系亦都恢復了，要他們訓練以馬克思主義爲武器的史學幹部。

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諾夫三人對於蘇聯歷史教科書提綱所提出的具體意見，對於蘇聯歷史科學的發展，是有極大貢獻的。關於蘇聯史部分，他們強調指出：在蘇聯史的教科書裏，大俄羅斯人的歷史不能與蘇聯其它民族的歷史相分離，也不能與整個歐洲歷史、甚至世界歷史相分離。關於世界近代史方面，他們認爲近代史教科書的中心，「應該是資產階級革命不同於社會主義革命的這一思想」。他們說提綱中應該指出：「資產階級革命把人民從封建制度和絕對主義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但又給他們加上新的枷鎖——資本主義的和資產階級的枷鎖；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則粉碎了一切枷鎖，並把人民從一切形式的剝削之下解放出來」。

當時，在蘇聯史學界中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清洗包克羅夫斯基學派的影響。這個學派雖然自稱是採取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實際上他們在研究歷史問

題時，僅祇運用了經濟唯物論，並沒有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作為他們工作的武器。因此，他們將過去的歷史演變描寫成為抽象的呆板的發展階段。這一派，對於俄國歷史中許多重要事實的解釋，都直接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相衝突，與歷史的發展規律相違背。他們輕視過去俄羅斯民族的偉大傳統，因此，這種歷史課本不能啓發青年對祖國產生熱愛，對敵人產生仇恨。

然而，這個學派正統治着當時蘇聯的歷史學界。不把它們在學術界的統治地位推翻，蘇聯的歷史便無從發展。因此，聯共中央和人民委員會在一九三六年初，就公開指出這個學派的錯誤，並號召和動員全國優秀的歷史學家從各方面來分析批評包克羅夫斯基的歷史著作，清洗他和他的學派在學術界的一切勢力。

第三階段是蘇聯史學的迅速發展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在下一節中，我們予以詳細的敘述。

三　蘇聯史學界的重大成就

在黨和政府的大力協助下，蘇聯史學界進行了一番清洗，它使歷史科學大大地推進了一步。無論在本國史或世界史方面，都有顯著的成績出現。拿本國史來說：除了根據斯大林的指示而編著的各種歷史教科書紛紛出版（並且一再修正）外，各種專題的研究和著作也相繼問世。大概蘇聯史中所有重要的階段和問題，都已經過研究，在經濟發展和革命運動問題方面，蘇聯學者都作了特別深刻的研究。關於基輔王國歷史的研究，以現任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葛瑞科夫最為著名。在他的名著「基輔俄羅斯」一書中得到這樣的結論：（一）東部斯拉夫民族知道有奴隸制度的存在，但是超越了奴隸制度，創造封建制度；（二）俄國受農業支配已是很久，所以在基輔王國中，關於土地的佔有形式，關於世襲領地經濟的組織問題是很重要的問題。從九世紀起，就已經可以看出土地私有制的痕跡，到了第十一世紀時，已經存在了以剝削農民勞動為基礎的農業經濟；（三）無論從經濟方面或社會方面，基輔的文化和政治發展水平，都不低於同時期的西歐任何政治組織；（四）基輔王國不是俄國史中的最初王國，在基輔王國建立之前，在尼泊爾河流域曾有過其他政治組織。

葛瑞科夫對於俄國農民問題的研究，也是極負盛名的。他的「古代俄羅斯農民」和雷巴珂夫的大著「古代俄羅斯的手工業」，都是研究俄國封建制度的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葛瑞科夫和雅庫波夫斯基兩人合著的「金帳汗國」，對於元史方面的貢獻很大，在這本書裏，他們針對着包克羅夫斯基的錯誤論點，指出那妨礙各民族發展的蒙古統治之反動意義。

對於古代史科的整理，若干史學工作者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俄羅斯法典」和很多古代編年的記錄，都經過精確的考證、註解，而重新出版，這無疑地對於蘇聯古代史的研究，給了很大的幫助。

關於十五—十六世紀俄國中央政權的形成以及由此而轉變為多數民族國家的重大問題，蘇聯史學家的著作極多，討論極為熱烈。參加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得到顯著成績的人，有去年去世的莫斯科大學巴赫儒新和巴最列維契兩位教授，以及史米諾夫、莫夫羅琴等人。維波爾及巴赫儒新兩人，對於伊凡第四有獨到的見解。他們指出過去資產階級學者歪曲史實，而強調伊凡第四的偉大改革意義，認為伊凡第四和後來的彼得大帝一樣，在他們所處的時代中都不能算是特別殘酷的人。他們與敵人鬥爭的政治意義是他們採用了野蠻的方法打擊那些野蠻的敵人，用強力改造俄國，將俄國政府的地位鞏固起來，提高它的國際地位。

關於彼得大帝時代的那段複雜的歷史，從事研究的人更多。「彼得大帝的書信和文件」的出版，現在仍在繼續着，鮑奇斯拉夫斯基和華斯克瑞森斯基兩人，在這方面有過不少的貢獻。過去兩年來，蘇聯史學界曾經進行過這樣的討論，就是：彼得時代的工廠，究竟是不是資本主義的性質呢？多數的學者都認為那不是資本主義的，彼得時代仍是封建時代，只有輕微的資本主義的成份。

各民族科學院和科學團體，現正展開民族歷史的研究，並且已經獲得顯著的成績。關於這方面，現在已出版的計有：「烏克蘭史」、「白俄羅斯史」、「喬治亞史」、「阿塞爾拜然史」、「烏茲別克史」、「卡薩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史」、「雅庫特史」、「塔塔爾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史」、「阿爾泰民族史綱」、「南西伯利亞古代史」等等。

目前，蘇聯科學院和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學史學系正在合作編著大部頭的「蘇聯歷史」（十二卷）和「世界史」，並且聽說這兩部鉅著大部已經完成。我們渴望這兩部鉅著能夠早日出版，並能早日流傳到中國，藉以幫助我國目前大學中世界史的貧乏現象。

以上是蘇聯本國史方面研究工作的大致情形。在世界史方面，他們也有大量的著述。蘇聯學者對於斯拉夫學和東方學有獨到的研究，並給若干斯拉夫國家和東方殖民地的民族運動指出了正確的道路。至於他們對於古代世界史和中

世紀史，貢獻也不在少。蘇聯對於拜占庭帝國和希臘、羅馬史的研究，是久已聞名於世的，並且有過卓越的貢獻。在這裏，我不能一一列舉，現在單論蘇聯學者在近代世界史方面的成就。

在這方面，值得提及的，是他們對於法國史，特別是對於法國農民問題的研究。法國學者曾一再贊揚蘇聯學者在這方面的功績，承認他們不僅提出了新問題，並且鼓勵了法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論述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書籍，亦特別豐富。伏爾金和達爾萊所主編的「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及凱爾伏采夫所寫的「巴黎公社史」，是常被人引用的兩本歷史著作。關於拿破崙時代，早有很多著作問世，其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達爾萊所著的「拿破崙」、「拿破崙侵俄史」和「塔立朗」。達爾萊不祗善於深刻地分析人物，他的文字更生動優美，頗能使他的著作錦上添花，令人讀之津津有味。他還著有「克里米亞戰爭史」，專論十九世紀中葉俄國與英法、土耳其的衝突；另有「帝國主義時代的歐洲」，則描寫一八七〇年後歐洲的發展。達爾萊特別擅長外交史，他在這方面的著作，尤稱豐富。

外交史是蘇聯學者一向深切注意的題目。偉大衛國戰爭前後所出版的三大本「世界外交史」，曾引起各國學術界的討論，現在已經有了若干種外文譯本。這本書，就其內容來說，是以前任何國家專治外交史的學者所未曾達到的。它從古代講起，一直敘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對於每個問題，都有專論詳細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也最值得學習，因爲它是第一本網羅蘇聯全國優秀外交史學人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論述世界古今外交歷史的書籍。蘇聯最近尚有許多外交史的專著陸續出版，我們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列舉。

以上是說著作方面的重要成就。在研究機構方面：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可算是蘇聯史學研究的最高機關。物質文化史研究所偏重於語文和歷史。許多年來，這兩個研究所都在葛瑞科夫一人領導之下進行工作。各共和國裏的科學院，也設有歷史研究所，負責領導各該國歷史的研究。全國綜合性的大學都附設有歷史系，主要的目的固然在培養史學界的幹部，但也附有推動史學研究工作的任務。大概各地大學史學系都有它的特點：如莫斯科大學史學系偏重在蘇聯史和斯拉夫學，列寧格勒大學史學系則偏重在世界史和東方學。亞洲各邦的大學，多偏重於在亞洲民族史的研究。

從史學刊物的衆多上，也很可以反映蘇聯史學的發達。目前在蘇聯專供發表史學專題的雜誌，計有下列這些：「古代歷史通報」、「拜占庭帝國研究」、「物質文化史研究所簡報」是專供上古史學者討論的園地；「中世紀」叢刊的對象，是專討論西洋中古世紀史的問題；「東方學」叢刊，則專討論亞洲各民族的古今歷史文化及宗教等問題；「歷史檔案」專刊載重要歷史文件；「史學問題」（月刊）及「歷史筆記」（季刊）是綜合性的刊物，後者尤富於學術價值。此外，討論歷史問題的刊物，尚有：「國立歷史博物院叢刊」、「國立冬宮博物院叢刊」、蘇聯科學院「歷史與哲學叢刊」、各加盟共和國科學院歷史研究叢刊、莫斯科大學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的學術叢刊等。

四　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蘇聯歷史科學

從一九四六年起，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開始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卅四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勝利，使它在各方面都具備着走向更高階段的物質條件。現在一切都在向上發展，向前推進，蘇聯人民對於各種學術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同樣地，歷史科學也走上了更高的發展階段。拿一九四六年以後史學界的出版物來看，它們在質的方面，都與以前的著作十分不同。新版書不但材料豐富，立論充實，理論的水平也都提高，含有高度的黨性。書的裝訂和設計也都改善，更趨美觀，著作家不只單純地是個作家，他必須要爲工人階級服務，爲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這幾年中再版的史學書籍，很少沒有經過著者的詳細修正的，因爲不如此便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便要受到嚴厲的批評。著者對於書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名詞和定義，都力求簡潔準確，完成抱着對人民負責的嚴肅態度。

過去兩年間，在「史學問題」月刊上關於蘇聯史中封建社會分期和資本主義時期的兩個問題，曾經展開熱烈的討論。經過長期間研究討論之後，有了寶貴的收穫。很多重要的問題都得到解決了，有些問題雖然還未解決，但是已經收集了不少新的材料，將問題的解決向前推進了一步。「史學問題」目前正在展開着關於十月革命後蘇維埃社會史提綱的討論。

近幾年來，黨給予史學界的直接幫助也是很大的。首先，日丹諾夫在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中發表了幾篇很重要的演講，這些演講正象徵着新時代——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開始。他要求蘇聯作家走在人民的隊伍中，向他們指出前進的道路。著作家應當「幫助人民、政府和黨來教育我們的青年，使他們變得更勇敢，對自己的力量更有信心和不怕任何困難」。日丹諾夫要求蘇聯哲學家，要分析和綜合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的結果；告訴他們：

唯物論是要「隨着在自然科學中構成一個時代的每個偉大的新發現而採取新面目」；要他們「消滅工作中非戰鬥的節奏，拋棄自己的老朽作風，展開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樣的精神和熱情去工作」。

日丹諾夫的這些指示，不單是對蘇聯文藝作家和哲學家說的，他實際也向蘇聯歷史學家提出了同樣的任務，要他們向人民絕對負責，不要滿足於已得的成就。

然而，對於蘇聯歷史科學最有幫助和發生最大作用的，當推斯大林在去年所發表的關於語言學上的意見，特別是那篇「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論文。對於歷史科學來說，這篇論文是對於那些企圖以單純唯物主義代替馬克思列寧理論的致命打擊，是對於企圖簡單化歷史過程理論的致命打擊。單純「經濟」唯物論的特點，是將基礎與生產混爲一談，企圖使上層建築不與基礎相結合，而直接與生產相結合，輕視上層建築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積極作用。斯大林這樣說：「上層建築與生產及人的生產行爲沒有直接聯系。上層建築只是經過經濟的中介，基礎的中介與生產發生間接的聯系。因此上層建築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改變不是直接發生，不是立刻發生的，而是在基礎改變以後，通過在生產中的各種改變的折光，通過在基礎中的各種改變來反映的」。他特別強調指出，一經出現之後，上層建築「就要成爲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根除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

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文中，還爲歷史學家解決了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是關於突變的問題。斯大林說：「一般說來，要告訴那些醉心于突變論的同志們，從舊質過渡到新質經過突變的法則，不僅不適用於語言發展的歷史，而且也不常常適用於屬於基礎之類的或上層建築之類的其它社會現象。對於分成兩個敵對階級的社會來說，突變是必須的，但是對於沒有敵對階級的社會，突變就不是必須了」。他特別舉出蘇聯集體農場的產生爲例證。有了這一光輝的指示，史學家便容易解決很多問題，而不致再圍繞着舊理論兜圈子了。

根據斯大林的英明的指示，許多舊的歷史著作都要受到批評。這是直接促進歷史科學前進的動力，因爲它在史學家面前提供出不少新的問題，賦予他們以新的理論武器。

斯大林敎育我們說：「沒有意見的鬥爭，沒有批評的自由，任何科學都不能有所發展，都不能有成績」。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蘇聯出版界中的一個經常現象，不管著者有什麼樣的地位和聲望，只要發生錯誤，都會受到嚴格的批評。對於哲學界的亞力山大洛夫，音樂界的蕭斯塔柯維奇和普羅柯菲耶夫是如此，對於歷史界的達爾萊也是如此。達爾萊在蘇聯歷史學界的地位有如愛倫堡在蘇聯文學界中的地位。他那銳利的筆法和精確分析的能力，使他在蘇聯史學界中佔着很崇高的地位，深受各界人士的景仰。可是，他也常常受到批評。最近「布爾什維克」雜誌將他的一本名作「拿破崙侵俄史」第二版加以檢討，從各方面分析書中的缺點，責備他對於一八一二年戰爭的研究，未能從全面考察問題，因此，未能將庫圖佐夫、俄國軍隊和俄國人民在擊潰拿破崙軍隊這一艱鉅任務中所演的角色放在應有的地位。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進步的武器，對於歷史科學的著作，特別需要展開批評工作。列寧和斯大林曾經一再倡導要善於運用這個武器。在這從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期間，這個武器將在蘇聯歷史學界發揮很大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九日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

由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主持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其第一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自上月十二日起由全國各地新華書店發行。

「毛澤東選集」收集了毛主席從一九二六年以來在中國共產黨所經歷的五個歷史時期的重要著作，一律按照著作年月的次序編輯。選集中的各篇文章，都經過毛主席親自校閱，並由選集出版委員會作了一些題解和註釋。

「毛澤東選集」是毛主席應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成果的彙集，它的出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事業中的重要事件。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共包括論文十六篇，其中九篇是過去出版的幾種「毛澤東選集」中沒有編入過的。

人民經濟的利潤形態

許滌新

一　剩餘價值與剩餘生產物

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還存在着資本主義的成份，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事實，尚未消滅，因之，剩餘價值這個範疇，在私人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內，顯然是存在着的。在私人企業中，資本家使勞動者的勞動日，超過必需勞動，將超過勞動力價值以上的剩餘價值，估爲己有。這不特在城市的私營企業是如此，就是在農村中的富農經濟中，亦是如此。

在私人企業中，剩餘價值是存在的，但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剩餘價值，在程度上，是與資本主義社會有些不同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的政權操在資產階級、特別是獨佔資本家的手裏，他們的法律、警察、憲兵以至牢獄，都是爲着保護這種剝削制度的，因此，他們對於剩餘價值的剝削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在人民民主國家中，情況就不如此。人民民主國家是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領導的，以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爲領導的人民政府，對於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必定採取適當的限制和監督。在工作時間上，在勞動條件上，在工資立法上，在勞工福利與勞動保險上，在所得稅的保證上，人民政府皆有適當的、照顧勞資雙方而又能符合於繁榮經濟的方針的措施，因此，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剩餘價值，在程度上就不會像資本主義社會一樣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剩餘價值是這種社會的唯一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同時也就是剩餘價值生產的不斷的擴大的過程。在人民民主國家中，情況就不是如此。人民經濟的基本特點，不但表現在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中，剩餘價值率受到一定的限制，私人企業對於勞動者的剝削率沒有可能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一樣的高，而且表現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整個人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地會降低，從相對的降低到絕對的降低，因爲在人民民主國家中，國家掌握着全國的經濟命脈。大工業、大礦山、大銀行、交通機關以至對外貿易和國內重要商品的批發與零售商業，都掌握在國家手裏。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是快過於私人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的；同時，國家又有計劃地扶助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的發展，有計劃地控制着國內市場，並使用各種方法使資本主義成份服從人民民主國家的政策，使私人資本主義成份逐步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的成份，而鞏固人民經濟的力量。因此，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私人資本主義成份內，剩餘價值的生產，縱然可以有相當的發展，但從全面來看，從長期來看，它不是無限地在擴大着，在整個人民經濟的比重中，它是從相對的降低走向絕對的降低的，縮小到某一程度時，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也就要改變它的性質了。

談到人民民主國家的國營經濟，它的性質是與私人資本主義迥不相同的。國營企業的生產，在形態上雖則仍是商品的生產，但在內容上，國營企業的利益不是少數人的、剝削者的利益，而是全國人民的公共利益，國營企業的營業方針，並不僅僅着眼於取得企業利潤，而且是着眼於整個人民經濟之發展與人民生活之改善的。因此，國營企業雖則是商品生產，但並不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因爲在國營企業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不是屬於少數剝削者，而是屬於全體人民的，在國營企業中工作的工作人員，都是企業的主人翁，自己替自己的企業工作，那裏會有剝削之存在呢？

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中，剝削關係是不存在的，那末，在這裏，工人的所得，是不是同他所支出的勞動相等呢？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評了拉薩爾派的反動的口號——「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的不合理和錯誤，馬克思指出道：

> 「我們首先把『勞動底所得』按照勞動生產物底意思來看，那末合作的勞動底所得就是社會的全部生產物。那末從全部生產物裏應該扣去：
>
> 第一、抵償那已經用去的生產手段底補充。
>
> 第二、爲了擴張生產追加的部分。
>
> 第三、預備基金和保險基金，應付因自然變故等而發生的災害和障礙。
>
> 從『不折不扣的勞動底所得』中這些扣除是一個經濟的必要，至於它的大小應按照現存的手段和力量來確定，一部分用百分比（公算）來計算，但無論如何沒有

辦法用『公平』來計算。

全部生產物底其他部分，一定地作爲消費手段之用。

在這部分作個人的分配之前，還有一些要從這裏扣除的：

第一、一般的不屬於生產的管理的費用。這部分一開始就會和現在的社會比較大大地受到限制，並且跟着新社會發展在同一程度中減少下去。

第二、注定屬於共同滿足種種需要者，如教育衛生設備等。這一部分和現在的社會比較起來顯然早就發達，並且跟着新社會發展在同一程度中增加起來。

第三、對於無力勞動者的基金，簡括地說，凡今天屬於所謂官辦的慈善事項。

現在我們才論到『分配』，這個綱領在拉薩爾派的影響之下，偏狹地只單注意它，即只注意被分配在合作社底個別生產者之間的消費手段底部分。

『不折不扣的勞動底所得』已經暗中變成『有折有扣的所得』了，雖然生產者在以私人底資格所喪失了的又直接或間接地以社會成員底資格收回來。」（註一）

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中，工人是不能「不折不扣」地取得其所謂勞動所得的。爲了補償業已消費掉的生產手段，爲了積累資金以擴大國營企業，爲了建設國防和鞏固國防，爲了補償整個社會的文化衛生以及其他的需要，在國營企業中工作的工作人員，必須提供一部分剩餘勞動　。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中，勞動者的勞動日，不應僅僅限於直接滿足其個人需要的必要勞動，而必須在這個滿足個人的必要勞動以外，進行一些剩餘勞動。在這裏，我們必須認淸，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中的剩餘勞動，是與過去各種剝削制度（如奴隸制度、封建制度）的剩餘勞動不相同的，亦是與那個構成資本家的財富的泉源——剩餘價値不相同的，因爲人民民主國家的國營企業底剩餘勞動，是用之於人民本身的，是沒有剝削內容的；反之，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的剩餘勞動，則是剝削的，是被不勞動的寄生階級掠奪以去的。

其實，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中　，所謂剩餘勞動是失去了所謂「剩餘」的意義的，因爲這種剩餘勞動，正像必要勞動一樣，對於社會說來，是同等必要的，所以，在國營企業中的工作人員，必須認淸他對國家所提供的剩餘勞動的必要性，認淸這種剩餘勞動的內容，認淸這種剩餘勞動是沒有剝削意義的。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中的工作人員，應該比滿足他們個人的直接需要，還要更多的工作着！

根據上面所說，我們可以看出人民民主國家的國營企業，只有剩餘生產物之存在，而沒有剩餘價値之存在。但因爲在人民民主國家中，私人資本主義成份還未消滅，因此，有一部份剩餘生產物被私人資本家所攫取，而成爲眞正的剩餘價値了。波蘭的明茲　(Hilary Mine)　在討論波蘭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時候，曾這樣寫着：

「我重複說，在原則上，這種剩餘生產物只有用於國家的需要，改善勞動大衆的生活程度及國家的其他用途，理論上應是如此的，但實際上並非這樣。事實上，在我們的混合經濟制度中，現實經常離開這個原則。國家付給了生產費用並在生產過程中得到了剩餘生產物，這些剩餘生產物，並沒有依據正常的分配方式，亦並非爲了交換同等價値的農產物，而是在商業的形式之下　，我們國有工業所生產的物品，就這樣的賣出去，並購買它所需要生產和發展的原料及增加工人的數目，其結果，國家工業出賣其物品，主要是經過資本主義成份的媒介，同時，不但在國外，而且在國內，要向資本主義成份購進原料。

這是很明白的，在這種情形之中，只有一部分國家工業的剩餘生產物，保留在國家手中，並依照計劃和法令需要來分配，大部份的剩餘生產物則流入資本主義的商人和買戶之手，尤有進者，有時在國家的投資中，發生了同樣的情形，使實在非資本主義化的國有工業，把它的物質價値交付給資本主義市場。

我們可以不必詳細敍述國家工業的剩餘生產物或國家投資所進行的交換形式。這些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從平常的偸竊和盜用，經過投機而提高國家生產物的販賣價格，經過投機而提高農村中資本主義成份所生產的農產物的價格，使工業品和農業品進行不等價的交換。這種形式如此微妙，如此複雜，要說明與區分它們，實在是困難的。無論如何，這種攫取剩餘的現象，在數種國家生產物中是相當普通的，例如，在紡織工業中，我們很容易地看到剩餘生產物被投機者所攫取。這樣的工業品在表面上似乎不受牽連，但實際上，這禍害仍舊是存在着，例如，煤礦是輸出國外的，但交換回來的，雖爲同等價値的消費品，而在這裏，剩餘生產物早就流入資本家的手中了。在國有工業生產物中，很難找到完全沒有這些毛病的。無論如何，不由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成份攫取剩餘生產物是這樣的普遍，因此，我們可以說，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是國家的，另一部分却進入資本主義市場中去了。」（註二）

人民民主國家的國營企業，雖然因爲私人資本之存在與市場的關係，有

（註一）何思敬、徐氷譯：哥達綱領批判，解放社一九五〇年版，頁一一——一三

（註二）見 Political Affair 一九四七年十月號，頁九〇四——九〇五

部分剩餘生產物，被中間商人攫取以去而成爲剩餘價值，但是，私人資本對於國營企業的這種攫取，並不是長久不變的。因爲人民民主國家不斷地在爭取對於國內市場的控制，不斷地在爭取國營的批發與零售業務的擴展，這麼一來，私人資本主義成份攫取國營企業的一部分剩餘生產物而變爲剩餘價值的現象，就會逐漸降低其比重，以至歸於消滅了。

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由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而成的。公私合營的企業，是半資本主義性質的，那一部分被私人資本家所攫取的剩餘生產物，自然保持着剩餘價值的形式和內容，私人以租借形式而經營國家的企業，這個企業的所有權，顯然屬於國家，但從國家租入這個企業而進行生產的資本家，其目的是在於攫取剩餘價值的，他把工人替他所生產的剩餘生產物，以「租費」的形式，交給國家，而保留一大部分的剩餘生產物，留給自己，這一部分保留給他自己的價值，顯然就是剩餘價值。至於爲國營企業加工的私人企業，在生產關係上更是資本主義性質的。這種爲國家加工的私營企業，只有在生產計劃方面，在成品的處理方面，是受到國家的控制的，但在企業的內部，在生產關係上，顯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因此，它從國家所領得的利潤，仍然具有剩餘價值的內容。

取消分紅的合作社經濟，一般說來，是沒有剩餘價值之存在的，但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因爲它建立在個體農民的私有財產——土地之上，這種土地的私有權，就成爲不勞而獲的根據。按加入合作社的土地範圍分配收益，就是說，加入合作社的土地，可以得到地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這種地租，說明一定量的剩餘價值是存在着的。很明白，這種基於私有財產權的「地租」，是與合作社的按勞分配的原則相矛盾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契爾文科夫對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這種矛盾性，曾有明確的說明，他說：

「一方面使用社會主義的勞動分工、組織與酬勞的原則，另一方面，又使用私有財產權利的原則，私有財產可取得不勞而獲的收入，這兩個原則互相衝突，並將繼續成爲衝突的來源。」（註三）

在那些以獨立生產爲內容的個體經濟中，剩餘價值是不存在的，因爲獨立生產者是使用自己的生產資料，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去進行生產的。在他的生產物中，從相當於工資到相當於利潤部分的價值，都歸於他自己。在這種生產關係中，是沒有剝削之存在的。從而，也是沒有剩餘價值之存在的。但當他和商人資本發生關係的時候，由於不等價的交換，獨立生產者的產品的一部分，就會被商人資本攫取以去，這一部分被攫去的生產物，就變成商人的剩餘價值了。

在人民經濟中，私營企業存在着剩餘價值，而國營企業則存在着沒有剝削性質的剩餘生產物。在國民收入中，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剩餘勞動的消長，呈現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與國營經濟的消長。雖則因爲私人資本主義之存在，使國營企業的剩餘生產物和個體經濟的生產物的一部分，變成資本家荷包中的剩餘價值，但由於國營經濟與合作社經濟之不斷擴大，由於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之逐漸轉化爲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在國民收入中，沒有剝削性的剩餘生產物的比重，是不斷地在擴大着的。

二　關於「平均利潤」

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國營經濟佔着領導的地位，新民主主義國家對於整個人民經濟的領導，主要是從它的經濟計劃和控制市場中實現出來的。因爲這樣，所以，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各種企業的「利潤」之多寡與「利潤率」之高低，亦與別種經濟現象一樣，是受着國家的計劃所影響、所支配的。

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利潤率就是不變資本加可變資本除利潤總額。因此，剩餘價值量越大，則利潤額亦就越大，剩餘價值量越小，則利潤額亦就越小，而剩餘價值量的大小，則決定於可變資本之大小。這就是說，假定二個生產部門的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量都是一樣的話，如果資本的有機構成不一致，如果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對比有差別，則剩餘價值量雖則相同，但利潤率却是不相同的。不變資本對於可變資本的比重愈大的部門（如在重工業），其利潤率就顯得低些，反之，這種比重越小的部門（如輕工業及農業），則其利潤率就顯得高些。在這種情況之下，各個生產部門，各個企業之間，利潤率是不一致的，但由於自由競爭的結果，利潤率較低的部門，會移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於是，社會各部門間高低不平的利潤率，就有平均的趨向，而形成平均利潤率了。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平均利潤率，是自發的市場法則所促成的，是盲目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產物，是各

（註三）「合作社運動在鄉村中的任務與農業生產合作社章程的主要原則」，載「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三八——三九期

個私有企業各個資本家間，相互競爭的結果。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爲了追求超額利潤，就不斷改進技術，不斷改善設備，因之，不變資本，特別是固定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重，就不斷地擴大，資本的有機構成就不斷地提高，從而，資本主義社會的平均利潤率，就有下跌的趨勢；縱然在另一方面，由於資本家增强其對於勞動者的榨取程度，由於工資的相對低落，以及由於不變資本的要素日趨低廉，對於社會平均利潤率的下落，發生抵銷的作用，但在根本上，資本主義社會的平均利潤率的下落的趨勢，是無法改變的。

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因爲尚有私人資本主義成份的存在，所以，資本主義的平均利潤率的法則，在國營經濟還不能達到的範圍內，發生着一定的作用。這種以平均利潤率爲基石的資本移動，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初期，對於我們的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生產的發展，是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但是，這種資本主義性質的平均利潤率，在人民經濟中，並不能發生支配的作用，更明確地說，平均利潤率不但不能在人民經濟中發生支配作用，而且將會不斷地削弱其作用，以至於完全被否定。因爲整個國民經濟的關鍵和領導權，是握在人民民主國家的手中的。國家（即集體意識）不但握有銀行、握有重工業和輕工業、握有運輸機關和控制了國內市場，而且通過了它的經濟計劃，去領導人民經濟的各種成份。爲着人民民主國家的整個利益，爲着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國營經濟必須按照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而發展。以重工業來說，在建設的初期，是難於獲得利潤的，不但難於獲得利潤，甚至有「虧本」之處；反之，輕工業是比較易於獲利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國家的投資斷不能片面追求利潤而置重工業於不顧。國家應該有計劃地分配全部積累資金，使必須發展的部門，能够合理地發展，就是當前利潤甚少，甚至可能虧本的部門，亦應給予必要的發展。因此，國家經濟各部門的企業利潤，是不一致的，而且是不需要一致的。國家經濟因爲不需要考慮這一點，所以它就能比資本主義國家更迅速更合理地去發展國民經濟的各部門，從而，在國家經濟中，利潤是受着計劃所支配的。換句話說，新民主主義人民經濟之發展，是依照人民民主國家所預定的任務和計劃去發展，而不是聽其自然的，既然不根據盲目的自發的法則，既然不依存於漫無計劃的自由競爭，那末，在國營經濟的範圍內，那種資本主義性的平均利潤率，就沒有存在之可能了。

但是，在私人資本主義方面，在無組織的市場方面，平均利潤還是存在着。從個別私人資本來說，他們仍然是設法把資本從利潤低的部門移向利潤高的部門的。但因爲國家控制了銀行、控制了重工業和輕工業、控制了市場和運輸機關，私人資本的自由移動，就不免受到限制。同時，政府的金融政策、稅收政策、價格政策和工商行政管理將根據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需要，去指導私人資本的移動，去削弱以至取消資本移動的盲目性，使私人資本的投資，能够配合着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樣一來，私人資本就可以避免盲目的自由移動，而取得正當的發展與合法利潤了。各部門間的合法利潤，大體上是接近於平衡的。但在內容上，這種接近平衡的利潤，並不同於資本主義性的平均利潤，因爲這種利潤率是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之下，在國家的經濟計劃的調節之下進行，而不是受着盲目的資本自由移動的法則所支配的。

由此可見，在人民經濟中，國家經濟的計劃化的利潤與私人資本間的盲目性的趨向平均化的利潤，是對立的，同時，又是密切地在聯系着。跟着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領導權的增强，則那種以私人資本主義成份爲根據的資本自由移動和利潤平均率，就會受到影響，而逐漸改變其內容，逐漸失去其原來的作用，並逐漸增加其計劃化的意義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支配着人的活動，平均利潤率成爲這個社會經濟的槓桿，反之，在人民民主國家中，人們開始支配着資本的活動，國家（集體意識）開始控制着公私企業的利潤了。這也是人們開始從必然走向自由的一個例證！

三 國家企業利潤

我們已經知道：在人民經濟的國家企業中，是沒有剝削和剝削關係的，利潤不再是剩餘價值的變形，而是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勞動者在國營企業中所創造的剩餘生產物，一部分作爲工資直接付給勞動者，其他一部分則留作爲國家企業擴大再生產之用的資本積累。這一部分用去作爲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就叫做國營企業的企業利潤。因此，我們可以說，製造剩餘生產物，就等於創造企業利潤。

國營企業生產了剩餘生產品之後，必須送到市場去銷售，而轉化爲貨幣形態，但這種銷售不同於資本主義意義的銷售，因爲它是按照國家所規定的計劃而進行的。出售商品之後，國營企業便可獲得比較消費在生產過程中還多的貨幣收入。這部分貨幣收入，除了交納國家的貨物稅之外，餘下的一部分貨幣，

就成爲國營企業的企業利潤了。

人民民主國家的國營企業利潤，在性則上，是與資本主義的企業利潤有顯著的差別的。資本主義利潤是剩餘價值的變形，是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成果，利潤的高低決定於剩餘價值量的大小。同時，利潤的大小亦決定於商品實現的自發性的情況。從資本主義生產進程來說，追求利潤是它的基本推動力。反之，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之下，利潤不是剩餘價值的形態，不是剝削的成果，而是爲了人民民主國家的利益，自覺地、有計劃地產生出來的剩餘生產品的一部分，這是國家爲了刺激企業的節約和完成計劃而留給企業的剩餘收入。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並不以追求利潤作爲它的刺激，而是以建設自己的社會作爲原動力的，而是以發展人民經濟和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爲目的的。

因爲國營企業既然以發展人民經濟和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爲目的，因此，國營企業對於利潤的核算，一般地不採取平均利潤的計算方法，而是根據各部門各企業生產成本的精確核算，去確定每一重要商品的計劃價格的。因此，商品的計劃價格就等於商品的生產成本加上計劃利潤。

由於設備與勞動生產率之不同，在國營企業之間，某種商品的個別生產成本，是不一致的，有的高於一般的水平，有的低於一般的水平，各個企業爲追求低於一般的水平的生產成本，就制定目標來實現一定的低成本。這個低成本，就是企業的計劃成本，而企業的計劃成本就是國家制訂某一種生產品全面計劃成本的根據。國家制訂某一種生產品的計劃成本的目的，是在於根據各種條件和可能性，來有計劃地減低生產品的平均生產成本，從而減低商品的售價。

在人民民主國家裏邊，因爲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與個體經濟的存在，就是說，因爲無組織的市場之存在，所以，國家在核定某一種商品的價格的時候，仍舊須要參考市場的價格，即以當時的市場價格作爲研究和處理的對象，同時，又須根據主觀的物資供應量，去規定國營企業的商品價格。國家在規定了各種商品的出售價格之後，才能定出各種生產部門及各種企業的計劃利潤。計劃利潤是計劃成本與出售價格之間的差額。初期的計劃利潤是不能完全正確的，因爲無組織的市場價格，在一定限度之內，還有其一定的作用，因之，國營企業的商品的出售價格，就不免受到它的影響；同時，因爲工業原料與糧食的價格，亦是受着無組織市場之影響的，所以，計劃成本亦不能完全正確執行。計劃成本與出售價格既然不能完全依照計劃進行，那末，計劃利潤也就不免要受到影響了。在人民經濟的初期，計劃利潤祇能是國家企業的一種概略的預算和鬥爭的目標。祇有當國營企業的商品，佔着優勢支配的地位的時候，祇有當國營企業的這種商品，在全國的生產總量和市場供應量中的比重，佔着優勢的地位的時候，祇有當國營企業的這種商品所需的平均勞動量已經能夠代表社會的平均勞動量的時候，人民國家才能在這種商品的價格決定上，擺脫市場的影響，計劃利潤才能有更多的正確性。由此可見，國營企業的計劃利潤的完全實現，是一個相當長時間的鬥爭過程，同時，又是國營經濟的發展過程的反映。

由於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由於企業管理的不斷改善，由於非生產的開支與浪費的逐漸減少以至杜絕，國營企業的商品，不但每個單位的價值日趨降低，而且商品的生產成本亦跟着降低。商品生產成本的降低，是企業利潤提高的主要條件。在這裏，我們應該強調降低成本的重要性，同時，應該認清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不就等於降低成本。蘇聯政治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核算制」一書中，有這麼一段話：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意味着商品價值的降低。然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時卻不一定引起商品成本的自動降低。這是因爲成本並不直接反映勞動生產率的水平；成本是企業的貨幣開銷額。實踐會證明有這樣情形：即雖然勞動生產率已見增長，而成本卻不見降低。這可能是因爲勞動報酬不合理和雜費開銷增加所致。結果，商品價值雖已降低，成本卻反而會上昇，利潤因而降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單位產品價值的降低，只不過提供了降低成本與提高利潤的可能性。爲了把可能性變爲現實，就必須嚴格遵守合理的標準工資制度，必須與非生產開支和浪費進行鬥爭。」（註四）

因此，在國營企業中的工作人員，不但要致力於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要致力於杜絕浪費，致力於降低商品的生產成本。這就是說，只有降低了商品的生產成本，才能提高國家企業的利潤。也就是說，國家企業利潤之大小是與商品生產成本之高低成反比例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人民民主國家的企業利潤，在趨向上也是與資本主義的利潤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的利潤率決定於剩

（註四）東北財經委員會調查統計處譯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核算制」上冊，頁六一

餘價值量的大小與資本有機構成的高低，反之，人民民主國家的企業利潤，則以改善勞動者的生活，提高勞動者的工作情緒和提高勞動生產率與降低商品的生產成本爲前提的。

國家企業利潤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資金積累的主要泉源，所以，我們必須有計劃地使國家企業利潤逐步上升，必須將經濟核算制與經濟機關負責人對虧損的負責性密切配合起來。

可是，我們還應更進一步去把握問題，這就是，人民民主國家的企業，斷不是單單爲了追逐更大的利潤，而是爲了整個人民民主國家的利益，而是爲了國家經濟的資金積累。「假如國家是以使每個企業獲取最大利潤爲方針，則它必將發展那些由於某種原因，在目前最能獲鉅利的工業部門，儘管它們是次要的工業。然而國家卻是有計劃地發展着能保證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的、能鞏固國防能力的工業部門，而不管它的利潤性如何。因此，國家不關閉也不取消那些因某種原因而不能獲利但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極爲重要的企業。」這種情況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盲目追求利潤的情況，截然不同的。斯大林說：

「……觀察利潤問題時，應當從整個國民經濟、從長達數年的遠景出發。只有如此，才堪稱爲眞正列寧主義的觀點，眞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馬克思主義這種對待國家企業利潤的態度，說明了在人民民主國家中，平均利潤率爲什麼開始趨於消滅，又說明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爲什麼能迅速地發展起來。

四　產業利潤與商業利潤

在人民民主國家中，私人資本主義的利潤，是保持着資本主義的性質的。這種私人企業的利潤，依然是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剩餘價值的結果，依然是剩餘價值的變形。在這裏，從事於生產經營的產業資本家，其所得的利潤，叫做產業利潤；從事於貿易經營的商業資本家，其所得的利潤，叫做商業利潤。因爲商品的價值是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所以，商業資本家所得的商業利潤，基本上是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被產業資本家所掠奪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

在人民民主國家中，私人資本的產業利潤，在本質上，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產業利潤，是並無二致的。但因爲它在人民民主國家的環境之下存在；所以，在某些方面，不能不發生着一些變化。這些變化表現在：

第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生產部門間的產業利潤率，是有平均的趨向的；而產業利潤率與商業利潤率亦是有平均的趨向的。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由於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領導，由於人民民主國家執行着一種全國性的經濟計劃，由於人民民主國家掌握了國民經濟的關鍵，這一切，限制着私人資本的自由移動，從而就使投在各部門間的私人資本的利潤，難於形成一種盲目性的平均傾向了。

第二，在人民民主國家中，私人資本主義是不可能離開國營經濟而獨立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對於私人資本主義將一天比一天地加強其領導作用。通過加工定貨，通過租賃制度，通過公私合營，私人資本主義將不斷地變成爲國家資本主義了。在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中，公私的比重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地在變化的。從一般的趨勢來說，國家在這種企業中的比重，將不斷地在提高着。國家資本的比重不斷提高，這種企業的利潤的性質，亦跟着在不斷地改變。這就是說，屬於剝削性的產業利潤的比重，將從相對的縮小走到絕對的縮小；而屬於社會化的國家企業利潤的比重，將從相對的提高走向絕對的提高。這就是說，私人企業的產業利潤，在比重上，在性質上，是不斷地在起着變化的。這種變化，當然爲資本主義社會之所無！

以上所述兩點，說明人民民主國家中的私人資本主義的產業利潤，在本質上雖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並無二致，但因爲它是在人民民主國家的條件之下生存的，所以它就沒法不發生一些變化了。

關於商業利潤，在封建社會裏，它是從掠奪買者與賣者雙方而獲利的，即是說，它是從破壞價值法則而存在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業資本是產業資本的附屬物，商業利潤是以產業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剝削勞動者的剩餘價值作爲前提的。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因爲除了私人資本主義的工業以外，除了廣大的小商品經濟以外，還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和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因此，構成私人商業資本的商業利潤的泉源的，不但有私人工業資本對勞動者所搾取的剩餘價值，不但有廣大個體經濟的商品生產，而且有國營企業的剩餘生產物和生產合作社所出產的商品。在前面，當我們在研究國營企業的剩餘生產物的時候，已經指出國營企業有一部分剩餘生產物是被中間商人當作剩餘價值而攫取去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既然有一部分剩餘生產物被中間商人當作剩餘價值而攫去，那末，合作社和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就更用不

著說了。這就是說，在人民民主國家中，作爲私人商業利潤的泉源，是相當廣大的。

中國是一個小生產佔優勢的大國家，因此，在解放以後，爲了溝通城鄉關係和聯結小生產者，私人商業還有其積極的作用。從而，私人資本的商業利潤，在一定的時期間，還是普遍地存在着的。但存在於新中國的商業利潤，與存在於舊中國的商業利潤，在內容上，是不相同的。在舊中國，因爲它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的，商品的流通過程，控制着商品的生產過程，前資本主義的和殖民地的不等價交換使得商業利潤率超過工業利潤率，使得大都市的商業利潤率超過中小城市的商業利潤率。反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中，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被取消了，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社會基礎被摧毀了，我們完全控制了對外貿易，改變了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侵略的形勢；我們實行了穩定幣值，扶助生產和打擊投機活動的政策，提高了產業資本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和比重；縮小了商業資本的活動範圍，從而就逐步地改變商業資本壓倒工業資本、和商業利潤高於工業利潤的形勢。這就是說，在人民經濟中，商業利潤是以工業利潤爲前提的。

私人商業利潤之存在，意味着在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在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存在着一種中間剝削。這種中間剝削之存在，是有其客觀條件的。這就是國營經濟還未完全掌握着國內商業，還未完全掌握着批發商業和零售商業，而消費合作社和供銷合作社的細胞組織上還未全面地在城市和農村的每一角落展開起來。因此跟着國營經濟的批發業務和零售業務的開展；跟着消費合作社和供銷合作社的業務的開展，跟着人民民主國家的工商行政管理的加強，私人資本從流通過程中所獲得的商業利潤是會逐漸減低的。國營貿易與合作社將一步一步代替私人商業而負担起流通過程的任務，負担起溝通城鄉關係的任務，到了這個時候，過去歸於私人商業的商業利潤，就會轉化爲國家企業的利潤了。

蘇聯紀念「鬥爭報」創刊五十年

爲了紀念斯大林創辦的「鬥爭報」創刊五十週年，聯共（布）中央附屬馬恩列學院在九月中旬舉行了一次科學會議，蘇聯各報刊也都發表了專文。

「鬥爭報」於一九〇一年九月在巴庫創刊，當時正是列寧創辦的「火星報」出版之後數月。這個報紙是喬治亞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秘密報紙。它和火星報一道，爲了建立新型政黨——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而進行堅決的鬥爭。「鬥爭報」也像「火星報」一樣，是當時革命運動中的集體的宣傳者、鼓動者和組織者。它無情地揭露了「經濟主義」和其他機會主義者的錯誤思想，揭露了所有各種各樣敵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潮流。

參加馬恩列學院科學會議的有該學院的科學研究員，各高等學校、科學研究機關、黨和政府的工作者。會議聽了三個報告：「斯大林同志是外高加索馬克思主義組織的創始人和指導者」；「『鬥爭報』是俄國『火星報』以後的最好的馬克思主義報紙」；「『鬥爭報』的出版和傳播」。該院爲這次科學會議，還舉辦了一次紀念「鬥爭報」五十週年的展覽會。展覽會上的文獻材料，表現出「火星報」和「鬥爭報」的光榮歷史，表現出「火星報」和「鬥爭報」在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鬥爭中的巨大作用，顯示出列寧和斯大林在革命思想上的合作和他們的革命活動。

莫斯科文化科學界
紀念魯迅逝世十五週年

爲紀念中國作家魯迅逝世十五週年，莫斯科文化科學界人士上月十七日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舉行了特別會議。參加的有蘇聯漢學家、東方學家和高等教育機關的學生多人。蘇聯經濟學博士馬斯連尼柯夫致開會詞。他敘述了魯迅的生平和活動，並指出：魯迅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勇猛戰士。他是蘇聯的誠摯的友人，而且曾在中國努力傳播俄國的文學和藝術。蘇聯語言學學士愛德靈在會上作了題爲「偉大的革命作家魯迅」的報告。愛德靈說：魯迅創作了爲人民所喜愛的深刻的現實主義的作品。他是熱情而卓越的政論家，他的具有非常傑出的形式和豐富的政治內容的文章，直接打擊着帝國主義侵略者。魯迅作品中的人物，他的文章中的熱情語言和他的艱苦而光輝的一生，鼓舞着一切向黑暗勢力作鬥爭、爭取人類光明前途的人們。

會上並宣讀了蘇聯語言學博士費多連柯的「魯迅和蘇聯文學」的報告，論述俄國文學對魯迅的作品的重大影響。最後，由柯羅科洛夫教授用華語朗誦了魯迅的幾篇作品。

十九日，蘇聯各報都發表了紀念魯迅逝世十五週年的文章，並刊載了魯迅的照片。各報並登載中國紀念魯迅的消息。莫斯科中央廣播電台也廣播了「偉大的中國作家魯迅」的紀念文章。

學術簡訊

馬克思的「資本論」爲什麽從商品分析開始？

劉及辰

「資本論」是一部偉大的科學的和革命的著作。馬克思把過去的思想和經驗加以正確的和深入的批判而科學地結晶於「資本論」中，所以「資本論」不僅是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而且是一部包羅各種科學知識的巨著。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無比敏銳的分析力，揭櫫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正在創造着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並且指出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革命道路。因此，「資本論」是無產階級鬥爭的一個有力的武器。

在我們研讀「資本論」時，必須時刻體會到它裏面的那種革命精神，而且要把它付諸實踐，這樣才不是讀死書，才有用處。這就是馬克思列寧所屢次着重指示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精神。馬克思在致魯格的信中曾說：「我們並不對世界說：停止你們的鬥爭，你們的一切鬥爭都是胡鬧。我們將給你們眞正的鬥爭口號」。像這樣眞正的鬥爭口號，却充滿在「資本論」裏面。列寧斯大林和毛主席，都忠誠地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他們領導着廣大的人民進行革命，獲得了偉大的勝利，並由革命鬥爭中所創造出來的新條件下的新經驗，發展和光大了馬克思主義。

*　*　*

所以，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一定要研讀「資本論」。但是研讀「資本論」，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必須先要有個初步的準備知識；而準備知識中首先要知道的就是關於「資本論」結構的方法問題，特別是關於它的端緒問題。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雖沒有另立一章，把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給我們指示出來，但是在「資本論」中却蘊蓄着一種有嚴密組織的科學方法。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雖然沒有留下論理學，但他却留下『資本論』的論理學」。凡是理解「資本論」的人，沒有人不知道：「資本論」的各個章節，沒有一處不是依據他的一貫邏輯的，也就是說，沒有一處不是蘊蓄着有嚴密組織的科學方法的。

我們都曉得，「資本論」開宗明義第一章所講的，就是「商品」。這「商品」，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端緒」。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段話中就說：「我們的研究必須從商品分析開始」。列寧在「關於辯證法的問題」中也說：「這個方法乃是呈現所必要的方法」。我們要想明白「資本論」爲什麼必須由商品分析開始，那我們就必須先把商品概念說明一下。

作爲「資本論」端緒的商品，不消說，是一個最單純的最抽象的概念。但馬克思所主張的這個概念，決不是和表象及直觀相分離的，而是和它們密切關聯着的。因爲只有表象及直觀才能供給思惟方面以豐富的具體材料。思惟離開了具體材料是虛玄的，富有內容的思惟必須要以具體材料爲前提。所以馬克思說：「就在經濟學之理論的方法上，主體即社會總常要浮在念頭上認定爲前提」（「政治經濟學批判」、郭沫若譯、二七八頁）。總之，馬克思並不像古典學派那樣，把理論和表象兩者分離孤立起來，而是把它們兩者視爲辯證法的統一。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文中說：「在資產階級社會內，勞動生產物的商品形態或商品的價値形態，是經濟的細胞形態」。這裡所說的「商品形態」，不是別的，正是由現實存在着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多種多樣的經濟現象中抽出來的一個最單純的抽象。這種抽象，因爲它是以現實存在着的資產階級社會爲前提的，所以它不是那種個人構想的抽象，而是一種歷史的具體的抽象。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端緒「商品」這一個最單純的抽象，不是一種空虛的毫無內容的抽象，而是一種現實的具有豐富內容的抽象。馬克思之所以能由最單純的抽象即商品中，發現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矛盾的發展規律，就是因爲商品這一個單純的抽象，是具有着一種現實的豐富的內容的。

上面所講的，是由具體向抽象上昇的方法。也就是從感性認識上昇到理性認識的方法。在分析具體而複雜的經濟現象時，這個方法是很必要的。馬克思說：「在分析經濟形態時，旣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反應藥，那必須用抽象力」。列寧也說：「對於客觀認識的運動，往往祇是辯證法的才能行。」

辯證法走的是往返的兩條路線。第一條路線是由具體向抽象上昇的，第二條路線是由抽象向具體上昇的。上面所講的是第一條路線，下面就應該接着講講第二條路線。

這第二條路線，正和第一條路線相反，是由第一條路線所得的結果即最單純的最抽象的概念出發，從它那裏引出種種思惟範疇來。例如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上，我們就由最單純的最抽象的商品概念出發，而由它那裏引出來貨幣、資本、剩餘價値、資本主義積累、生產價格、利潤、利息、以及地租等等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經濟範疇。這種由抽象到具體上昇的理論過程，是和由簡單到複雜的歷史發展過程相一致的。因爲馬克思告訴我們：歷史是理論的基礎，理論是歷史的反映；所以論理的構思，決不是由人們腦海憑空臆造出來的，而是由它把歷史的發展過程重新表現出來的。因此，理論和歷史兩者是一致的。恩格斯這樣說過：「歷史開始時，思惟的行程也必定開始」。這即是說，思惟的行程，不過是被移植和被加工在人們腦海中的一種物質的歷史過程。因此，從抽象到具體上昇的理論方法，是照應着從單純到複雜的歷史發展過程的。例如「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所講的商品及貨幣，還是一個「單純化」的形態。那時，這個單純化是從兩方面進行的：一方面捨棄了自然經濟的殘滓，另一方面又捨棄了一切特殊的資本主義關係。因此，在第一篇裏，我們還不能知道資本家、工資勞動者，以及大地主等等是些什麼東西。像這樣的一個抽象，是把研究的對象——商品及貨幣——當作最純粹的形態來研究所必然引起的，即只把商品及貨幣看作表現商品諸關係的範疇時所必然引起的。這樣的一個理論，同時也就是歷史的反映。

不過，我們還要知道，那反映着發展了的具體的一定關係之抽象，是先行於具體的；這是和單純東西先行於複雜東西一致的。例如「在資本、銀行及工資勞動等等尚未存在之前，貨幣能够存在，而且史實上是存在着的，所以從這方面看來，也可以說，較爲單純的範疇，能够表示一個較未進步的總體之主要的諸關係（這些關係），在總體尚未進步尚表示於一個較爲具體的範疇之前，史實上已經有共存在。在這個範圍內，由最單純的昇向複合的，那種抽象的思惟之法則，與實際的歷史的過程相適應」（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論）。馬克思在「資本論」裏也說：「價格與價値的運動，是被價値法則支配的，這個事實，可姑置不論。現在單就商品價値來說，它不僅在理論上是在生產價格之前的，而且在歷史上也是在生產價格之前的。這種說法，完全是正確的。」

此外，我們更要注意一點，即早期的範疇，是常常作爲靠它而產生出來的更發達的範疇之一種隸屬的低級範疇。例如在地權支配的一切形態中（即在農業生產佔優勢的一切社會中），社會的一切關係沒有不是依賴於農業生產的生產形態的；但是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情形就不同了：因爲資本主義社會的工業代替了以前的農業的地位， 而使它完全受着資本的支配了。又如商品的諸關係，固然發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而前者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及發展的條件；但是，一經形成了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便把商品的諸關係隸屬於它自已。我們由這個情形來看，好像理論的體系和歷史的秩序是不相適應似的。但是，我們須要知道，理論的體系，決不是反映着歷史現象的單純繼起的秩序，而是反映着歷史本質的秩序。所以，馬克思對於那些描述歷史現象的繼起秩序的理論，批評它們是錯誤的。

眞實的歷史是這樣的歷史，即它是從這一個現象移行到另一個現象的內部推移的（它指一種本質的變化），同時後者又把前者包括在它自身的歷史中。換言之，即眞實的歷史的過程，乃是通過矛盾而行的一個從比較單純移行到比較複雜的內部推移的運動。所以，馬克思所說的理論的體系，雖和歷史現象的秩序有的場合不一致，但它和歷史本質的系列却是一致的，是辯證法的統一的。

歷史發展的途徑，已於前述，是由單純向複雜上昇的。同樣，理論的途徑也必須是反映着歷史發展的途徑，由單純向具體上昇。因此，「資本論」所研究的理論上的規律，正是資本主義社會在歷史上發生、發展、和死亡的規律。當做「資本論」端緒的「商品」，正如前面所說，是一個最單純的抽象，然在事實上它確是一個資產階級社會的細胞形態，它是資產階級社會一切矛盾的根苗。我們的分析若由商品開始，便會一步一步有條不紊地把資產階級社會一切矛盾的發展，從頭至尾地反映出來。

現在讓我引用列寧說的一段話，做爲本文的結論。他在「關於辯證法的問題」中說道：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首先分析了這個最簡單、最平常、最典型的資產階級商品社會的日常關係，這種日常關係，是千萬次可以觀察到的。在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中（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細胞』中），這一分析把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者說，一切矛盾的根苗）揭露出來。 更進一步的呈現，又指示了這些矛盾的發展（生長亦且運動），指示了這種社會在它的基本的構成部份中，從頭到尾底發展。」

學習斯大林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

王　南

斯大林在「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這一著作中，指出歷史上只有兩種民族類型：資產階級民族和社會主義民族。關於社會主義民族的理論，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中這是第一次提出；這對於我們今天研究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境內諸民族的發展方向，對於制定和理解我們的民族政策，都有莫大的意義。學習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時，對於這點應當特別着重。

全書係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斯大林答勉希科夫、柯華爾秋克及其他同志的一封信。這信共分四節，其第一節標題爲「民族概念」，論辯什麼是民族。斯大林指出：「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以四個共同基本特徵爲基礎而產生的穩固的人們共同體，這四個基本特徵就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和表現在民族文化共同特點中的共同心理狀態。」這與斯大林在距寫信十六年以前對民族所作的規定，完全相同（請參讀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而這一理論，不僅如斯大林所說，「在我們黨內已經獲得公認了」，而且是全世界革命者所接受的關於民族這一概念底科學的定義。

勉希科夫等同志，在「民族概念」這一問題上所發生的錯誤，可以說，是把「國家」與「民族」兩個不同的範疇，拉扯到一起，因而陷入了混亂。他們建議，除了斯大林所規定的民族四個特徵以外，要再添加上「具有自己單獨的民族國家」，把這當作民族的第五個特徵。

斯大林列舉愛爾蘭人、挪威人、烏克蘭人各自形成民族，但並不與他們是否「具有自己單獨的民族國家」相關聯。相反的，如果說僅僅具有自己單獨國家的民族，才是民族，那麼單以烏克蘭人爲例，就會忽而承認它是一個民族，因爲它已經和蘇聯分離，在中央拉達和斯可羅巴德斯基統治下，建立了「自己單獨的國家」；忽而又必須否認它是一個民族，當它後來加入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可是，事實上，無論在前一個時期，或在後一個時期，烏克蘭人所具有的民族之四個特徵，並沒有變動，因而它始終是一個民族。如果承認了所謂民族的第五個特徵，就反而陷入上述混亂的論斷之中。

而且依照這種民族第五個特徵的說法，斯大林指出：「所有喪失了獨立國家權利的被壓迫民族，就只好從民族範疇中一筆勾銷，同時被壓迫民族之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殖民地各族人民之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只好從『民族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概念中取消了。」這顯然是錯誤的，它「不可避免地會引導到替民族壓迫、帝國主義壓迫作辯護」，給錯誤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作辯護。」我們可以說，現實就是斯大林這一科學論斷的鐵證。例如日本人，在美帝國主義佔領之下，已經喪失了自己單獨的國家，可是日本人還是一個民族，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還是民族運動的鬥爭。我們中國人更能深刻體會到斯大林這一論斷的科學性與正義性，因爲我們經歷了長期的殘酷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鬥爭，才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建立起獨立自主的人民國家。

斯大林的結論，認爲要給「民族概念」增加第五個特徵，「是大錯特錯的，不論在理論上或者在實踐上——在政治上都不能證明是對的。」

「民族概念」已經明確了，那麼，合於這樣規定的民族，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和發展的呢？這就進入信中的第二節。而在第二節的論辯中，又更加豐富了「民族概念」的內容，它的正確性也就更加突出了。

× × ×

第二節的標題爲「民族底產生和發展」。勉希科夫等同志說「民族還在資本主義以前已經產生並存在着了」，斯大林根據民族四個特徵在資本主義以前（例如封建主義時期）不能具有，來加以駁斥，因而判明了民族在資本主義以前已經產生和存在了的說法，是錯誤的。

斯大林指出，有了民族市場，民族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有了這些因素才能消滅經濟方面的割據現象，把原先彼此隔絕的部分聯結爲一個民族整體；也就是消滅封建主義和封建割據，造成了統一，這時就有了民族。這就確定了，在歷史上什麼時代產生和形成民族呢？只能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而不能

在資本主義以前，不能在封建主義時代。

那麼，承認不承認民族要素中的語言、地域、共同的文化等等，在資本主義以前就發生了呢？這是個「可能性與現實」的問題。斯大林指出這些民族要素都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逐漸地創造出來的，「但這些要素當時是處在萌芽狀態中，至多也不過是將來在某些有利條件下形成爲民族的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只有在資本主義上升以及民族市場、經濟和文化中心產生的時期才變成了現實。」

我們知道「可能性」還不等於「現實」。我們知道，在「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中，斯大林已經提到：「必須着重指出，把上述種種特徵中任何一種特徵單獨拿來，都不能作出一個民族的定義。況且：只要這些特徵中缺少一種特徵，那民族就不成其爲一個民族了。」因此斯大林肯定地說：「只有一切特徵通統具備時，才算是一個民族。」由此可見，民族的某些「要素」雖然在資本主義以前已經萌芽，但還不能說那時民族已經產生了。

這種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發展成的民族，就是「資產階級民族」，它成爲兩種民族類型之一。「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的政黨在這個時期始終是這種民族底領導力量。」

「資產階級民族」是兩種民族類型之一，另一種民族類型就是「社會主義民族」。在歷史上，蘇聯第一次出現這種類型的新民族。

如果說「資產階級民族」是資本主義上升時代形成的，那麼，「社會主義民族」便是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形成的。

如果說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的政黨是「資產階級民族」的領導力量，那麼，工人階級及其國際主義政黨就是鞏固和領導「社會主義民族」的力量。

如果說「資產階級民族」的思想和社會政治的內容，是在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政黨領導之下，「爲了『民族統一』以求取民族內部的階級和平；掠奪其他民族領土來擴大自己民族底土地；對其他民族不信任和仇視；壓迫少數民族；同帝國主義結合成統一戰綫」，那麼，「社會主義民族」的精神和社會政治的面貌，就是在工人階級及其國際主義政黨之下，「爲了消滅資本主義殘餘和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而在民族內部建立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爲了各個民族及少數民族底平等權利和自由發展而消滅民族壓迫底殘餘；爲了樹立民族間的友誼和奠定國際主義精神，在反對掠奪及掠奪戰爭的政策的鬥爭中、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與一切被壓迫的和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結成統一戰綫」。

如果說「資產階級民族」的命運，「是與資本主義底命運聯結在一起的，隨着資本主義底崩潰，這種民族勢必退出舞台。」那麼，「社會主義民族，它們比任何資產階級民族更團結和更有生命力得多」，「比任何資產階級民族更具有全民性得多」。

以上這些，就是「資產階級民族」與「社會主義民族」之間的、斯大林所說的「原則的區別」。

「沙俄是各民族的監獄。……沙皇政府是屠殺非俄羅斯民族的劊子手，是拷打非俄羅斯民族的掌刑人。」（引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章第一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尚處在封建社會階段上的邊疆民族，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它們不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不形成「資產階級民族」，直接就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成爲「社會主義民族」。

由於斯大林的教導，我們應該懂得，不能脫離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不能脫離一定的社會制度、社會經濟結構，孤立地來討論關於民族的問題。

斯大林批評勉希科夫等同志時，說「你們沒有把民族問題看作有關整個社會的社會政治發展總問題底一部分並且服從於這個總問題的，而是看作某種孤立的和恒久的，在歷史進程中基本上不變更自己的方向和性質的東西。……民族問題並不是始終只是有同樣的性質；民族運動底性質和任務是依據革命發展時期底不同而變化的。」

中國過去不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現在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將來不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是由封建社會而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然後通過新民主主義社會而走向社會主義社會。

依據中國近代歷史這樣一個發展的情況和必然的規律，運用斯大林關於兩種民族類型的理論，那麼，我們對當前中國境內諸民族底發展方向，應當作怎樣的理解呢？

以下，我提出自己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時，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請求同志們批評。

可以說，漢族在今日以前，已經發展成爲斯大林所說的「資產階級民族」類型的民族，因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的緣故。當然，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民族，它不會和處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民族完全一樣。

漢民族以外的其他兄弟民族，有些在過去是已經發展成爲「資產階級民族」類型的民族，但也有些由於歷史條件的關係，社會發展底階段還滯留在資本主義以前。它們過去沒有能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使自己走上「資產階級民族」的道路。今天，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隨着新民主主義建設在全國範圍內、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深入和展開，它們就不可能再照舊滯留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狀態中了，它們必然要有重大的發展，它們要形成爲民族。

同時由於新民主主義建設在全國各方面的深入和展開，又使得各個兄弟民族的發展方向，不可能是向着「資產階級民族」，而必然是向着「社會主義民族」。向着「社會主義民族」發展，應該是中國各民族（包括漢民族在內）發展的前途和方向。但是，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內，向着「社會主義民族」發展的民族，還不能立刻就形成爲（達到）「社會主義民族」。說「向着社會主義民族發展」，還不是說已經形成爲「社會主義民族」。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中，中國各民族既非「資產階級民族」，也還不是「社會主義民族」，而應該是「從封建主義社會來，要到社會主義社會去」的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上的「新民主主義民族」。

斯大林說，「資產階級民族」與「社會主義民族」「這就是歷史上所知道的兩種民族類型」。那麼，「新民主主義民族」是屬於那一民族類型的呢？或者它是兩種類型以外的另一種類型呢？「新民主主義民族」並不是在兩種民族類型之外，另成一種獨立的民族類型。它應該是屬於「社會主義民族」這一類型的，雖然它本身還不是「社會主義民族」。「新民主主義民族」是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的，是在民族內部建立工農聯盟的，是實行民族權利平等和自由發展而消滅民族壓迫的，是與一切被壓迫的和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結成統一戰綫的。這些由今天的事實證明了，今後還會有更多的證明。從這些方面看來，「新民主主義民族」應該是屬於「社會主義民族」這一類型的。

這種向着「社會主義民族」發展的「新民主主義民族」，比起任何「資產階級民族」來，必然是「更團結和更有生命力得多」，「更有全民性得多」。比起「社會主義民族」來，在這些方面，還必然是差些的，而且「社會主義民族」「它們沒有那些腐蝕資產階級民族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新民主主義民族」雖然打倒了官僚資本主義，打倒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消滅了和正在消滅着封建主義，但仍然不是完全沒有了階級矛盾，不過，新民主主義政治不會讓這種階級矛盾起着「腐蝕」作用，起着阻攔向着「社會主義民族」發展的作用。

× × × ×

第三節標題是「各民族和各民族語言底未來」。如果說第二節是論述和剖析「世界上有各種不同的民族」（兩種民族類型），是關於民族的發生和現狀的，那麼，第三節就是論民族前途的。

第三節的中心問題，是到什麼歷史時期，民族區分和民族語言才會消滅，即民族區分被各民族溶合所替代，各民族語言被統一的共同的言語所替代。換句話說：民族是怎樣衰亡的。

這兩節綜合起來，便是民族發展全過程的概括。

依據斯大林的指示，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時期，還未具備有各民族的溶合以及各民族語言的溶合所必需的條件，這時期民族不會衰亡。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勝利，已經消滅了民族壓迫、民族國家的壁壘，但民族區分和民族語言，仍然存在。

不僅如此，社會主義在蘇聯一國的勝利，給從沙皇制度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各民族的復興和繁榮，創造有利的環境。斯大林指出：「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減少而是增加了語言種類底數目，因爲它震動了人類底最下層，並把他們推上政治舞台，使早先爲大家所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許多新的民族覺醒過來趨求新的生活。誰能想到舊的沙皇俄國是不下於五十個民族及民族集團的國家。可是十月革命，打破了舊的枷鎖，把許多被遺忘了的民族和部族推上舞台，給與了他們以新的生活和新的發展。」

在毛主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取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中國，各兄弟民族及其民族語言，開始走上發展和繁榮的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消滅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民族壓迫；反對大民族主義（例如國民黨反動派的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使新中國成爲各民族友愛合作團結的大家庭；和十月革命一樣，「使早先爲大家所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許多新的民族覺醒過來趨求新的生活」，而他們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也就能逐步得到這種生活。所以，有如此衆多的民族擁護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的現象，完全不是偶然的。我們中國當前的實況，也同樣證實了斯大林這一理論的正確性。

根據斯大林的指示，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時期，雖然在一個國家內消滅了帝國主義，嚴重地削弱了世界帝國主義，但帝國主義征服異己民

族的企圖以及這些民族在被奴役的威脅面前的恐懼還是存在着，這種情況使得民族間的隔離、仇視、衝突還會存在。只有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期，由於消滅了一切國家裏的帝國主義，消滅了上述的民族情況，把各民族在統一的社會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內聯合起來，從而創造爲一切民族逐漸溶合爲一個整體所必需的現實條件。

有種不正確的說法，認爲在世界帝國主義失敗以後，使用從上面下命令的辦法，就可以一下子把各民族差別消滅，把各民族語言自行滅亡。斯大林對這種不正確的認識加以駁斥，指出同化政策以及與同化政策相等的政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寶庫中所絕對不容許有的。列寧教導我們：「正如人類只有經過被壓迫階級專政底過渡時期才能達到階級底消滅一樣，人類只有經過一切被壓迫民族底完全解放、即完全自由分立的過渡時期，才能達到各民族不可避免的溶合。」（斯大林引自列寧所著「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

從列寧所說的「分立」過渡到「溶合」，「分立」的自由恰是爲了達到不可避免的「溶合」，這正是民族發展的辯證法。

最後，斯大林指出共同語言出現的過程。關於民族與民族語言發展的理論，在著作「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的次年（一九三〇年六月），斯大林在所作「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與結論」中，有極重要的論證。斯大林在去年發表的偉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對於在共產主義條件下民族與民族語言如何發展的問題，同樣給了我們以寶貴的指示。

× × × ×

第四節標題是「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政策」。斯大林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怎樣解決民族問題的論述，給了我們一個運用辯證法的光輝的範例。

斯大林批評勉希科夫等同志的錯誤時說：「你們沒有把民族問題看作有關整個社會的社會政治發展總問題底一部分並且是服從於這個總問題的……不懂得在各個不同的革命發展階段上革命底性質和任務一經變更，就要引起民族問題底性質和任務相適應的變更，不懂得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與一個革命發展時期相關聯的政策和這個時期分離開來，而隨便搬到另一個時期去。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始終是從下列原理出發的：民族問題是革命發展總問題底一部分，在各個不同的革命階段上民族問題具有着與每一既定歷史時期的革命性質相適應的各種不同的任務。」

接着，斯大林論列俄國民族問題底三個時期。

（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時期，那時候，歷史在俄國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作爲當前的任務，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就把民族問題的解決與俄國民主革命的命運聯結在一起。黨在這個時期的政策，就是推翻沙皇制度，消滅封建殘餘並使全國充分民主化。

（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大戰削弱了世界帝國主義的力量，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達到極點，殖民地和附屬國掀起解放運動，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結成了統一戰綫，社會主義革命成爲這個時期的任務。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爲必須把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解決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命運聯結在一起。黨的政策也就依據這點而變更了。

（三） 俄國革命發展當前時期，消滅了民族壓迫和實行民族的權利平等，產生出「社會主義民族」，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友好合作。此外，黨的民族政策中更有三點引起我們的注意，即：（甲）職工會、合作社等經濟和文化機關的民族化；（乙）培養自己黨的和蘇維埃的民族幹部；（丙）管制那些企圖阻礙黨實現其民族政策的分子。

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反動陣營，一方面，企圖利用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來分裂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隊伍；另一方面，又妄想利用「世界主義」來麻痺和削弱各國人民爲他們民族獨立和解放所進行的鬥爭。正當這個時候，列寧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的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對於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幫兇、對於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以及對於建設新中國的民族大家庭，就具有莫大的戰鬥意義與指導建設的偉大作用。

附記：「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有曹葆華、毛岸青的中譯本。本文中引證文句，未加說明者，均係引自該譯本。

本社啓事

本刊所載各文，除報紙雜誌外，非經本社和作者同意，請勿轉載！

關於漢字改革問題的提法

迭　肯

漢字的改革，是新中國文化建設中的一項重要的工作。關於漢字改革的方案，至今還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本刊願意提供一部分篇幅，來進行這種討論。

——編　者

「新建設」第四卷第六期發表了趙宋光先生的「論漢字改革問題的提法」一篇文章。大意是說：第一、拉丁化新文字已經失敗了，「一直走到絕路」，因爲拉丁化者對於漢字改革問題的提法根本不對，他們犯了片面誇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錯誤，使漢字改革運動變成主觀主義的革命的空談；第二、漢字改革問題的正確提法是：漢字拼音化是漢字內部矛盾所爆發的革命，因爲漢字發展的歷史是漢字自己的字音和字形兩個方面鬥爭的歷史。我覺得趙先生並不十分了解漢字改革運動，也沒深入地研究語文問題，因此，他的理論是似是而非的，有許多地方是自相矛盾的。現在，我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來，請趙先生和關心漢字改革問題的同志們指正。

一　自相矛盾的理論

從全篇文章的立論看來，趙先生似乎並沒有有系統地研究中國語文問題，也沒有從運動的發展上去批判拼音文字。他只是斷章取義地把斯大林「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裏的某幾句話套在自己的理論上，因此，全篇的議論就免不了互相矛盾，不能成一體系。比如：

（一）既把語言當做人們交際的工具，又把文字看做有機界或社會制度。

趙先生引伸了斯大林論語言的大意，說：「因爲文字，正如語言一樣，不是上層建築，不是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化消滅而變化消滅的，它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會、全社會各個階級幾百代努力所創造的。」文字的創造、發展、變化和改革是不是完全和語言一樣，這裏且不談。可是趙先生把文字的改革和社會制度的改革，把文字的發展和有機體的生長混爲一談，這是值得考慮的。他說：「漢字卻有它自己革命的規律。」什麼是漢字自己革命的規律呢？他就引用社會發展史的規律說：「漢字本身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字的音……另一方面是字的形……漢字發展的歷史是這兩個方面鬥爭的歷史。」「漢字拼音化是漢字內部矛盾所爆發的革命。」

這種文字自身革命論是沒有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根據的。

第一、文字的音和形是任何一種文字必要的組成部份，就是拼音文字又何嘗沒有字形呢？這兩個必要的組成部份怎麼可以看做自身互相鬥爭的對立物呢？很顯然的，趙先生的這幾句話是根據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裏的一段話而改寫的，可是他又把那段話裏面最主要的一句結語删去了。那一段話是：

「自然界的對象或自然界的現象含有內在的矛盾，因爲所有這些對象或現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過去和將來，都有其衰頹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而這種對立面底鬥爭，舊東西與新東西間的鬥爭，衰亡着的東西和產生着的東西間的鬥爭，衰頹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間的鬥爭，便是發展過程底實在內容，由數變（量變——編者）進到質變的這一過程底內容。」（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九四八年莫斯科中文版，頁一三八。着重點是我加上去的。）

趙先生把漢字的字形認爲是舊的、衰頹着的東西，把漢字的字音認爲是新的、發展着的東西。因此，他就肯定：「漢字拼音化是漢字內部矛盾所爆發的革命」，也就是說，漢字的音和形這兩方面的鬥爭，就是漢字發展過程的實在內容。可是上面所引的斯大林的一段話是說明：兩種東西的鬥爭就是由數變（量變——編者）進到質變的這一過程底內容。趙先生既然認爲文字，正如語言一樣，是沒有突變的，於是一面否定文字的突變，一面又說漢字拼音化是漢字內部矛盾所爆發的革命。

第二、如果文字發展的歷史，像趙先生所說的那樣，是字音和字形這兩方面鬥爭的歷史，那麼，文字擺脫了原始字形的束縛而獨立，而勝利地發展成拼音文字以後，文字就不能再發展了，各國所有的拼音文字，包括古代的希臘文、拉丁文，歐美的現代文字，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好些個共和國裏所創造的拉丁化新文字，外蒙古用俄文字母的新文字，以及印尼、越南、中國彝族所採用的新文字，都不能有其發展的歷史了。因爲根據趙先生的理論，文字的改革和發展不是由於其他的因素，而是由於文字內在的矛盾，就是字音和字形兩個對立物的鬥爭，等到字音征服了它的對立物，得到了勝利，化身爲字母而表現出來，矛盾解決了，鬥爭失去了對象，文字發展的歷史就此告終。如果文字發展的歷史並不如此，如果拼音文字也有它發展的歷史和前途，那麼文字改革的因素決不是字音和字形自身的鬥爭，這是誰都看得出來的道理。

第三、我們把文字看作人們交際的工具，這是不錯的。可是工具的創造和不斷地改進，應當從社會發展上去了解，決不能看成工具本身鬥爭的結果。生產往前發展，人們不斷地改進工具，甚至創造新工具。我們總不能說工具的創造和改進，是工具內部矛盾所爆發的革命。難道趙先生認爲人們沒有工具之前，工具的創造是工具內部矛盾所爆發的革命嗎？就拿人們交易的媒介物和交通工具來說吧：貝殼發展而爲紙幣，獨木舟發展而爲汽船，手推車發展而爲火車……難道這些東西的精益求精不是由於生產的發展和人們的努力，而是貝殼因內部矛盾的鬥爭而變爲紙幣，獨木舟因內部矛盾的鬥爭而變爲汽船，手推車因內部矛盾的鬥爭而變爲火車？

我們認爲漢字的改革，尤其是在今天，不是什麼「漢字內部矛盾所爆發的革命」，而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得到了勝利的今天，在政治上經濟上翻身的工農大衆必然的要求。人民大衆要求學文化，要求減少文字在教學上的困難。因此，漢字的改革「也就是民主革命無可逃避的任務。」

（二）既肯定了文字的統一性，又否定了統一的語言的必要性。我們認爲漢字不是表音文字，沒有一定的讀音，因此，同樣一個漢字，各地的人可以照各地的口音來讀，這是漢字的優點。可是這個優點反過來又變成了讀音不能統一的缺點。當然，漢語不統一有它種種原因（如經濟、政治、交通等）。拉丁化者決不會倒因爲果地說：「因爲中國有了漢字，漢語才分歧起來。」可是如果有人說：「因爲漢字讀音的不統一，在教學上就會妨礙語言的統一」，這是誰都能理會得到的。比方說，一個「人」字，可以念做 rhen, len, in, ning, gin（濁音），lang，等等，讀音怎麼會統一呢？拼音文字必須照一定的讀音念，這不是幫助了語言的統一嗎？這樣說法，我們認爲是完全合理的。照趙先生的說法，在各地語言音很不一致的情形下，漢字讀音的不統一，正是漢字的優點，就該保持下去，而且即使改成拼音文字也該保持這個讀音不統一的優點。他說：「我們的提法，因爲主張發展漢字的音，所以主張用拼音方法把漢字的音照樣的表示出來，保留它原有的特性，容許同一個字，在各地念各地的音。這樣就保持了文字的統一性。」如果這是爲了遷就目前語言不統一的落後情形，那麼，趙先生的話正符合了拉丁化者容許各地的文盲可以照各地的方音去拼寫的提法。如果爲了長遠打算，那麼，一個統一的民族總該學習一種共同的普通話，至少文字的讀音應該走向統一。

趙先生又說：「拉丁化使統一的民族文字分裂爲好幾種方言文字。」這句話對不對呢？我們可以完全用趙先生的說法來回答：「事實上方言文字的不統一，正是語言音不統一的結果。上述的這種說法，顯然是倒因爲果。而在各地語言音很不一致的情形下，方言拼音文字的不統一性正是其優點，而不是什麼應該排斥的缺點。」何况拉丁化者的努力是在推行北方話拉丁化（就是普通話新文字）作爲全國性的文字，方言拼音只是普通話新文字的支派，並不希望它有發展的前途的。

（三）既肯定說漢字服務得很好，又說漢字必須改革。趙先生說：「原有的文字（漢字）同樣可以記錄他們（文盲）的語言，可以爲他們像原有的知識份子一樣服務得很好。」這是說趙先生對於原有的漢字很滿意，肯定它可以替文盲大衆像原有的知識份子一樣服務得很好，同樣可以記錄大衆的語言。可是後來他又說：「我們把漢字教給工農羣衆，固然有許多教學上的困難……」又說：「漢字的音，是優勝的，革命的，而它的形呢，是笨拙的，起着相反作用的。這就是矛盾的鬥爭。原始字形的形體，總是跟不上語言的發展，不能簡單明瞭地表現豐富的語言，約束着字形表現音的能力，阻礙着文字的發展。這就是漢字難學、難寫、難印刷等等的根本原因。」爲什麼一忽兒趙先生又說漢字的字形是笨拙的呢？爲什麼把可以爲人民大衆服務得很好的漢字說成難學、難寫、難印刷的呢？爲什麼把同樣可以記錄大衆語言的文字說成不能簡單明瞭地表現豐富的語言呢？因爲這兒他要提出所謂「漢字自己的革命規律」。這是說：當拉丁化者提出要改革漢字，趙先生就說漢字很好；當他自己要提出一個漢字革命的理論來，他就說漢字很壞。究竟漢字是好是壞呢？是適合不適合工

農大衆的學習呢？是能表現人民大衆豐富的語言呢還是不能表現呢？是優美的呢還是笨拙的呢？趙先生自己還沒有搞清楚。

（四）既主張要拼音，又堅持單音制。 看了趙先生的文章，知道他是反對漢字拉丁化的，可是他又認爲漢字拼音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這一點我們是可以同意的。如果我們能有一種比拉丁化更好的漢字拼音化，我相信凡是有理性的進步的中國人是不會反對的。雖然趙先生的拼音方案還沒發表出來，可是從他這篇文章上看來，我們已經可以知道趙先生心目中的拼音方案的輪廓了：第一、他的漢字拼音化是「叫音化身爲字母而表現出來，」就是「給音擺脫原始字形束縛而獨立」的，也就是用字母拼音而無字形的文字；第二、他既然反對國際化的拉丁字母，那「叫音化身爲字母而表現出來的」一定是漢字形聲字中捨形取音的部份；第三、他既然否認漢語是多音節的，那麽他的拼音化一定是採取單音節拼寫的；第四、他的拼音字保留着漢字讀音不統一的特性，「容許同一個字，在各地念各地的音。」這樣的漢字拼音化可能不可能呢？只要我們把上述的四點略略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其中存在着一些絕對不能解決的矛盾，正像「要有兩座山，中間又不准有山凹」這一命題不能解決一樣。

拉丁化者認爲單音節的、獨立分寫的漢字，在人民大衆的口語中和知識份子的白話中，大多已發展爲複音了；複音詞不斷地迅速地在發展着使用着。因此，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都是主張詞兒連寫的。可是儘管主張詞兒連寫，儘管選用複音詞，儘管個別的還用變體定型字，拼音文字還有許多缺點，正像趙先生說，「許多固有的詞彙會和別的詞彙混淆……結果，詞彙太貧乏了，思想的表達受到了限制。」我們眞希望趙先生提出一個拼音方案來，用這個方案寫出來的文字是：不依靠字形，只用拼音字母，拼出普通話中四百多個單音節，代表幾千萬個原來的漢字而沒有同音字的混淆。如果提不出這樣理想的一個拼音方案，那我們只好用趙先生批評別人的話來回敬趙先生：「片面誇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 使漢字改革運動失去了現實基礎， 變成少數人的空想。」

另一方面，趙先生也承認「在現代漢語中，多音節詞的形成，已經非常普遍了。」可是他不承認多音節詞的形成能把單音節語變成複音節語的。因此，他把現代漢語稱爲「高級的」單音節語。我們把多音節詞稱爲複音詞或複合詞，他把它們稱爲高級的單音詞，這只是名稱上的不同，本來沒有指出來的必要，正像我們把由「平房」發展爲兩層的或三層的房子稱爲「樓房」，有人把它稱爲兩級的或三級的平房或高級的平房，都無所謂。只是趙先生說：「單音節語由低級發展到高級，非但絲毫沒有丟棄原來的單音節詞，而且倒是以保存它們爲條件的。」這就跟拼音文字的理論有着原則上的差別了。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都把複音詞或複合詞連寫而爲獨立的、有固定身份的單詞，並不是以保存組成單詞的各單音節的獨立身份爲條件的（能保存當然也可以，但並不以此爲條件）。照趙先生的說法：單音節詞可以發展爲多音節詞，但必須以保存原來的單音節詞爲條件。那麽，許多複音節詞就會變成毫無意義的符號了。比方：「大夫」是「巨大的丈夫」，「難道」是「艱難的道路」，「小說」是「小聲的說話」，「玩藝兒」是「玩耍藝術的兒子」，「先生們」是「首先生下來的一輩人」，「老百姓」是「年老的一百個姓氏」，「帝國主義」是「有皇帝的國家裏主要的意義」……這樣解釋詞兒當然可笑，但正符合了趙先生所說的「非但絲毫沒有丟棄原來的單音節詞，而且倒是以保存它們爲條件的」的理論。

以上四點，說明趙先生所提出的關於漢字改革問題的理論是不健全的，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他對新文字所下的斷語，如：「站不住脚」，「犯了一個極嚴重的錯誤」，「遭受失敗」，「一直走到絕路」等等，都該完璧歸還趙先生。

二 超出範圍的推論

其次，我們覺得趙先生研究問題的態度是不够嚴肅的，推論常超出應有的範圍。這表現在三方面：第一、立論毫無根據，就自造古典；第二、把自己的話塞在別人的嘴裏；第三、不從運動的發展上去批判拉丁化，單從拉丁化者已經扔在廢紙簍裏的一點意見拿來找罅子。

（一）立論毫無根據，就自造古典。 趙先生爲了說明漢字發展的歷史是字音和字形鬥爭的歷史，而在鬥爭中音是優勝者，他就舉「貢」字爲例。他說：「在這種字裏，音佔了優勢，形已經失去了意義，變成一堆骸骨。」這是說，「貢」字下半段的「貝」字是沒有意義的一堆骸骨。那麽，爲什麽把這堆骸骨放在這兒呢？趙先生說：「『貢』的主要構成部分是『工』，但『工』是平聲，而我們要的是去聲，爲區別音才加上『貝』。」我們不知道趙先生有什麽證據來斷定「貢」字裏的「貝」是作爲去聲的符號用的。我敢於斷定這樣說法不但毫無根據，而且是說不通的。第一、如果古人爲了表示去聲才加上「貝」，那麽古音「工」聲字，如「攻」、「空」、「項」、「江」、「紅」、「虹」、

「訌」、「杠」等裏面的「文」、「穴」、「貢」、「水」、「糸」、「虫」、「言」、「木」等這些「無意義的骸骨」都爲區別什麼聲調才加上去的呢？第二、「貢」字在周朝就很通用了，可是那時候中國語音裏共有幾種聲調，誰也不知道。多少音韻學家只知道除了現在的入聲在詩經裏自成一類外，別的就都模糊了。至於四聲的名稱，六朝以前還沒發現過。就是六朝以後，四聲的眞正調値，我們還很難知道。趙先生憑什麼知道古人造「貢」字的時候爲了區別它是去聲才加上「貝」呢？

（二）把自己的話塞在別人的嘴裏。　別人沒有說過的話自己當然也可以說。可是自己編了一套話，算是別人說的，翻過來再批評那一套話算是駁斥別人，那就太不忠誠老實了。趙先生說：「按照漢語革命論的說法，漢字應該被消滅，代之以複音節的文字，正如封建社會應該被消滅，代之以新民主主義社會。然而漢語革命論是完全錯了。」有誰會把漢字跟封建社會對比呢？有誰把複音節的拼音文字跟新民主主義社會對比呢？這幾句話是從哪一本書上摘引下來的？國語羅馬字運動和拉丁化運動在中國還沒有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時候就開始了，怎麼能有「代之以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想法呢？何況關於中國文字改革的論文幾乎全是用漢字寫的，即使有人主張用新文字代替漢字，也不是說立刻就把漢字消滅掉。拉丁化者主張改革漢字，可是有理性的人決不會說漢字應當被消滅正像封建社會應當被消滅一樣。趙先生也不能指出誰說過這樣的話，在哪本書裏見過這樣的話。

（三）不從運動的發展上去批判拉丁化。　新文字，正像其他新生的事物一樣，不可能一開始就是完全長成了的。漢字改革論者也不是從來不能犯些錯誤的。無可諱言，有些拉丁化者，正像有些語言學者一樣，曾經把語文看做有階級性的上層建築，可是這種錯誤的思想早已糾正了，至少在斯大林同志的那篇論語言學的文章發表以後，誰也沒提出過相反的意見。那麼人家已經扔在垃圾桶裏否定了的破爛，趙先生把它揀了出來作爲反對漢字改革的新論據，這是大可不必的。

論到拉丁化者對於漢字的存廢問題，趙先生有了很大的誤會。他既然關心着漢字的改革問題，而且清算了拉丁化新文字二十多年的歷史，按理他總該知道一些中國文字改革的動向，也總該知道一些這幾年來拉丁化者在東北、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所發表的重要的文件和具體的工作。

早在一九四八年，人家已經很有效地用新文字作爲學習漢字的工具了。中華書局出版的「新文字手冊」（一九四九年）和新華書店出版的「一個辦農民文化學習班的報告」（一九五〇年），都有詳細的說明，其中關於漢字問題說：

「一九四八年春季開學以前，遼北省委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上有這麼一句話：用拉丁化新文字作爲學習漢字的簡便工具。我們就首先在各中學附設的農民班裏試行。」

「一九四八年遼北省（現在改爲遼西省）白城子、洮南、大賚、鄭家屯、法庫等各省立中學都附設了農民班，招收翻身的農民入學，先學新文字三個星期，以後再學漢字、珠算、政治等課，六個月畢業（第一期畢業的有一千五百多名）。這一次的實驗已經證明：新文字不但容易學……而且學會了新文字，有了一個學習的工具，再學漢字就方便得多了。」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以前，香港中國新文字學會全體理事和會員發表了一個重要的文件，其中關於漢字問題說：

「中國既有數千年使用漢字的歷史，推行新文字的方法和土耳其、蘇聯、乃至越南、印尼等國便都不能相同……推行新文字並不廢除舊文字，不過舊文字的使用應該加以改良。」（下述改良方法七條從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全國性的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在北京成立。十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協會主席吳玉章同志的成立大會開幕詞，其中關於漢字問題說：

「我們提議：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在目前的主要的具體工作，應當是以下幾項：

「一、漢字改革的研究。我們應當繼續研究漢字改革的各種方案，而以採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爲研究的主要目標。漢字的整理和簡化，也應當是我們研究的目標之一。

「二、漢語和漢語統一問題的研究。我們應當繼續進行漢語的綜合研究和分區的調查研究，並研究以北方話爲統一漢語的基礎問題。」（下從略）

一九四九年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協會成立，並通過協會章程，其中關於漢字問題說：

「在推行新文字之外，同時進行各種漢字改良的工作，如減省漢字的筆劃，限制漢字字數，便利漢字讀音等，各種漢字改良的方案。新文字工作者都有加以研究、改進、和堅決執行的義務……」

上面所引的四個重要的關於漢字問題的文件，是在兩年以前發表的，趙先生要批評拉丁化總該把它們研究一下。拉丁化者不但在兩年以前不主張消滅漢字，就是在二十年以前也沒有「把漢字一脚踢開」。一九三一年九月海參威第一次中國新文字代表大會決議通過的「中國新文字十三原則」裏，關於漢字問題說：

「大會認爲語言文字是隨着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發展而發展的。它當然要有人力的推動，但它也有必經的過程和步驟。因此實行新文字並不是立刻廢除漢字。」

二十年以前和兩年以前，拉丁化者都不主張立即廢除漢字，這是一貫的。不過近幾年來，拉丁化者更進一步積極地研究漢字改良的方案，從事於漢字掃盲的工作。趙先生不看事實，在「中國新文字十三原則」發表以後過了二十年的今天，在東北、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拉丁化者關於進行各種漢字改良工作的文件發表以後過了兩年的今天，他竟三番四覆地說：

「漢字改革問題有兩種提法。拉丁化的提法：把漢字作爲封建上層建築予以消滅……」

「拉丁化的提法……主張丟棄漢字，置之不理……」

「拉丁化的提法，反映了一部分漢字改革工作者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他們一說要改革漢字，就否定漢字的一切方面，忽視漢字的現實意義……把漢字一脚踢開，丟在腦後。」

「按照漢語革命論的說法，漢字應該被消滅，代之以複音文字，正如封建社會應該被消滅，代之以新民主主義社會。」

如果趙先生知道了全國拉丁化者正在努力於各種漢字改良的工作，如研究漢字常用字，簡體字、漢字注音等，以減少工農大衆學習漢字的困難，並在堅決地執行人民政府的教育政策，進行以漢字爲掃盲工具的識字運動，我想他決不會故意說這些不符事實的話。因此，我希望全國拉丁化者一面研究拼音文字，一面更努力於推行識字運動；同時希望批評拉丁化的人士能多從事物的發展上來提問題，來努力，使中國的文字能在一定的條件下予以改革。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二日

學習譯叢　第五輯出版　定價七千元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對於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П·尤金
論自然界與社會發展中的飛躍形式……Б·凱德洛夫
對立面的鬥爭……С·杜德爾
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矛盾及其克服的道路……В·莫洛卓夫
辯證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無神論的哲學基礎……А·察里津
無神論……Ф·奧列楚克
如何講授聯共（布）黨史第八章：『布爾什維克黨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Д·伯連金
如何講授聯共（布）黨史第九章：『布爾什維克黨在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А·奧西波夫

學習雜誌社出版·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訂正

本刊五卷一期二十一頁下欄十一行「資本主會」應爲「資本主義」。二十二頁上欄四行「勞都」應爲「勞動」。二十四行「資人資本」應爲「私人資本」。二十六行「合法利」下漏一「潤」字。

又同期七十二頁下欄「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五一年第六期」應爲「第十五期」。

蘇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產物

蘇·Л·米丁著
郭從周譯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俄國的資本政權，建立了工人階級專政，打斷了民族壓迫的鎖鍊，把紅旗由黨旗變為國旗，並且圍繞着這面旗幟團結了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各族人民，使他們聯合為一個國家，聯合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列寧和斯大林，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製訂了共產黨對民族問題的理論和綱領，明白規定了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原則。這些原則是：所有各民族在社會生活和社會主義社會改造的全部範圍中享有平等權利，是保證各民族完全平權的唯一道路；民族自決乃至分離和組成自己獨立國家的權利；在自願、互信、平等權利和友愛合作的基礎上團結各民族。

以列寧和斯大林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以國際主義的精神、以俄國工農革命運動與受沙皇政府壓迫的各族人民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的精神，教育了俄國的勞動人民，在這一方面完成了巨大的工作，準備好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布爾什維克黨因此才會把各種革命運動如爭取和平的一般民主運動、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民主運動、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平等權利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運動匯合成一條總的革命洪流。

隨着在人類歷史上，打開新紀元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學說也體現到實際生活中了。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首要的歷史文件之一，就是列寧和斯大林簽署的「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這個宣言公佈了蘇維埃政權對於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

1. 俄國各族人民的平等和自主權；
2. 俄國各族人民自由自決乃至分離並組成獨立國家的權利；
3. 廢除一切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權與限制；
4. 住居俄國境內各少數民族與各人種集團的自由發展。

斯大林同志說道：「十月革命既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便打斷了民族殖民地壓迫的鎖鍊，使一個幅員廣大國家內所有一切被壓迫民族都擺脫了這種壓迫。無產階級除非同時解放被壓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的特點，就是它在蘇聯實行了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相互仇視和各民族相互衝突為旗幟，而是以蘇聯各族工農互相信任和親密接近為旗幟，不是為着民族主義，而是為着國際主義。

「正因為民族殖民地革命在我國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在國際主義旗幟下進行了的，所以，素被賤視的民族、素被奴役的民族，也就破天荒第一次在人類史上昇到了眞正自由和眞正平等民族的地位，並以身作則來鼓舞着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十版，二〇五——二〇六頁。）

十月革命的勝利和政權轉入無產階級之手，是各族人民唯一能够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據以建立友愛合作的基石。一九二二年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說道：「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統治着，國家依靠私有制，國家眞正的基礎，置於民族相互傾軋、衝突和鬥爭上，而在蘇維埃世界，政權並非建立在資本上，而是建立在勞動上，政權並非建立在私有制上，而是建立在集體所有制上，政權並非建立在人對人的剝削上，而是建立在反對這種剝削的鬥爭上，恰好相反，這裏政權的本質是使勞動人民羣衆自然地希望團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家庭」（「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一五〇頁）。

十月革命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造成了各族人民這種團結的形式。在國內戰爭和干涉時期，由於革命結果而發生的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軍事自衛的利益，就決定了這些共和國以軍事聯盟的方式進行合作。國內革命戰爭結束後，各蘇維埃共和國把經濟力量結合起來，就是恢復和發展它們經濟的唯一道路，當這種必要性被提到第一位時，軍事聯盟就用經濟聯盟來補充。在一九二二年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各族人民的合作，具有把各族人民從軍事、經濟和政治方面聯合成一個統一的多民族蘇維埃國家的性質。這種聯合，

爲發展蘇聯各族人民的創造性的才能，爲發展它們的經濟與文化，開拓了無限的可能性。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蘇聯各族人民間鞏固友好合作的重要條件，是消除過去俄國民族邊疆區各族經濟發展缺乏一致水平在歷史上所造成的實際的民族不平等。

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因爲要澈底執行列寧和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所以就實現了關於蘇聯先進民族，首先是大俄羅斯民族援助國內落後民族的口號。這在歷史上從所未有的短促期間內就保證肅清了以前被壓迫民族從過去承襲下來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落後性，保證他們的國家生存欣欣向榮，保證經濟和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發榮滋長。

在列寧和斯大林黨領導下實現的偉大社會主義改造，澈底變更了蘇聯各民族共和國、省和州的面貌。

在舊的資產階級民族的廢墟上，形成了比任何資產階級民族更要團結、更要富於生活力的新的社會主義民族。

斯大林同志指出蘇維埃社會主義民族及其與資產階級民族根本差異的特徵時寫道：「工人階級及其國際主義政黨是鞏固和領導這些新民族的力量。爲了肅清資本主義殘餘達成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制度，在民族內部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結成同盟；廢除民族壓迫的殘餘，達到各民族和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與自由發展；肅清民族主義的遺毒以建立各族人民間的友好並且鞏固國際主義精神；在反對侵略政策和侵略戰爭的鬥爭中，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與一切被壓迫的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結成統一戰綫，這些民族的精神的和社會政治的面貌就是這樣」（「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俄文版，三三九頁）。

蘇聯各族人民團結在以俄羅斯民族爲首的友好大家庭中，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完成了就規模與深度說空前龐大的社會主義改造，而成爲對所有世界各族人民發生鼓舞作用的範例。蘇聯以從所未見的速度，實現了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進行了農業上的社會主義大改革，消滅了人剝削人，實行了文化革命。蘇聯變爲一個先進的、强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爲人類的先鋒。

由於肅清剝削者階級、確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各民族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一切範圍中互相幫助的結果，一切種族和民族平等權利的思想，各族人民友愛的思想，就在蘇聯居於完全統治的地位。蘇聯人民反對德國法西斯野獸的偉大衛國戰爭的考驗，並沒有削弱、反而更加鞏固了蘇維埃多民族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鞏固性和富於生活力，是够得上任何其他多民族國家羨慕的。

蘇維埃社會的動力，如蘇聯人民牢不可破的道義和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兄弟般的友愛、生氣勃勃的蘇維埃愛國主義，是在蘇聯所有一切民族勞動人民利益共通性的基礎上擴展的。各族人民的民族傳統和全體勞動人民總的切身利益，在蘇維埃社會內諧和地結合着。

只有布爾什維克黨——國際主義思想的澈底的担當者，才能鍛鍊出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來。列寧和斯大林的黨，對於加强國內勞動人民民族間的關係和蘇聯各族人民與一切國家勞動人民兄弟般的聯盟，永遠表現了關懷。它由於自己這種國際主義的政策，在解放運動的全體戰士中，博得了最深的尊敬和廣泛的推崇。蘇聯各族人民間以及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間的相互關係，是資本主義世界從所未見的各族人民間相互關係的新的、高級的、正義的典型。和平與民主的强大力量，日益雄厚地團結在偉大蘇聯的週圍。東方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的千百萬勞動人民大衆滿懷信心和希望，注意着蘇維埃多民族國家，他們把這個國家，看成解決民族問題和民族友好合作問題的典範。

列寧主義解放思想在國際意義上的明顯表現，便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社會主義在人民民主國家的順利建設，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加强，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的增長。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是中國革命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其領袖毛澤東久經考驗的領導下，是百戰百勝的人民革命的鼓舞者和組織者。蘇聯已經實現的一切民族和種族友好合作的同一原則，現在也順利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應用了。中國革命的經驗，對於爲爭得自身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鬥爭的殖民地與附屬國各族人民，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偉大的牢不可破的友誼，是富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列寧還在一九二三年時就指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進行世界性鬥爭的結局，歸根結底，取決於俄國、印度、中國構成人口絕大多數的這一事實，而這大多數人口，正以空前的速度捲入爲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現在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計有八億人口了。

以偉大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民主陣營的力量，正在日益鞏固和壯大。這是爲爭取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的各族人民保證進一步成功的希望。

（莫斯科特稿）

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馬克思 著
季羨林 曹葆華 譯

本文係馬克思於一八五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用英文寫成，發表於同年八月八日的「紐約每日論壇」，現在刊印在一九五〇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兩卷本「馬克思選集」內。在這篇論文裏，馬克思進一步地指出：英國工業對印度的毀滅性的影響是可怕的。因而，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將會引起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本文實爲「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發表於本刊五卷一期）的續篇。

——編者

……英國的統治權是怎樣在印度建立起來了的呢？大莫臥兒（註一）底最高權力被莫臥兒總督們打垮了。總督們底權力被摩訶剌佗（註二）打垮了。摩訶剌佗底權力被阿富汗人打垮了，而且正當這些人互相混戰的時候，不列顛人闖了進來，能够把他們都征服了。一個國家，在其中不但回教徒與印度教徒分立，而且部落與部落、種姓與種姓分立；一個社會，其結構是建立在一種均衡上，而這種均衡是這個社會一切分子普遍的互相排擠和天生的孤立所產生的。這樣的一個國家和這樣的一個社會，不是注定了成爲侵略者底俘獲品嗎？即使我們對印度斯坦過去的歷史一點都不知道，難道這一個巨大的不容爭辯的事實不也存在着嗎？這個事實就是：甚至在今天印度也還被英國利用一支由印度出錢豢養的印度軍隊奴役着。所以，印度不能逃脫被征服的命運，而且它的全部過去的歷史，只要眞正有那末一回事，是它所曾遭受的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歷史。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大家知道的歷史。我們所謂的它的歷史，不過是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者底歷史，他們把自己的帝國建築在這個毫不抵抗和一點不變的社會底被動的基礎上。因此，問題並不在於英國是不是有權利來征服印度，而是在於我們是不是認爲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國人所征服了的印度要比被不列顛人所征服了的印度好些。

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消滅舊的亞洲社會（註三），另一個是建設的使命——在亞洲奠定西方社會底物質基礎。

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莫臥兒人一個接一個地侵佔了印度，可是不久就印度化了，因爲依據歷史底永恆規律，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他們征服了的民族底較高的文明所征服。不列顛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於印度人的征服者，因而不受後者底影響。他們打破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剷除了本地社會中一切偉大和崇高的東西，因而破壞了印度文明。他們在印度統治的歷史篇頁，除了破壞以外，幾乎沒有講到別的東西。重建工作幾乎還沒有從這個廢墟裏顯露出來。但是它已經開始了。

印度底政治統一比在大莫臥兒統治下任何時候都更堅固、更擴大；它是印度復興底第一個條件。這個由不列顛的寶刀所造成的統一，現在將被電報加强和持久起來。不列顛的練兵班長所組織和訓練的土著軍隊，是印度解放自己必不可少的前提（Sine gua non），也是使印度不再成爲隨便一個侵略者底俘獲品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出版自由，第一次介紹到亞洲社會裏來並且主要是由印度人和歐洲人底共同子孫所指導，乃是印度重建底新的强有力的要素。徹明達里（註四）和流特瓦爾（註五），不管怎樣可惡，卻是土地私有制底兩個不同的形式，而土地私有制則是亞洲社會所迫切嚮往的東西。在加爾各答，在英國監督下勉强地和很不充分地教育了一些印度土人，從這些人中間產生了一個新的階級，它具有管理國家所必需的知識，而且又灌注了歐洲的科學。蒸汽使印度與歐洲建立了經常的迅速的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整個東南大洋的海港聯

系起來，並且把印度從孤立狀況下解放出來，這種孤立狀態是它停滯底主要原因。這樣的一天不會很遠了，由於鐵路和汽船的結合，英國和印度間的距離以時間計算會縮成八天，這個以前像童話一樣的國家，因而會實在地同西方世界聯結起來。

大不列顛底各個統治階級，直到現在，對於印度底進步只有著偶爾的、暫時的和例外的興趣。貴族想征服它，財閥想掠奪它，工業資產階級想以低廉商品使它屈服。但是，現在情勢改變了。工業資產階級發現了：印度變成一個生產國家對於他們非常重要，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供給它以灌溉和內地交通的工具。現在他們打算在印度佈下一個鐵路網。他們會這樣作。結果一定是無法評價的。

大家知道：印度底生產力由於運輸工具和交換各種生產品的工具之極端缺乏而癱瘓了。自然物產豐富，但因交換工具缺乏而社會變得非常窮困，這個情形在印度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厲害。一八四八年不列顛下院的一個委員會證明了：「當在康代希糧食每二十八磅賣價六至八先令的時候，在浦那卻賣到六十四至七十先令，那裏的居民正餓死在大街上，沒有可能從康代希運糧食來，因爲泥路根本無法通行」。

鐵路底敷設可以很容易地利用來服務於農業，因爲在掘土修路基的地方可以修建蓄水池，並且沿着各個鐵路綫可以建築輸水道。這樣，作爲東方農業必不可少的前提的灌溉，就可以大大擴展了，至於因爲缺水而屢常發生的各地的飢饉，也就可以避免了。從這個觀點看來，鐵路底一般重要性便很明顯了，如果我們回憶到：甚至在高提山脈一帶地區裏，只要是灌溉的土地，就比同樣大小而不灌溉的土地多出三倍的稅，多用十倍或十二倍的人，多獲十二倍或十五倍的利益。

鐵路也可以減少軍事設備底數量和耗費。聖威廉要塞司令華倫上校對下院底特別委員會聲明道：

「如果現在要用多少天，甚至多少星期從國內遙遠地區得到情報而我們則只用同樣多的小時便可以辦到，如果我們在更短的時間內便能够把命令連同軍隊和給養一同運送出去，——那末這些重要情況底意義是應當給以最高估價的。軍隊也可能在比現在離開更遠的更適合衛生的地方駐紮，這樣，就可以避免許多因病死亡的損失。倉庫裏的給養用不着存儲得像現在這樣多，並且由於腐爛而受到的損失以及因天氣而引起的破壞也就可以避免了。軍隊底數目可以減少，而其有效性卻成比例地增加起來」。

我們知道，農村公社底共同組織和經濟基礎已經破壞了，但是它的最壞的特點——即把社會分解爲定型的和分離的原子——卻還一直存在着。鄉村底孤立在印度引起了道路底缺乏，而道路底缺乏則把鄉村底孤立永久化了。因此，公社存在於一定的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鄉村幾乎沒有來往，它沒有社會進步所不可缺少的願望和努力。當不列顛人把鄉村底這種自給自足的惰性粉碎了以後，鐵路就會滿足對交通和來往的新的需要。此外，「鐵路系統底效果之一就是：它把其他國家的發明和設備底知識帶給它經過的每一鄉村，並且供給它以獲得這些發明和設備的方法，以便首先使世傳的和被僱用的印度鄉村手工業充分顯示出自己的本領，然後再把它的缺點彌補起來」（卡普曼，印度底棉花和貿易）（註六）。

我知道：英國工業資產階級之企圖在印度建築鐵路，完全是爲了想從那裏用低廉價格替他們的工廠購運棉花和其他原料。但是，只要你一旦把機器應用到一個具有煤鐵的國家底交通上，你就不能够阻止這個國家自己去製造機器。你不能够在一個廣大的國家裏維持一個鐵路網、而不把滿足鐵路交通當前急切的需要所必需的一切工業方法都輸入進來，因此也必然要在與鐵路沒有直接關係的工業部門裏應用機器。所以，鐵路系統在印度會眞正變成近代工業底先驅。因爲不列顛官員本身也認爲印度人有特別本領能完全適應新的勞動方法，能獲得關於機器的必要的知識，所以，這就更不容懷疑了。加爾各答造幣廠裏的本地技師好多年來就在那裏管理蒸汽機，他們的本領和技巧對於這一事實提供了充分的證明；還有在褐爾得瓦煤區裏管理各種蒸汽機的本地人以及其他的一些實例對於這一事實也給予了豐富的例證。康伯爾（註七）先生本人，無論他怎樣爲東印度公司底偏見所影響，也不得不承認「廣大的印度人民羣衆具有巨大的工業精力，很適宜於積累資本，並且以頭腦底數學的清晰、以計算和自然科學的才能超羣出衆」。由鐵路系統所產生的近代工業，會消滅印度種姓制度所依靠的世傳的分工，而種姓制度對印度的進步和印度的强盛是具有決定性的阻礙。

英國資產階級可能被迫實行的一切，既不會解放廣大人民，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爲兩者不但決定於生產力底發展，而且也決定於人民對生產力的佔有。但是英國資產階級所一定作的，將是爲兩者創造物質的前提。難道資產階級在什麼時候作過更多的事情呢？難道它在什麼時候不迫使個人和

民族遭受流血與汚穢、苦難與恥辱而能完成進步呢？

在大不列顛自身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够全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穫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所播下的社會新原素底果實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期待到在多少遙遠的時期這個大而有趣的國家會復活起來，因爲這個國家的高貴人民，甚至在最低的階級裏，如果用婆爾提考夫公爵(Prince Soltykow)底話來說，「也比意大利人更細緻和靈巧」(Plus fins et plus adroits que les Italiens)（註八），他們的服從性甚至爲某一種沉靜的高貴性所平衡，他們雖然天生能够忍耐，但是他們的勇敢曾經使不列顛軍官們吃驚，他們的國家曾經是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宗教底源泉，扎提（註九）是古日爾曼人底典型，婆羅門是古希臘人底典型。

如果不作幾句結束語，我是不能够離開印度問題的。

只要我們把自己的目光從資產階級底故鄉轉向殖民地，資產階級文明底深深的僞善和它所固有的野蠻就毫無掩飾地擺在我們面前，因爲在故鄉他們還裝出一付令人尊敬的樣子，而一到殖民地，他們就赤裸裸地挺身出來了。資產階級是財產底捍衛者，但是難道有什麼革命黨掀起過像在孟加拉、馬德拉斯和孟買那樣的土地革命嗎（註十）？難道資產階級在單純的貪汚不能滿足他們的貪慾的時候，不會在印度採取——如果用大盜克萊武勳爵（註十一）自己的話來講，——兇惡的壓榨手段嗎？難道他們在歐洲空談國家公債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時候，不會在印度沒收那些把自己的私人積蓄投作「公司」股本的非回教的土耳其平民(Rayahs)底股息嗎？難道他們在保護「我們的神聖宗教」的口實下反對法國革命的時候，不會在印度禁止宣傳基督教嗎？難道他們爲了從湧到俄力薩和孟加拉底廟宇裏去的香客身上榨取錢財，不會把Juggernaut 廟裏所幹的暗殺和賣淫變成職業嗎？這就是崇拜「財產、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們！

英國工業對印度的毀滅性的影響是明顯而且可怕的；印度是同歐洲一樣大的國家，有一萬五千萬英畝。但是我們不應當忘記：這些影響只是現存的全部生產體系底有機的結果。這個生產是奠基在資本底最高統治上。資本底集中對於作爲獨立力量的資本底存在是非常緊要的。這種集中對於世界市場的破壞性的影響，只是在最大規模內揭露了政治經濟學底內在的有機的規律，這些規律目前在每個文明的城市裏都起着作用。歷史底資產階級時期應當創造新世界底物質基礎——一方面發展以人類互相依賴爲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這些交往底工具，另一方面發展人類生產力並藉助科學使物質生產變爲對自然力的統治。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創造新世界底這些物質條件，正如地質變革創造了地球底表面一樣。當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底成果、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它們服從於一些最先進的民族底共同監督，只有在這個時候，人類的進步才不再像那個只想從被殺了的人底頭顱裏喝取酒漿的可怕的異教的神像一樣。

（註 一）大莫臥兒 (Great Moyul)：一五二六年巴布爾 (Babur) 在印度創立回教王朝，他的先世是土耳其蒙古混種，這個王朝底皇帝尊號就叫做大莫臥兒。這個王朝受波斯文化感染很深，皇帝也按波斯規矩自稱 Schah，宮廷裏說的是波斯語。巴布爾以後頗出了幾個雄才大略的皇帝，像阿克巴爾 (Akbar)、扎杭結(Jahangir)、奥朗則布 (Aurang Eib) 等。一直到十八世紀才開始衰微。這時英國人早已到了印度。最後，一個皇帝巴哈比爾郎二世 (Bahadur Schah II)捲入了大起義，一八五八年遜位。莫臥兒王朝就完結了。

——譯者

（註 二）摩訶剌佗 (Mahrattas)：中印度的民族集團，奮起反抗回教徒，在十八世紀初葉建立封建王公聯盟。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本編輯部

（註 三）古代亞洲社會是東方的封建主義形式，具有下列特點：土地國有，公共工程盛行，特別是灌溉集中到國家手中，工業和農業結合在農村公社組織內。在別的篇章裏，馬克思和恩格斯用「亞洲專制制度」而不用「亞洲社會」。

——一九三六年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英文本編輯部

（註 四）徵明達里 (Zemindars)：一些新的大地主，以前都是收稅官和從事商業的重利盤剝者，英國人強制徵收印度農民的土地而把他們培植起來。徵明達里制度流行在印度東北部。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本編輯部

（註 五）流特瓦爾 (Ryotwar) 英國人在南印度麻德拉斯和孟買行政區實行的無限期的農田租佃制度。依據這種制度，農民在極端苛刻的條件下才能從英國當權者那裏租得田地來耕種。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本編輯部

（註 六）卡普曼 (John Chapman)，印度底棉花和貿易 (The Cotton and Commerce of India)，倫敦，一八五一年。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本編輯部

（下轉59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戰爭和軍隊的理論（續）

蘇・赫魯斯多夫上校作
曹　汀譯

帝國主義國家底軍隊（首先是美英底軍隊）是維持獨佔資本的武裝的支柱，實現侵略政策的工具。它們被用來對付日益增長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底力量，用來進行掠奪性的、反動的戰爭以保持帝國主義底統治。除了駐屯於本土的數量龐大的軍隊以外，美英政府還擁有特種部隊，分駐在全世界的許多殖民地和附屬國裏。殖民地軍隊建立起來是爲了扼殺殖民地和附屬國底人民以便鎮壓那裏的民族解放運動。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產生的蘇維埃軍隊和帝國主義國家底軍隊恰恰相反。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底過程中應當打破、粉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包括它底主要機構軍隊在內，而建立自己底國家、自己底軍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和軍隊。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如不以武裝保護無產階級革命底果實是不能實現的，因爲被推翻的剝削階級有世界帝國主義直接支持其復辟，是不會停止使用武器的。因此，祇有用軍事組織底力量才能鎮壓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底反抗。列寧指示我們：「統治階級，無產階級，祇要它願意統治並且將要統治的話，那就要以自己的軍事組織證明這點」（「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二頁）。

布爾什維克黨是勝任列寧所提出的最困難的任務的。在十月革命底過程中，解散了舊的軍隊，建立了歷史上空前的新式軍隊，它底使命就是可靠地保護社會主義祖國底利益。

蘇維埃軍隊是新的、最高類型的軍隊，它在原則上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底軍隊。關於這點，斯大林同志指出蘇維埃軍隊底三個特點，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軍隊所沒有的。

蘇維埃軍隊底第一個特點就是：「它是已經獲得解放的工農羣衆底軍隊，是十月革命底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軍隊」（「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二十二頁）。蘇維埃軍隊是眞正人民的軍隊。在蘇聯，人民和軍隊是統一的，是一家人，由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鬥爭目的和任務結合在一起的。我們武裝部隊從我們人民方面獲得全力的支持。這就是他們不可戰勝的保證。

蘇維埃軍隊底第二個特點，就在於它是「鞏固我國各民族彼此間兄弟友愛關係的軍隊，是解放我國先前各被壓迫民族的軍隊，是保衛我國各民族自由獨立的軍隊」（同上，第二十三頁）。蘇維埃軍隊不可戰勝的保證就在於它從偉大的蘇維埃聯盟各民族獲得了最偉大的支持。

蘇維埃軍隊底第三個特點，就在於「我們軍隊中培養和鞏固着的是國際主義精神，我們全部紅軍都浸透着國際主義精神」（同上，第二十四頁）。蘇維埃軍隊根本沒有掠奪的野心。它尊敬其他國家底勞動人民。全世界千百萬的羣衆把它當作各國人民自由、和平和安全底強大堡壘。這就無怪乎蘇維埃軍隊博得全世界進步人類底愛戴和感激。這就是它不可戰勝的保證。

蘇維埃武裝部隊肩負着偉大的歷史任務——警覺地保護着蘇維埃人民和平底果實和創造性的勞動，經常處於完全的戰鬥準備狀態中，警覺地保護着我們祖國神聖的邊境，使之不受帝國主義侵略者底侵犯。蘇維埃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光榮地完成了它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職責，給受法西斯匪帮奴役的各國人民建立了無上的功勳。它粉碎了西方和東方的侵略者，捍衛了蘇聯各民族底自由和獨立，拯救了歐亞的人民，使他們擺脫了德日帝國主義者底奴役。

毫無疑問，蘇維埃軍隊在將來也是值得他們人民底信任的。

學習着蘇維埃軍隊底榜樣，目前人民民主國家正在建設它們底武裝部隊。爲蘇聯所解放的中歐及東南歐人民推翻了舊的反動統治和它底官僚及軍事機構，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成立了自己底民主軍隊。他們保護人民羣衆底利益，捍衛國家的自主和民族的獨立。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革命軍隊底楷模，他們在共產黨底領導下把中國人民從蔣介石腐敗的反動集團和美帝國主義底壓迫下解放出來。

戰爭是社會歷史現象，隨階級社會底發展而發展，是資本主義永久的伴

侶。「尤其當資本主義已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完全發展到它的最高最後階段，即發展成帝國主義的時候，戰爭更是不可避免的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版中文本，第二〇〇頁）。

帝國主義時代爲剝削階級所發動的戰爭是和戰爭底機器時代底到來同時的，因此其後果特別殘酷，破壞性特別大。戰爭把世界大多數國家引到自己底軌道上，向所未有地使交戰國底物質和精神力量受到嚴重的考驗，造成許多民族大屠殺（其中參加大量的人員和技術裝備）底慘劇。

列寧在說明現代戰爭主要特點之一時寫道：「戰爭由傭兵或者由佔民族一半的等級底代表來進行的時代是一去不返了。戰爭現在要由民族來進行」。

我們應當從資本主義在它獨佔階段的發展底特點中去找尋，對於帝國主義時代戰爭規律性及其性質的說明，因爲在這個階段，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一切矛盾達到了它們尖銳化底最高峯。在帝國主義時期，這一法則表現在某些國家飛躍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絕對的法則。在帝國主義時期，這一法則表現在某些國家飛躍的發展，表現在一些國家很快把另外一些國家從世界市場排擠出去，表現在帝國主義陣營中衝突底深刻化和尖銳化，表現在已被分割的世界又爲暴力手段週期地重新分割。

斯大林同志在分析帝國主義國家間世界戰爭底起源時說道：「馬克思主義者不只一次聲明：世界經濟底資本主義體系本身就孕育着總危機和軍事衝突底因素，因此在我們時代世界資本主義底發展就不是採取有計劃的和平衡的前進運動的形式，而是經過危機和軍事慘局。這是因爲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底不平衡通常隨時都在激烈破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平衡，而認爲自己原料和銷售市場不够的那一帝國主義集團就常常企圖採用武裝力量改變形勢並重新瓜分『勢力範圍』使之對於它們有利。結果，資本主義世界就分爲兩個敵對的陣營，在它們之間就發生了戰爭。」

第一次重新瓜分世界的企圖便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底帝國主義戰爭。各國帝國主義者都要對這次戰爭負責。這次戰爭就其本質來說就是兩大帝國主義强盜集團間爲了分配殖民地、爲了奴役他國人民，爲了統治世界而進行的戰爭。

由於不平衡法則底作用，德國在比較短的時期內就在經濟上不僅趕上而且超過英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出現了一個新的、年輕的强盜——德帝國主義，它沒有趕得上瓜分世界，因此現在就要求重新瓜分它。英德矛盾成爲主要的矛盾，這些矛盾底尖銳化最後就促成帝國主義戰爭。

大家都知道，這次戰爭並沒有解決而且也不能解決兩帝國主義强盜集團間武裝衝突所引起的矛盾。不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在我國勝利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震撼了在宗主國以及在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資本主義體系底基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說明作爲世界經濟唯一的和廣泛的體系的資本主義存在底末日。這一勝利開始了資本主義毀滅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期，因而也就成爲資本主義總危機底決定因素。

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的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就更爲加强了，這就造成世界經濟資本主義體系底第二次危機。

德國雖然由於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吃了敗仗而被削弱了，但利用了美國底投資，在自己經濟發展中又趕上了英法。德帝國主義漸漸從國內市場上排擠掉英法，而開始成功地和美國競爭。所有這些都使大的帝國主義强盜間的矛盾極爲尖銳化，助長了世界經濟資本主義體系第二次危機底加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軍事衝突。另外，帝國主義陣營中的這些矛盾又爲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危機底嚴重後果加深了，這一危機打破了妄想資本主義幸福和繁榮的資產階級的和改良主義的幻夢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竭力用使本國法西斯化的方法，用組織新帝國主義戰爭和武裝干涉蘇聯的方法來從危機的局勢中找出路。兩個最危險的法西斯主義巢穴和世界侵略底大本營形成了：在西方是德國，在東方是日本。德日侵略者宣佈：侵佔他國領土是它們對外政策底基礎，公然提出統治世界的狂妄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爲各國帝國主義者所準備。英法美底統治集團用盡一切方法鼓勵法西斯主義和它底侵略。他們化了千百萬美元把德帝國主義武裝起來，企圖孤立蘇聯，使它成爲法西斯鐵蹄下的犧牲品，而指望由此扼殺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 。英法美統治者底反動的「慕尼黑」政策，對法西斯德國的「綏靖」政策，犧牲蘇聯和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而與希特勒匪徒勾結的政策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由於斯大林英明的、睿智的對外政策，帝國主義者底反蘇計劃完全破產了。「斯大林同志適時地識破了英法反蘇陰謀底奸計，這樣便不僅使我們祖國免於打擊，遲延了希特勒德國對蘇聯的襲擊，而且使事態發展到這樣地步，以至英美政府不得不成立英蘇美反法西斯同盟，這個是符合於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底利益的」（莫洛托夫）。

以法西斯軸心國家方面來說，戰爭是非正義的、强盜的、反對民主和社會主義、反對全世界勞動人民祖國——蘇聯——的極端反動的戰爭。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反對工人階級、反對共產主義運動、反對那些爭取自己民族和社會解放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武裝鬥爭也是同樣非正義的戰爭。

除開那些係腐朽的剝削階級政治底繼續的非正義的、掠奪性的戰爭以外，帝國主義時期不可避免地也同時產生正義的解放的戰爭。「馬克思主義者永遠忘記不了：暴力將必然隨着資本主義底全面破產和社會主義社會底興起而同時產生。這種暴力將是全世界的歷史時期，是各種各樣戰爭底時期——這些戰爭包括帝國主義戰爭、國內戰爭、兩者底混合、民族戰爭、被帝國主義者分裂的民族的解放戰爭……」（「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五〇頁）。

在帝國主義時代，正義的戰爭首先是被壓迫的或已獲得解放的羣衆反對反動資產階級的戰爭，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勞動人民爭取自由的戰爭，保護社會主義制度，保衛和平及各國人民安全的戰爭。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認爲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戰爭，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戰爭，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戰爭是唯一合法的、眞正革命的戰爭。

第一次這樣的戰爭便是蘇維埃各共和國勞動者反對本國及國際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這個鬥爭於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在以列寧和斯大林爲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底領導下成功地進行過。

列寧和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教導我們：社會主義在各國的同時勝利是不可能的。列寧指出：在這樣的條件下，在一國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必然遇到其餘全部資本主義世界底反抗，他們將企圖用武力破壞和消滅他們所憎恨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歷史完全證明這一理論底正確性。

作爲向無產階級專政在俄國成立的這一事件的回答，國際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驅使他們底武裝部隊來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時勾結我們國內的反革命力量來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並恢復資本主義。

蘇維埃人民因而不得不拿起武器，在三年多的時期內爲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爲了使俄羅斯各民族擺脫資本主義奴役、爲了社會主義而進行神聖的、衛國的正義戰爭。列寧說道：「我們底戰爭是革命政治底繼續，是推翻剝削者、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治底繼續」（「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〇五頁）。

國際帝國主義企圖消滅蘇維埃國家的第一次嘗試可恥地失敗了。雖然敵人在經濟力量和軍事幹部方面佔有優勢，但蘇維埃共和國和它底軍隊却是不可戰勝的力量，粉碎了武裝干涉者和國內反革命底匪幫。蘇維埃人民在布爾什維克黨底領導下光榮地捍衛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紅軍不可戰勝的源泉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底正確政策，它使紅軍得到了數百萬勞動者底同情和愛戴，成功地動員了蘇維埃人民一切物質和精神力量以反抗敵人。

一九四一年，世界帝國主義第二次嘗試以武裝方法消滅社會主義國家。爲了這個目的，國際資產階級把德國法西斯裝備成爲突擊的鐵鎚。消滅蘇聯，這是整個帝國主義陣營底目的。

希特勒德國把西歐各國變爲奴隸以後，就背信棄義突然襲擊蘇聯。蘇維埃人民反對希特勒强盜的偉大衛國戰爭開始了。蘇聯加入反法西斯國家的戰爭就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反法西斯和解放的性質。歐洲各國勞動者把蘇聯當作這樣一種力量，就是負有使命來爲愛好自由的人民決定武裝鬥爭底結局。

自從蘇聯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國家和最反動的帝國主義國家——希特勒德國之間的鬥爭就成爲這次戰爭底主要內容。戰爭證明了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無限的優越性，再一次證實了資本主義預定的命運。

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帶有階級性質，因爲它是爲了保衛社會主義社會和國家制度來進行的，其目的在於消滅德日帝國主義，援助歐亞被壓迫的民族進行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在這一正義戰爭中，蘇聯代表並保衛全體進步人類底利益。

蘇聯反對法西斯强盜的偉大衛國戰爭也帶有民族的性質，因爲它是爲了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底光榮、自由和獨立、爲了我國各民族獨立和自由的發展而進行的，而這些民族不僅有被德帝國主義予以階級奴役的威脅而且有被它予以民族奴役的威脅。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起了決定作用。它最後澈底地粉碎了國際帝國主義底突擊力量，因此也就破壞了蓄意企圖預先保護法西斯主義不使其完全失敗的英美反動派底陰謀。

蘇維埃社會和國家制度，蘇維埃武裝部隊表現了眞正强大無比和用之不竭的力量。蘇聯人民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勝利使得國際舞台上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而有利於社會主義，使得資本主義總危機急劇尖銳化。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大大地增强了它們底地位，而資本主義底地位却在根本上被削弱了。最後形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和反民主陣營，與以蘇聯爲首的

反帝國主義和民主陣營。這兩個陣營間的鬥爭貫穿了全部現代國際政治局勢。

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解放戰爭便是正義戰爭形式之一。但這時應當注意，就是列寧主義不僅把這一概念應用於殖民地和附屬國民族底戰爭，而且也應用於帝國主義侵略所指向的每一民族底戰爭。列寧寫道：「……在帝國主義時代，甚至在歐洲也不能認爲民族戰爭是不可能的」（「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至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底經驗明顯地證實了列寧底這一原則。世界各國千百萬正直的人們，了解到法西斯主義給一切愛好自由的人民帶來了死亡和奴役以後，就起而保衛本國底民族獨立。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底勞動人民聯合起來，結成了以蘇聯爲首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綫。因此，雖然英美統治集團底帝國主義目的在於努力在戰爭中削弱蘇聯並把德日這兩個最可怕的競爭者逐出世界市場，但是以反法西斯同盟底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方面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客觀內容來說，仍然是歷史上進步的、解放的和正義的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帶有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底新特點。殖民地許多人民目前正進行着反帝的民族解放戰爭，並且已經給予帝國主義以嚴重打擊。

現代民族解放戰爭底主力軍是共產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和農民，這就使得鬥爭在政治上更爲成熟而具有高度的水平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底資產階級害怕革命，因此便和帝國主義勾結，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現在是和被壓迫羣衆反對壓迫者、反對封建制度和替外國資本服務的反動資產階級的戰爭融和在一起的，是和爭取民族獨立、爭取國家獨立生存、爭取人民民主的鬥爭融和在一起的。這些論斷底正確性已完全爲緬甸和越南、印尼和馬來亞底民族解放鬥爭底發展所證實了。

中國人民底勝利對於殖民地和附屬國底人民，首先是對於亞洲人民有莫大的意義，這一勝利必然影響到全部殖民地世界今後的命運。

中國人民二十五年來在共產黨及其卓越的領袖毛澤東底領導下，爲了自己底民族獨立、爲了爭取今後走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權利而與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進行着連續不斷的武裝鬥爭。但是祇是在一九四五年，在蘇軍粉碎了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以後，千百萬中國人民底民族解放戰爭才進入了它發展底決定性的階段，才在一九四九年獲得了偉大的勝利並成立了人民共和國。

中國人民底勝利給帝國主義以新的猛烈的打擊，倍增和加強了以偉大的蘇聯爲首的民主陣營底力量，在殖民地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中開闢了新的領域。

蘇聯是革命力量底主要源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底中流砥柱。如果蘇聯沒有能夠粉碎德日帝國主義，那在中歐和東南歐許多國家裏就不會產生人民民主國家，而偉大的中國人民也不會得到勝利。

在偉大衞國戰爭中國際反動派突擊力量之被粉碎，並不是說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就放棄了對我們祖國軍事侵略的企圖。正是因爲如此，所以斯大林同志才指示我們：「轉入和平勞動後，就必須時刻留心，就必須像愛護自己眼珠那樣愛護我們底武裝部隊和國防力量」。資本主義世界存在一天，戰爭底危險就繼續一天。

英美帝國主義者拚命地糾合軍事聯盟，瘋狂地展開軍備競賽，以便發動新的戰爭來反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反對整個反帝的和民主的陣營。美帝國主義者打算用暴力的方法建立世界帝國，這個在它底規模上也許要超過歷史上所曾有的任何征服者底世界帝國。

但是世界人民是不願意戰爭的，他們積極地、警覺地捍衞着他們已爭得的和平。在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和平擁護者底有組織的國際陣綫。保衞和平的力量如此強大，已使他們能夠打破侵略者底罪惡計劃。不應當忘記：蘇聯和歐亞人民民主國家人口有八億之多。此外，在帝國主義本國及其殖民地內，也有成千成萬的勞動者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着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所有這一切都證明：民主陣營底力量比帝國主義力量要超過許多倍。馬林可夫同志說過：「毫無疑問：如果帝國主義者敢於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那末這次戰爭將不祇是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的墳墓，而且是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墳墓」。

列寧主義教導我們：到處社會主義取得勝利，普遍消滅產生各種壓迫和掠奪戰爭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是人民和平發展底充分保障。在偉大的斯大林領導之下，爲列寧主義所武裝的布爾什維克黨「指示出一條走向普遍和平和擺脫流血戰爭的道路，一條走向推翻資本主義奴役和各國人民及全人類獲得偉大進步的道路」（莫洛托夫）。

對於蘇維埃人民，摧毀帝國主義戰爭販子一切毒害的可靠的保障就是進一步加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威力，進一步提高我們武裝部隊底戰鬥力和戰鬥準備程度。

（譯自蘇聯「宣傳者與鼓動者」雜誌。一九五〇年六月號）

書評

評莫爾頓著「英國史」

蘇·車爾涅也夫作
張蓉初譯

英國進步史學家莫爾頓（A. L. Morton）所著「人民英國史」（本文稱「英國史」），早已引起國內史學界的重視，有些大學在講授西洋史時，還把它列爲重要參考書之一。然而，至今尚未見有專文介紹與批評。在這篇書評裏，作者正確地指出了該書的若干優點和重大的缺點，特予譯出，以供國內史學工作者的參考。文中所引原書之處，恐從俄文重譯走失原意，特根據一九四八年版英文原書譯出，併此聲明。——譯者

莫爾頓的「英國史」一九四八年在著者本國發行第三版，是英國史學上的重要事件。著者在說明歷史事件時不僅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他還採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把這些原則作爲該書的基礎，雖然他並未經常依據這些原則。

該書所包括的年代，從公元前二千年到公元後一九一九年。在敘述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著者所用的實際材料更豐富了，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的歷史也充滿了事實，但是二十世紀的材料卻減少了，這和我們所希望的恰恰相反。在重述人民的社會政治史時，著者在全書中，始終沒有忘記它的基礎——生產力的發展。這是莫爾頓的主要優點，使他的書與所有資產階級捏造的英國史斷然不同。不幸著者謹愼地避免與資產階級史學家爭論，有時甚至在他們面前低頭，例如在當代英國資產階級史學之「光」屈味梭（Trevelyan）前低頭，雖然屈味梭在捏造歷史上要遠過于麥考萊（Macoulay）。

在莫爾頓書中，人民運動——農民與無產階級運動——佔了不少的篇幅，他有時引用了蘇維埃讀者很少知道的新鮮的實際材料（例如，十九世紀最初二十五年中農村無產階級運動）。依我們看來，「英國史」中有大部份是勞動大衆的歷史，人民的歷史。

莫爾頓想以馬克思主義來解釋英國史的最重要時期。這首先就涉及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史。正如其他英國進步史學家（希爾C. Hill，霍洛蘭蕭H. Holorenshaw）一樣，莫爾頓在其敘述與評價中，使這些革命在英國史學著作中首次受到合於各個革命眞正意義的重視。同時，著者推翻了有關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革命時宗教問題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理論，這種理論至今仍爲資產階級史學家所堅持。對於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英國歷史，他有嶄新的敘述。有眞正歷史意義的現象特別受到重視，如：民主運動是英國工廠無產階級最初的政治學校，工業資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增長，資產階級的致富及加强等等。

莫爾頓寫英帝國主義歷史時，應用了列寧關於壟斷資本主義基本特質及不列顛資本主義特性的學說。

莫爾頓正確地解決了英國史的若干特殊問題。

除這些優點以外，莫爾頓書中包含有若干見解與評價，顯出著者還不能擺脫資產階級觀念的影響——資產階級史學以其客觀的帝國主義的沙文主義的評價，時時在影響着他。例如，他把一七五七年「加爾各答黑窟」意外事件與一九二一年英國囚車中悶死數十土著事件（二五八頁）來對比，謂一切人——殖民者及殖民地土著——都覺得是殘酷無情；作這樣的對比，又有什麼價值！或者解釋爲集體犯罪……或者歸之於警察管理的軟弱及法官的放任(三二一頁)。類似的見解，在莫爾頓書中是顯得突出的，似乎是由布里安特（Bryant）或湯因比（Toynbee）的著作中搬過來的。

我們應當注意，著者對英國史的分期，破壞了眞正歷史科學的原則。關於這一點，書末引起我們的注意。自然，我們希望著者會敘述到現在，或者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莫爾頓祇敘述到凡爾賽和約爲止，這就證明他在最重要的一個科學問題——分別人類歷史的主要時期——上，不敢與資產階級史學家有異議。在莫爾頓的書中，我們不會見到對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作爲世界史突變事件的特性之敘述。

在有關歷史過程分期的另一問題上，莫爾頓也脫離了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明白英國史中封建主義構成與資本主義構成間的分界線。莫爾頓追隨資產階級

史學家之後，認爲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線是十五及十六世紀，認爲新構成的開始是地理大發見。關於資本主義之脫胎於封建主義一點，在本質上，他認爲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勝利，而忽略了資產階級革命在這勝利中的決定性作用。由於這一錯誤的說法，於是對於英國資本主義歷史中原始積累過程的地位及意義，不能有正確的評價。莫爾頓把英國的原始積累限於十六世紀，他說，從那時起，資產階級奠定了堅固的基礎，有足够數量的資本「用合法而和平的手段去剝削業已形成的無產階級，以保證其繼續的自動的財富積累。」（一四六頁）

此種論證，引起了更甚的迷惑：就在莫爾頓的書中，即可找到相反而豐富的證明（二六八頁）。自然會發生這類問題：譬如說，著者把航海條例及革命後重商主義的一切制度，歸在那一類現象中呢？他如何去闡明革命時期中的掠奪商業及殖民戰爭，尤其是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初葉及中葉的戰爭呢？較之在都托朝（Tudors）及斯多亞朝（Stuarts）時更厲害的十八世紀的國會圈地運動，是向何處發展呢？關於創建帝國，關於以殘酷手段掠奪印度、愛爾蘭、西印度，關於奴隸買賣——此種買賣使普里穆斯、利物浦及數十其他城市財閥政治興起，且不提倫敦；對於這一切事實，作如何解釋呢？最後，與一六九四年英格蘭銀行同時發生的國債，如果不是原始積累之有力的槓杆，又是什麼呢？

所有這些現象，證明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不僅沒有在十六世紀終了，相反地，在十七世紀下半葉及十八世紀中，却無比地更加深入而且是多方面的。這很容易解釋：十七世紀的革命在推翻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政治上層建築以後，創造了新的資產階級的政治上層建築，這個上層建築要來保護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資本主義基礎，並用種種方法來支持與促進資本主義的成長和鞏固，而使其完全發展起來。爲了掠奪英國人民、其他人民及部落，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貴族把如此有力的工具——國家——掌握在手中。他們把它充分利用了。

關於十八世紀的幾章，給我們這麼一種印象：資產階級只不過利用了某種抽象「國家」（?!）所進行的掠奪戰爭，來使自己致富。資產階級既沒有參預貴族及地主的圈地暴行，又沒有參豫克萊武（Clive）的冒險及其他國家的暴行……一到十六世紀資產階級就走上了和平的「合法的」財富積累途徑。似乎不是資產階級要把窩爾波爾（Walpole）連同他的和平政策及其無決心使資產者與貴族納稅平等（如果人家不「認爲」貴族階級趕走了農民，圈了並改良了自己的土地，那麼這樣的納稅對他們眞是太重了）一起推翻；似乎不是資產階級要把那位使資產階級變爲帝國的主人，而把帝國讓克萊武及海斯丁斯（Hastings）之流去掠奪的老庇特（Pitt）擁戴出來。

如果合法地說，資產階級只利用了都托朝在宗教改革時所沒收的寺院土地，那麼，以這樣的尺度來衡量十八世紀的事件，根本上是錯誤的。

明顯地，著者所以低估了十七世紀革命所創立的英國國家的作用及性質，關於這革命後果的敘述失掉了莫爾頓所特有的明確的目的及嚴密的邏輯，無疑地是由於他想尋找階級鬥爭作爲事件的主動力。在莫爾頓的書中，十八世紀的事件似乎是自己發生的。並非階級在鬥爭中造成事件，反而是事件影響了階級的命運，事件本身在改變國家的社會面目時形成了歷史過程。因此，解釋工業革命的起源時，莫爾頓寫道：「黃金的河流向城裏流，他們的水平一年一年高漲，直到汎濫了，因魔術力量而成了工廠、礦、鑄造廠，汎濫了半個英國，埋葬了舊生活與舊習慣。」（二六八——二六九頁）

對於這位英國史著者的若干特殊見解，我們不能同意。例如，他想解釋所謂「光榮革命」後近百年的輝格黨（Whigs.）的專制統治，是由於托萊黨（Tories）是「不十分忠實的詹姆斯主義」的俘虜，故不能用嚴重力量來反抗輝格黨。莫爾頓寫道：「一七一五年以後詹姆斯主義在英國政治上是死了，但是在一個長時期中，它仍然是托萊黨心上的疙瘩。」（二五一頁）

這樣的解釋在我們看來似乎是太表面了。托萊黨之傾向詹姆斯主義，並非英國輝格寡頭統治維持到產業革命時的原因，而是托萊黨正代表着那所謂「地主階級」，這個階級在英國經濟及社會生活中是封建殘餘最有力的保持者。到十八世紀農業及工業革命進行時，托萊黨的社會基礎根本改變了，才能成爲政府黨；那時，依馬克思的話，這些農村地主已經是「與其他資產者一樣的資產者。」（馬恩全集第九卷，第四頁）六十——七十年代時，正當一般政黨苦於渙散之後，由小庇特所重新鞏固的十八世紀末葉的托萊黨，和斯都亞朝復辟所遺留在資產階級英國的托萊黨，已逈不相同。

在第十一章中，莫爾頓說明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時的英國，因爲人口增加，由穀物輸出國變成穀物輸入國（二七五頁）。我們不難注意到，著者在此又重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基礎理論，用「自然律」來掩飾資產階級的暴行。英國穀物的不足，是因爲成千成萬的農村居民被迫離開了土地（即令他們在一年中僅有一部份時間靠土地來維持），變成市場農產品的消費者；而農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發展又沒有那麼快。此外，地主又（正如大量圈地之初期）發見把耕地變成牧場更爲有利，因爲繼棉織工業之後，羊毛工業也迅速機械化

了。

一般說來，莫爾頓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沒理會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他撇開了工業革命來看人口的增加，他跟資產階級理論家一樣，認爲人口增加是社會發展之特別的、獨立的因素（二八八頁）。

莫爾頓的最大成就，在於根本改正了英國資產階級史學傳統對於法國革命時代的英國歷史之解釋。關於英國及愛爾蘭在革命影響下所發生的民主及革命高漲之詳細討論，使莫爾頓能正確地指出決定英國加入反法蘭西共和國的歐洲反革命聯盟主要原因之一。在這一方面，讀者得到英國參加戰爭（一七九三年初）的原因之眞實解釋，就是爲了壓制國內的反對派。

莫爾頓指出了戰爭不可避免的另一原因：革命雖然預示歐洲的反動，不久却會使法國變成一個强國。這就使英國資產階級及庇特成爲最激烈的、堅決的主戰者。關於這一點，莫爾頓完全正確地强調說，英法矛盾是主要地決定了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的戰爭。

然而，莫爾頓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特徵：矛盾不但在于爭取在歐洲的霸權，還要爭取在印度、西印度、非洲沿岸及近東的霸權，英國與法國的戰爭不單是商業的，而且更是殖民的。如果撇開了這個特徵，便很容易掩飾英國資本主義在反法戰爭中的侵略性。莫爾頓沒有能正確地避免這個忽略，尤其是在他論一七九三年戰爭之發生時（二九〇頁）。莫爾頓說，挑起戰爭的是吉倫德黨人（Girondins），他引用了國民大會號召人民起來反抗暴君的著名宣言，就依這個宣言，便說法國先宣戰。一切原是這樣的。法國革命軍隊在發爾密（Valmy）及耶馬普（Jemappes）兩役業已獲得勝利，這就不能不喚起英國資產階級情緒的突變——這種看法也是正確的。但是不要忘記，在國民大會宣戰（一七九三年二月一日）之前數月，英國人實際上已在西印度對法戰爭，一再奪取屬于法國的島嶼。

最後所提及的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法國革命引起了西印度黑人的起義，這就威脅了英國資產階級最有勢力的一個集團之繁榮，這個集團之大發其財，是由於奴隸販賣，由於建築在黑奴勞動上面的殖民地商品貿易。英國資產階級中此一集團在對法戰爭中的作用很大。莫爾頓在說明戰爭的原因時，對這一點完全不提，正如他對奴隸販賣在英國資本主義發展上的一般重要性也一字不提一樣。

在描寫軍事行動時，莫爾頓表現出顯然的「愛國主義的」精神，實際上是沙文主義的英國資產階級史學的傳統。他重視而且有時誇張了勝利（例如一七九四年豪氏（Howe）之「戰勝」法國海軍，這原是一個得不償失的勝利）及英國海軍的優越性，對於英國的陸軍，他不曾予以任何評價，就是麥考萊也承認這個陸軍是全歐的笑柄。

莫爾頓歪曲了拿破崙在俄羅斯與西班牙失敗的原因（三〇〇頁），認爲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內沒有資產階級，彷彿資產階級會從「內部」支持拿破崙似的。關於佛里蘭（Friedland）之戰（二九九頁），他說這是……俄羅斯人的失敗！誰都知道，拿破崙自己也不是這麼想。在敘述克里米亞戰爭時，莫爾頓漠視了在保衛祖國時俄羅斯人民底英勇與忘我精神（三四三——三四四頁）。依照莫爾頓的可笑說法，似乎無需特別的努力與消耗，只是因爲英法將領們的無能與緩慢，才不會把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攻下。莫爾頓的這類判斷，不幸與屈味稜不相上下。

外交政策在莫爾頓書中佔不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十九世紀。這無疑是本書的缺點，因爲在英國史中，外交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說明克里米亞戰爭以前的英俄關係時（最近時期他根本不提），莫爾頓重述了英國資產階級史學家傳統的觀點，雖然因此有時與自己正確的結論及評價相矛盾。

莫爾頓揭穿了關于「光榮孤立」政策之「自由主義的」及「進步的」性質之虛構的說法。

更奇怪的是，每當述及英俄矛盾時，莫爾頓總以爲英國是取守勢的，例如有關東方問題底矛盾，尤其有關中央亞細亞問題。甚至在寫一八三八年英國之明顯的侵略——「征服阿富汗斯坦的企圖」——時，他仍不忘於「俄羅斯深入」之曖昧說法，這謊言可能如願以償地算作英國侵略的原因（三八七頁）。

一般說來，莫爾頓在敘述十九世紀英俄關係時，具有在污水池裏浸透的，幾乎是瘋狂的畏俄病，這種畏俄病是百年以前大衛・烏爾克哈爾特（David urquhart）所創的，至今仍由英帝國主義者謹愼地保持着及豐富着。

在莫爾頓的書中，根據列寧的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說法，對英國外交政策及二十世紀國際關係有正確的說明：可是，以上所述的各種見解却表現出可惋惜的混亂，表現出莫爾頓是顯然受了英國資產階級虛構的史學之不可原諒的論斷之影響。

屬於同樣混亂的，是莫爾頓之惡意而不科學的企圖，把帕麥斯東（Palmerston）對沙米爾（Shamyl）的措置與一九三五年塞繆爾・霍爾（Samuel

Hoare）對阿比西尼亞之背信政策來比較（三四二頁），爲着強調帕麥斯東和霍爾背信性質之相似點，莫爾頓把在原則上及歷史上不能比較的事件拿來比較。就前一事件而論，結果是放棄了繼續冒險（利用沙米爾使高加索區域脫離俄羅斯）；這冒險顯然是失敗了，因爲得不到山居小民族的支持。而在後一事件中，則由於「調解者」（霍爾與拉代爾）的同意，承認了法西斯意大利之攫取阿比西尼亞。

莫爾頓的主要錯誤在於「附帶地」把反動的、反人民的、由外國、英土派出人員刺激起的莫里德派（Murids），與阿比西尼亞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眞正民族解放的鬥爭，看作同樣的事件。

莫爾頓此一錯誤的根源，在於他感受到英國資產階級史學傳統的壓力。

使人奇怪的是，蘇聯版「英國史」序論的作者，對於業經我們指出的有關外交問題的莫爾頓的錯誤，應當預先指明給讀者才好，而他竟一字不提。

莫爾頓書中的最大弱點，是在敘述英國十九世紀五十、六十、及七十年代之一部份時間的工人運動。關於這時工聯的興起及活動，他向讀者報告了不少新的東西，並將其與憲章黨時期及憲章黨以前的工聯運動加以分別，他稱一八四八年以後興起的工聯爲「新型」工聯（三六七頁），著者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並沒有嘗試深究「新型」工聯主義的性質。關於英國工業的及殖民的壟斷對於當時工人運動的影響之本質，他不會有所說明。在莫爾頓書中的這部份，完全沒有理會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豐富的經典言論，——因此他所描寫的景況，只不過潤飾了及歪曲了眞象而已。

一八七九年六月十七日恩格斯寫給伯恩斯坦的信上說：「若干年以來，英國的工人運動，沒跳出增加工資及縮短工時而罷工鬥爭之狹隘的圈子，而且，這些罷工既不曾被認爲是暫時的支援方法，也沒有被視爲是宣傳及組織的手段，而只是當作終極的目標。工聯甚至在規章基礎上，主要地摒除了一切政治活動，因此，也就摒除了工人階級作爲一個階級的一切共同活動。在政治上，工人分爲保守派與自由主義激進派，擁護狄斯累利（Disraeli）（比根斯斐爾德Beaconsfield）內閣派與擁護格來德斯敦（Gladstone）內閣派。因此，我們可以說，關於英國的工人運動，雖然有罷工運動發生，不論其結果是否成功，都不會把運動向前推進一步。」（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三二二——三二三頁）

我們認爲在讀本書時，應當加上這段文字作爲修正，因爲本書對於此一時期中的英國工人階級及英國工人運動，沒有類似的敘述（三七〇——三七二頁）。

莫爾頓對於「新型」工聯主義歷史地位的評價，也欠正確。他在這方面的判斷，看來像是費邊社小冊子的言論。莫爾頓寫道：「他們（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的工聯——評論者註）使英國工人運動採用了商業方法及注意於組織工作的細節；倘非如此，則不能完成永久的價值。從此，他們使工聯主義成爲無數工人日常生活中之正常的及正規的部份。」（三六八頁）。那麼，又怎麼呢？讀者問。爲了整個工人運動，爲了實現工人階級之極終目的，這一切有什麼結果呢？列寧指示我們，當決定工人組織在工人運動中的地位時，應依照其政策的客觀內容：「這個政策是否代表羣衆，是否爲羣衆服務，換言之，是否把羣衆由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還是只代表少數人的利益，代表少數人與資本主義的妥協？」（列寧全集二十三卷一〇八頁第四版。）

把三十年代「全國大工聯」時代的「暫時組織」，與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的工聯對比時，莫爾頓與威伯夫婦（S. B. Webb）都傾向於稱贊他們的「實際意義」及日常工作，似乎他們奠定了工人階級日後眞正「成功」的基礎。（三六九頁）。

莫爾頓對於當時工人領袖的評價也完全符合於他對於五十——六十年代英國工人運動機會主義者的歪曲看法。馬克思公開指出機會主義者及改良主義者是叛徒，是「在工人運動中出賣給資產階級或被資產階級收買爲資產階級服役」的人，（列寧全集二十九卷四六三頁）。列寧在另一處稱他們爲壞蛋（列寧全集三十一卷二十五頁），而莫爾頓則認爲他們是正直的，有才幹的人，稱贊他們的「眞正的組織天才」（三七〇頁）。

列寧稱約翰•彭斯（John Burns）是一個爲着在內閣中小小地位而出賣自己的無賴，是無產階級事業的叛徒，而著者把他與托姆孟（Tom Mann），摩里斯（Morris），伊林諾爾•哀凡林（Eleanor Aveling）並列於「聰明的，正直的工人及知識份子」（三七四頁）。

莫爾頓說明九十年代英國工人運動（「新工聯主義」）及二十世紀初的工黨主義時，一般說來尚屬正確，然而，作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史學家所應有的政治尖銳性還嫌不夠。

（蘇聯版）英國史有編輯者沙莫伊洛（Самойло）一長篇序論。序論基本上正確地指導了讀者。然而我們應當說明，沙莫伊洛在指出本書的若干缺點

時，有時錯怪了著者。例如，序論作者當其正確地指出莫爾頓對克林威爾不免理想化時，竟毫無根據地責備莫爾頓，似乎說他以「平民的刑罰加於人民的敵人身上」。而且，沙莫伊洛還斷章取義地引了書中二一四頁一句，說平等主義者「正如雅各賓黨一般，把革命推進得太遠了」（二一四頁）。但是原書的全句是這樣的：「如果我們不能不佩服平等主義者的勇敢及能力，如果我們不能不同情於他們之爲民主共和國而鬥爭，那麼，我們現在能看到他們的作用，正如法國革命時代的雅各賓黨的作用一般，把運動推進到（太遠的）地步，以致他們不能長久將其保持住，但是他們暫時的征服卻保證有主要的前進途徑」。莫爾頓之眞正的沒有歪曲的觀點就是這樣的。這觀點是根據資產階級革命發展的規律性，列寧對於這一點，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應把革命推進到遠超過其直接的、最近的、已完全成熟的、資產階級目標，以便眞正實現這些目標，以便牢牢地鞏固資產階級的最低限度的征服」（列寧全集十五卷四四頁。）

莫爾頓對於「掘土者」的評價，據我們看來是夠正確的，而沙莫伊洛卻提出不必要的疑問。沙莫伊洛要使我們相信，推動資產階級與封建反動妥協的，並不是「掘土者」運動。

關於莫爾頓把殖民史與英國本國史分開一點，似乎指摘得太過些。有關愛爾蘭、北美殖民地、印度，即英國主要殖民地方面的批評，完全是不正確的。把殖民歷史放在一個專章裏，不能證明是「分割」。至於說個別問題應該敘述得更尖銳些，那是另外一回事！在這裏沙莫伊洛卻是對的。不過這是本書的一般缺點，即書中常不免有客觀主義的突然表現。有時，序論作者誇大了莫爾頓的成就（如關於工業革命，莫爾頓並未說出什麼新東西），反之，需要尖銳的原則性的評論處，卻不免厚道與寬大之嫌，例如莫爾頓之說明英國工人運動問題。我們已經指出，序論中忽略了莫爾頓有關英國外交政策的敘述。沙莫伊洛妄用「封建財閥制」（十六頁）一辭來指革命後的英國，也必然要引起反對的。在序論中這麼「隨便」，可能會使讀者迷惑的。

（譯自蘇聯「歷史問題」雜誌，一九五一年三月號）

蘇聯新書介紹

蘇聯刑法

B. Д. 孟沙金　З. A 維什斯柯雅著

孟沙金和維什斯柯雅兩位法學教授合編的「蘇聯刑法」已經出版，該書爲法學專科學校的一本很好的教科書，孟沙金教授研究蘇聯刑法造詣極深，蘇聯司法部全蘇法學研究所極爲重視該書。

該書編制內容如下：蘇聯社會主義刑法立法史；蘇聯法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犯罪論，構成犯罪責任的主體；構成犯罪的基本因素；免除行爲的社會危險性；共犯；刑罰在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目的與任務；刑罰的種類；罪行發展階段；以及人民民主國家的刑事立法等。

庫圖佐夫將將軍反攻

A. П. 希林

這本書是記述蘇聯庫圖佐夫將軍偉大的歷史事蹟的一部傳記，庫圖佐夫將軍是蘇聯十九世紀的偉大軍事家，曾任俄軍總司令，於一八一二年擊敗進犯俄國的拿破崙軍隊，希林同志這本書充分地描寫了當時戰爭的情勢與庫圖佐夫將軍反攻的勝利，是研究軍事歷史、戰略、策略很寶貴的一本書。其主要內容分三部分說明：第一部份是分析俄國軍隊退卻的原因，和庫圖佐夫將軍保守莫斯科前的情形；第二部份述及俄國軍隊在塔羅鎭準備反攻的情況，當時俄國軍隊被拿破崙軍隊重重包圍無法突破，可是庫圖佐夫將軍很沉着地，敏銳地觀察到反攻的時機，而達到全面勝利；第三部份描寫庫圖佐夫將軍反攻時表現的特殊天才。

評「中蘇外交史」

林之樵

曹錫珍編著　世界知識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四月上海初版

「中蘇外交史」是一本缺乏思想性的書，它說明了編著工作中普遍存在着的這樣一個缺點：只有史料的堆砌而沒有理論分析，由此，本書就沒有正確地說明中蘇外交關係的發展。

本書敍述了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一些反蘇外交事實，但沒有指出這些反動派的階級本質，因此就不能表明事實眞相。我們知道反動派的反蘇行爲是在狹隘民族主義掩護下進行的，就是說，它的反動的階級利益被虛僞的民族利益的外衣掩護着。所以，只有撕毀它的虛僞的民族外衣，才能揭露它的反動的階級本質。本書忽視了這個最重要的思想問題，就使它的敍述軟弱無力。例如：在敍述一九二七年中東路糾紛時，作者沒有指出問題的本質，即當時蔣介石匪幫奪取中東路的企圖，是爲了取得帝國主義的寵信，以便强化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權，而蘇聯對中東路問題所取立場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却强調了「軍務處、機務處、商務處、財務處是中東路最主要的機構，也即中東鐵路的靈魂。掌握了這四處，即等於控制了整個中東路。……這些措施，當然違反中蘇兩國共同經營中東路的原則而且侵犯了蘇聯的法定權益。」（四九——五〇頁）人們要問：爲什麼要反對國民黨「控制」中東路呢？只把它解釋爲國民黨匪幫的反動行爲是「侵犯了蘇聯的法定權益」，這顯然是不够的。作者顯然還沒有從外交詞彙的圈子中走出來。只有這樣的說法才是有力的，就是蘇聯是爲了幫助中國人民才保持其在中國的權益的。然而本書並未進行這種說明。

在下面，作者更客觀主義地引述當時蔣介石的態度是：「我華之步驟，爲取中東鐵路於手中，……吾人願先收回中東鐵路，……」（五一頁）這種敍述，倒很像是替蔣介石匪幫的虛僞的民族主義辯護了。

其次，作者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本質和蘇聯國家的階級基礎，也沒有任何說明。外交問題，本質上不是民族問題而是階級問題，蘇聯外交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外交，就是因爲蘇聯的國家的階級基礎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基礎。不說明這點，就不能說明蘇聯三十年來對中國的外交雖然經歷種種變化而始終不變的基本精神——爲了幫助中國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的解放鬥爭。一本「蘇聯外交史」的著作竟然不去分析蘇聯（以及中國各個時期）的外交政策的本質，其思想性當然談不上了。例如：本書敍述了蘇聯熱烈幫助中國抗日的許多事實，這裏就自然發生了一個問題，即：蘇聯爲什麼要幫助中國抗日呢？對於這樣一個顯明的問題，本書竟也沒有回答。如：本書對於列寧、斯大林讚揚、指導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許多文獻，不但一字未引，而且根本不提。決不能說這些偉大的文獻無關於外交問題，而其實是蘇聯對中國外交的根本指導原則。

再如：本書雖會提到蘇聯和平外交政策問題，却未說明它的內容，也沒有把斯大林在聯共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報告中關於這個問題所下的經典定義引述出來。論述蘇聯外交的書籍不涉及到蘇聯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則，這種著作是多麼瑣碎！而且作者實際是把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解釋錯了，他寫道：「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俄外交政策的最高原則」，其目的是「求戰後疲憊的俄國，充分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藉此鞏固蘇維埃政權、調整全國經濟和建立紅軍」（二一頁）。這是很片面的，和斯大林說的蘇聯和平外交政策的四條原則很不相同。四條原則中的第三條，是：「我們援助遭受侵略而爲本國獨立奮鬥的民族」（見前述報告，引自「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政治書籍出版局版七五〇頁）。本書對和平外交的解釋，是忽略了蘇聯外交政策中這一國際主義精神的。接着，本書又寫道：「爲了和平，俄國不惜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在布列斯特——立脫夫斯克城與德國締結了苛刻難堪的『布列斯特和約』……」（二一——三頁）這也是不對的。人們要問：爲了所謂「和平」，竟然不惜割讓大片大片土地嗎？其實布列斯特和約所得到的和平，並不是蘇聯所爭取的眞正的和平。布列斯特和

約，按照「聯共黨史」所說，是爲了「有秩序地實行退却，以便用最大的準備對敵人實行新的進攻」（該書第七章第七節），所以，決不能把這暫時的退却當作和平的目的。蘇聯外交政策所爭取的和平，是和上述相反的，是堅定地反對侵略、保衛國土的和平，如斯大林和平外交四條原則中的第三條所說：「我們不怕侵略者的恫嚇，而決計用雙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試圖侵犯蘇聯疆土安全的戰爭挑撥者的打擊。」（同上引「列寧主義問題」）

再次，本書對於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歷史，也是完全沒有敘述的。論述一個國家的外交活動而不分析這個國家的政治和歷史背景，這種著作實在可稱得是毫無頭腦的著作。正因爲作者忽略了對中國革命歷史的分析，所以就說出了這樣錯誤的話：「一九四五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一九五〇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本質與基本精神，並無不同之處。」（九四頁）什麼是本質與基本精神相同呢？如果是說這兩個條約都表現了蘇聯幫助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精神這一點，那麼，三十年來蘇聯對中國的外交活動從來都具有這種本質和精神，因此這裏的論斷是多餘的。除此以外，這兩個條約的本質與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爲前者是和國民黨反動派政府訂立的條約，是有限度地限制反動派的戰爭陰謀的條約；而後者是和勝利了的革命的人民訂立的條約，是幫助新中國建設並保障遠東和平和世界和平的有力的武器。又如，本書把中蘇外交史分爲三個時期：一，北洋軍閥政府時期（本書稱爲「北京政府時期」，不妥）；二，國民黨政府時期；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這也顯然是缺乏正確的歷史分析而造成的錯誤，因爲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廣東革命政府時期和此後的國民黨反革命政府時期並稱爲國民黨政府時期，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最後，正因爲本書的編著工作完全沒有理論準備，因此就發生了下述許多原則性的錯誤：

1.說北洋軍閥政府時期蘇聯派優林來華，「使當時進步的國會議員、開明大學教授、與青年學生及知識份子等對蘇俄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基本的認識，給日後中蘇兩國友誼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十四頁）這是不對的，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的基礎決不能奠立在所謂「進步」的國會議員和「開明」的大學教授身上。

2.作者敘述「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關於中國長春鐵路和旅順口與大連的協定，不正確地使用着「歸還」、「交還」這種字眼，是很大的政治錯誤。因爲不論是事實上或是一九四五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文字規定上，中長路和旅順、大連的主權，始終是中國的，因此，這裏不能用「歸還」、「交還」這樣錯誤的字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關於這兩個問題的協議的文件原文中，是用着「移交」這樣正確的字眼的。這裏表現了作者政治上的十分粗心、糊塗。

對本書其他史實和文字的錯誤，這裏就不必一一指明了。

（上接48頁）

（註　七）康伯爾（George Campbell，一八二四——一八九二年）：英國在印度的官員，下議院議員，自由黨黨員。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本編輯部

（註　八）馬克思引自A・D・婆爾提考夫底印度通訊（Lettres sur l'Inde），巴黎，一八四八年。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本編輯部

（註　九）扎提(Jats)：印度西北部的一個部落。

——一九三六年蘇聯外國工人出版局英文本編輯部

（註　十）馬克思用下面的話來描述了英國對印度的土地政策底特徵：

「如果有一個民族底歷史顯示着錯誤的和眞正愚蠢的（實際上是醜惡的）經濟實驗，那就是英國人經營印度的歷史。在孟加拉，他們爲不列顛的大土地所有制畫了一幅漫畫；在印度東南部，他們爲小土地所有制畫了一幅漫畫，在西北部，他們又盡力把印度的經濟公社（它對於土地具有共同的所有權）變爲它自身的漫畫」（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四篇，第二十章，註五一）。

由於這種政策，農村公社崩潰了，農業與農民家庭工業的結合也跟着崩潰了，而且在這個意義下土地革命就完成了。

——一九三六年蘇聯外國工人出版局英文本編輯部

（註十一）克萊武勳爵（Robert Clive，一七二五——一七七四年）：東印度征服者之一，孟加拉的英國總督（一七六五——一七六七年）。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本編輯部

學術論文提要

這一欄的增闢，主要是爲了節省讀者的時間。每個提要，只能包括各篇論文的中心思想，以便讀者參考。——編者

「毛澤東選集」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最完全的典型

鄭昌

「毛澤東選集」的出版，是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作者首先指出：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最偉大的代表，「毛澤東選集」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深相結合的最完全的典型。

作者告訴我們：從「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是如何純熟。而政治遠見的天才又是如何貫穿着毛澤東同志全部的革命活動。同時，還可以看到，信任羣衆的力量、創造，和對於勝利的信心，革命的氣魄，革命的樂觀主義，充滿在毛澤東同志的全部著作中。

最後，作者特別提到：毛澤東同志是理論與實踐一致的典型。他的偉大的功績就在於，經過他的工作，把馬克思主義這個萬能的科學應用到中國的具體條件中來，並且給以發展。

（「學習」四卷十二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

王亞南

本文的中心內容，在說明「革命的基本認識，就是階級關係的認識，就是在鬥爭當中區別誰是敵人誰是友人的認識。」而馬克思主義就是最澈底最科學的階級鬥爭的學說。

在鬥爭中，分清了敵友，才能知道對誰該團結，對誰該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現，顯然是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明確辨別了階級敵友關係，並好好團結一切可能的友人，以孤立敵人的結果。我們讀了毛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可以明瞭他是依據什麼來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

最後，作者强調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眞理，由毛主席結合到中國社會階級的具體條件上來，就產生了新民主主義，就創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華」十四卷二十期）

怎樣學習祖國的歷史

尹達

爲什麼要學習祖國的歷史？作者的回答是：主要爲了更有效地推動祖國的社會前進。說得更確切些，爲了當前的革命實踐而鑽研祖國的歷史實際，這正是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學習祖國歷史的目的。

談到學習祖國歷史的立場、態度和方法，作者認爲，惟有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思想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和研究祖國歷史，具體地發現祖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從嚴肅的鬥爭中吸取經驗和教訓。

作者進一步指出，學習祖國歷史，應以現代史和近代史爲重點。而爲了正確地理解現代史，必須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至於古代歷史也是要學習的，不過，對於古代歷史，應該以適當精力和時間，學習一些最主要、最生動的問題。

（「學習」四卷十二期）

孔子思想的進步性及其限度

嵇文甫

作者認爲，孔子的思想，有他一定的進步性，也有他一定的局限性。

孔子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强調「人」的價值，重視做人之道。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人道所當然，人心所不容已。」他雖然講喪禮祭禮，但不是從鬼神迷信出發，而是從人文主義出發。作者認爲他這種人文主義精神，「在後來中國思想史上影響極爲深遠，成爲一種特殊的思想傳統。」

不過，孔子「把禮文、道德，不看做社會的歷史的產物，而看做人心的產物」，因此，他的觀點是唯心論的。同時，在他的思想中，還顯示了一種貴族性，就是他所謂的「人性」，實際上是貴族的階級性。貴族之道，就是做人之道。他「似乎信鬼神，似乎又不信鬼神，既『仁』且『智』」，因此，他又是一個兩面派者。

（「新史學通訊」一卷六期）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對於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

Π·尤 金著

秋江、列兵譯

斯大林所製定的關於語言與生產、語言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及其他社會生活現象的關係的學說，是一部天才的學說。作者指出：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一著作中，是更加具體地說明了他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書中所敍述的那些基本原理。

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斯大林說明了什麼是經濟基礎、什麼是上層建築的問題。同時，也指出了上層建築在消滅舊的、過時的基礎與創立和鞏固新的基礎當中所起的作用。作者告訴一切工作人員「要在歷史、經濟和政治各種問題上正確地確定方向，就必須時刻注意到斯大林同志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的這一方面。」

作者告訴我們：社會科學和理論，是反映社會政治觀點的階級性的科學，所以被包括到上層建築之內。至於自然科學雖不完全是上層建築，但它本身却包含著若干上層建築的現象，並和上層建築聯系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都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

斯大林的這一著作，向科學工作幹部、思想戰綫上的工作者提出了一個新的任務，這任務就是「責成他們要根據蘇聯共產主義建設實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總結，來研究新的理論問題。」

（「學習譯叢」第五輯）

論中國自然科學的歷史命運

華　崗

本文分爲四個部份：第一部份，中國自然科學的歷史命運；第二部份，發展自然科學的歷史條件；第三部份，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關聯性和統一性；第四部份，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特殊性和規律性。

在第一部份中，作者指出十九世紀中國提倡科學的一般情況後，將中國科學史上三種錯誤的思潮「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科工救國論」「全盤西化論」澈底予以批判。

在第二部份中，作者根據世界科學發展史與中國近代科學運動的經驗，認爲必須具備下列三個歷史條件，自然科學才能發展，才能提高社會生產力：一、自然科學必須與進步的社會相結合，爲進步的利益服務，必須充分發揮自身的革命作用。二、必須和廣大人民羣衆相結合，使科學成爲人民羣衆所有。三、自然科學工作者必須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方法。

在第三部份中，作者指出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辯證的統一，認爲這二門科學必須建立起「合理關係，以便互相推動前進」。

第四部份中，作者認爲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有其關聯性與統一性，但社會和自然仍有本質的差別，二者發展規律也就有本質的不同，因此認爲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機械地搬用自然科學的規律，必須採用特殊的方法。

（「山東大學學報」一卷一期）

論科學的特點

康士坦丁諾夫著

龔　育　之譯

本文原題爲「歷史唯物主義發展中的卓越貢獻」，作者所指出的科學的特點，包括着下列幾點。

一、科學，作爲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本身中包含有關於自然與社會的可靠的、爲人類的實踐所檢查和證明而同時又服務於這一實踐的知識體系。

二、科學的發展首先爲生產、生產方式和整個社會制度的發展所決定。

三、科學在階級社會裏是統治階級手中的武器。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制度，才使科學爲勞動人民、爲全社會服務。

四、科學是各種傾向的鬥爭場所。它要從被發現的規律中得出一般的理論的結論。

五、馬克思主義，作爲眞正科學的意識形態，是工人階級爲推翻資本主義與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武器。

六、科學與宗教之類的社會意識形態，是對立的。

（「科學通報」二卷九期）

無神論

中•奧列楚克著
韓靈銳譯

無神論是怎樣出現和發展的呢？作者說，它是與階級鬥爭的發展、與關於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科學知識的發展密切聯系着的。可是澈底的、科學的無神論，是在無產階級發展起來，辯證唯物論產生以後才有的。

無神論在古希臘哲學中，曾獲得了極大發展。在整個中世紀，因爲天主教教會把持着一切，以致科學和哲學都變成了神學的奴僕。但那時反對教會的羣衆運動，也曾廣泛地展開。其後，如荷蘭的斯賓諾沙、英國的培根、霍布士等，都大大促進了無神論的思想發展。特別是在法國準備和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無神論獲得了最大的發展。

作者特別指出：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中，提出了眞正科學的戰鬥無神論的理論。而列寧、斯大林把這一理論更向前發展，使它更豐富了。

反對宗教的鬥爭，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戰鬥的黨性的重要原則之一。因此，作者認爲：「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增長是與無神論的發展不可分割地聯系着的。」

（「學習譯叢」第五輯）

新中國貨幣制度之史的發展

陳元爕

新中國的貨幣是眞正爲人民服務而作爲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的有力槓桿。它的形成是經過極艱難困苦的鬥爭過程的。作者認爲這個過程可以分爲下列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時期，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第一次發行人民自己的貨幣。接着湘、鄂、贛、閩、浙等省農工銀行或蘇維埃銀行分別發行了各種不同的紙幣。川陝省造幣廠鑄造銀幣和銅幣。

第二階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首先是陝甘寧邊區銀行在陝甘一帶解放地區發行的陝甘寧邊幣，接着各國解放地區也分別發行各種人民貨幣。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區貨幣共有東北幣、關東幣、長城幣、晉察冀邊幣、冀南幣、西北農民幣、陝甘寧邊幣、中州幣、北海幣、華中幣等十種。當時的特色是統一目標和多元發行，以利於對敵人的經濟鬥爭。

第三階段（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發行貨幣，收兌地方性的貨幣。除了關東幣和東北其他地區的貨幣以外，所有解放區的貨幣都已得到了統一。

第四階段（一九五〇年以後），東北人民政府規定以東北幣收兌關東幣。一九五一年四月，政務院命令責成中國人民銀行以人民幣收兌東北幣及內蒙地方流動券；十月，政務院又決定責成中國人民銀行發行帶維吾爾文的人民幣，兌回新疆省銀行所發行的銀元票。至此，全國幣制已告統一。

（「經濟周報」十三卷十五期）

勞資兩利與階級鬥爭

施復亮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舊中國的勞資關係，基本上是資本主義性的，同時也帶有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有矛盾；又與工人、農民階級有矛盾。因此，他們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軟弱的一面。而中國工人階級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則是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

接着，作者指出：新中國的勞資關係，情形就不同了。因爲在私營企業中，既有剝削存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就要有鬥爭。新民主主義的勞資關係，是民主的、平等的、兩利的、契約的關係。而且有種種方式可以保證這種勞資關係的澈底實現。

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的「勞資兩利」政策和西歐社會改良主義者主張的「勞資合作」政策並不相同。我們實行「勞資兩利」政策的目的，是在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下，發揮私人資本的積極性，以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從而保證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勞資兩利，和勞資間的階級鬥爭，是不是有矛盾呢？作者的答覆是否定的。他說：「我們提倡勞資團結，但不是不要鬥爭，因爲有勞資兩個階級存在，它們之間的鬥爭就不可避免。」

（「經濟周報」十三卷十四期）

蘇聯文學中的愛國主義

彭慧

作者首先提到：今天的蘇聯文學作品，可說沒有一篇不是表現愛國主義精神的。這愛國主義精神，是俄國文學上一脈相傳的優良傳統。

今天蘇聯文學上的愛國主義，雖然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上的繼承，但它和十九世紀的愛國主義精神，並不完全一樣。作者說，「因爲有兩個俄羅斯

的原故」，所以「不僅是在階級立場上有區別，就在情感上和主題的寬度上也差異。」

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們的愛國主義是受統治階級壓制的，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今天的情形已經完全兩樣了。作家們的愛國主義的熱情，可以得到充分的表現，而且是和國際主義精神相結合的。蘇聯文學作品不但歌頌着蘇維埃社會的幸福自由，還贊美着蘇維埃領袖的偉大，並向帝國主義者顯示着自己的光榮和驕傲。

（北京師大「文藝集刊」第一冊）

中國歌謠中所表現的醒覺意識

鍾敬文

作者在本文中，搜集了從秦朝時候起，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各地流行的民歌約四十多首，來說明我國廣大人民在民歌中所表現的醒覺意識。

首先，是對封建君主統治、帝國主義壓迫的咒詛、仇恨和反抗。其次，是對國家的大員、軍隊，特別是對那些剝削、欺侮人民的地主、豪富，充滿了怨憤。另一方面，對農民起義的領袖，是贊美的。

在民歌中，有一部分是描述佃農牛馬般的生活情況的，也有一部分是受封建的家庭制度、倫理觀念的束縛和損害而提出控告的。

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期間，廣大人民更創造出無數辛辣的、銳利的政治民謠。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歌聲，也隨處可以聽到。

至於在革命的民歌中，最普遍的主題，是對人民領袖毛主席的歌頌。其次，就是表現廣大人民對勞動態度、對國家、對人民政府的觀念和態度大大的改變。和對新的人物、制度、生活的歌頌。作者說：「這是中國民間歌謠最近時期的一個主要特點。它表現中國廣大人民的醒覺意識，已經達到從來未有的高度了。」（北京師大「文藝集刊」第一冊）

論「阿Q正傳」

馮雪峯

在論述「阿Q正傳」的思想特點與藝術特點之前，作者介紹了魯迅的創作方法，創作小說的態度以及魯迅給予小說的任務。

阿Q這形象，是中國流浪佃農的典型化與性格化，但其主要特徵也是不管那一個階級的阿Q主義者的典型化與性格化。阿Q這個人與阿Q主義二者是統一的，可是又是有區別的。在分析二者關係之前，作者介紹了魯迅思想：魯迅揭發了「阿Q主義」這種「國民劣根性」如此普遍的社會根源，也分析了它的歷史根源，認爲這是一個民族在長期封建統治下與歷次外來侵略下的結果；更是人民歷次革命與反抗遭受失敗的結果。作者進一步分析了魯迅這種揭發與分析的重要意義、作用及其用心。

最後，作者更分析了魯迅爲什麼不採取其他的人來寄植與概括阿Q主義，而獨獨採取阿Q的基本原因。

（「人民文學」四卷六期）

我對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認識

董純才

作者看來，陶先生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有他的進步的一面，同時也有錯誤的一面。在政治上，陶行知是革命派，但最初原是改良主義者。

陶行知的教育學說，完全是導源於杜威的實用主義，作者說他「是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東西。」而所謂「生活教育」對理論學習、系統知識都是忽視的。

有不少的人，認爲陶行知在政治上是屬於革命派，因而認爲他的教育思想也是革命的。同時，把他的教學做合一的口號當成理論與實際一致的原則。這兩種觀念都是錯誤的，也是最容易使人混淆不清的。

作者認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有錯誤的，但也應指出他主張聯系實際生活，聯系社會，接近工農羣衆。這對反對傳統教育、教條主義，是起過一定作用的。同時，在他所領導的教育活動掩護下，也進行了一些革命活動。這是不應該加以抹煞的。

（「人民教育」三卷六期）

美術工作與提高技術問題

江豐

在今天，美術工作者應將提高技術當作重要的任務來完成。但在提高技術的要求下，有不少美術工作者又產生了純技術觀點的不良傾向。

首先，作者介紹了片面強調技術的作用的傾向，由於這種不良傾向，因而產生了誇大技術學習困難以抬高技術身價等惡果，因此作者提出「學習技術應以如何表現人民生活爲前提」。

接着，介紹了關門提高，埋頭搞大作品與不重視學習自己民族美術的優良傳統等傾向。作者認爲應在普及的基礎上練油畫，搞大作品，認爲西洋的「明暗畫法」應從民族的「單線平塗」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因而提出學技術應從羣衆的需要和愛好出發。

最後，作者提出加强批評和自我批評工作，以克服上述各種技術學習的不良傾向。

（「文藝報」四卷十一、十二期）

國外期刊重要學術論文介紹

本欄介紹的國外期刊，祇能限於最近收到的各期。由於篇幅的限制，對於各期的重要學術論文，祇能作簡要的介紹。

——編者

蘇聯·「科學院院報歷史與哲學叢刊」

一九五一年　第四期

「蘇聯科學院院報歷史與哲學叢刊」在最近出版的八卷四期上，以社論地位刊載了通訊院士П·Н·波斯彼洛夫在六月二十九日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會議常會上紀念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文發表一週年而做的報告。題目是「斯大林的經典性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是對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卓越的新貢獻」。本文對斯大林的著作做了崇高的評價，認爲是馬克思主義創造性發展卓越的典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寶庫的高貴的新貢獻，它對社會科學發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它給一切蘇維埃科學思想和全部先進科學開闢了廣濶的道路。

作者强調斯大林的這一指示：如果沒有意見的爭執、沒有批評的自由、不以新的公式和結論代替陳腐的公式和結論，科學是不能發展、不能欣欣向榮的。從人類社會進一步革命的發展遠景來看，從實現黨的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來看，語言學這一科學具有極重要的意義，而斯大林對這一科學部門完成了根本的大變革。本文深入分析了斯大林對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指示，對馬爾錯誤的批判後，着重指出斯大林給馬克思主義所下的定義，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爲一種科學的經典性的定義。作者引證了斯大林的定義「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被壓迫與被剝削羣衆革命的科學，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內取得勝利的科學，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並且認爲這是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百年來的歷史經驗。本文在結尾中談到在蘇聯社會科學的發展上，在科學和教學工作上，已遵循斯大林的指示，本年內大大推進了一步，並且獲得了種種成就。斯大林的著作對於庸俗化和簡單化馬克思主義的企圖，對於教條主義，都給予了毁滅性的打擊。

蘇聯·「哲學問題」雜誌

一九五一年　第三期

在這一期上，作者列漢以「斯大林同志關於現代國際法問題上的著作」爲題，叙述斯大林去年六月間發表語言學問題以後，對國際法來說，有着巨大的意義。斯大林學說照亮了蘇聯人民革命鬥爭的道路。蘇聯人民是酷愛和平的，並有足够的信心與力量制止帝國主義戰爭販子們的挑撥，蘇聯還要聯合一切愛好和平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共同爲爭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奮鬥。斯大林同志是天才的政治家，對國際情勢與國際事件有科學的預見和分析能力，他創設了社會主義國家國際法的規範，這規範就是促進維持世界和平民主和國際間的友好合作。斯大林學說是保證蘇聯外交上的勝利，也是蘇聯國際法的思想根據。

作者進一步說明：國際法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在斯大林「語言學問題」的文獻中，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學說有詳盡的分析，斯大林教導我們：每一個經濟基礎，都有適合於它的上層建築，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爲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每一個社會經濟基礎有它相適合的法律，而法律是特定統治階級的有力的統治武器。最後作者指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國際關係問題是派生於某一國家的國內法的，（政治、法律、經濟部門）現在帝國主義的基礎與上層建築就決定了它的國際關係，我們必須揭露其本質，把它宣告於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面前，並予以嚴厲的駁斥。

另外，本期發表了蘇聯科學院院士A·亞歷山大羅夫所著「關於邏輯」一文，作者集中了蘇聯討論邏輯基本問題的意見，加以整理綜合的叙述，該文分爲四部分說明邏輯的基本概念：第一部分說明什麼是邏輯，第二部分說明邏輯的幾個觀點，第三部分說明形式邏輯；第四部分說明幾個重要的邏輯問題。

本文首先說明邏輯是正確反映現實的思惟的科學，它並不是資產階級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列寧曾指出：邏輯是一種研究認識的學問，是認識自然和人類的反映。邏輯是人類思惟對於自然現象的不可缺少的辯證規律。列寧又曾說過：我們要區別辯證邏輯和形式邏輯，它們兩者是不能混同的。

其次，作者說到形式邏輯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其固定不變的

反映被限制和從屬於辯證法的邏輯。關於邏輯研究的對象與範圍問題，以及關於邏輯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關係問題，至今仍在熱烈地展開討論，但是大部份學者一致認爲思惟邏輯可以一視同仁地替各個階級服務，是沒有階級性的。

蘇聯·「經濟問題」雜誌

一九五一年　第八期

本期（八月號）發表了H·馬斯洛娃的「蘇聯工業在戰後斯大林五年計劃各年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一文，它總結了蘇聯工業在戰後時期中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情況，和戰前時期做了鮮明的對比，並且也着重指出了蘇聯勞動生產率所以飛躍增長的原因。作者說，戰後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又一次證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大大地優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坦途上，在全國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全國經濟威力的不斷鞏固中，已經完成了一個新的光榮的階段。正如在戰前一樣，社會主義工業的主導作用，在戰後時期中也決定了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發展。一九四六至一九五〇年中恢復、建立和開工的工廠達六千餘座。一九五〇年蘇聯全部工業生產額，依照計劃規定，應該比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八，而事實上卻超過了百分之七十三。工業產額的增長速度，也遠比戰前時期要高得多。大家知道，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工業生產額增加了百分之一七·一，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三年中，平均每年增加了百分之一三。而在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每年生產總額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强。社會主義工業擴大再生產的高速度，是社會主義制度下計劃經濟的進步性的指標。

戰後時期也正如戰前歷屆斯大林五年計劃的時期一樣，工業產量的增加，主要地是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越高，工業產額的增加也越多。在戰後五年計劃第一年中，一切工業還剛剛恢復到平時的樣式，由於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使工業產額增加的現象，僅在個別的部門中可以看到；大多數部門工業產額的增加，是勞動者人數增多的結果。戰後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在蘇維埃經濟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上，是個轉捩年。一九四七年大多數工業部門都完成了計劃上所規定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任務。一九四八年工業上的勞動生產率超過戰前水平，到一九五〇年竟超過百分之三七（計劃規定爲百分之三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熟練工人的增加，生產技術設備，特別是勞動協作的性質，也大大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裏勞動生產提高的因素，基本上不同於資本主義制度，因爲這些因素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種種優點所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完全適應，是勞動生產率强烈發展的新的和主要的源泉。在蘇聯能夠自覺地、有計劃地運用勞動生產率增長的一切因素。這些因素能夠最充份地發揮作用，因爲蘇聯已經沒有剝削階級，而社會主義社會一切工作人員都關心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蘇聯·「計劃經濟」雜誌

一九五一年　第四期

列寧曾指出只有當社會主義完全鞏固時，才能進到更高級的社會。所以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要求的，並不是創造另外一種生產方式，而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全部基礎的鞏固和發展。「計劃經濟」第四期（七、八月號）發表了R·儒科夫斯基和E·盧斯薩科夫斯基合著的一文，即是闡明列寧的這一指示。題目是「偉大的斯大林建設及共在創造共產主義物質生產基礎中的作用」。作者說，創造共產主義社會物質生產基礎的問題，是列寧斯大林關於蘇聯建成共產主義制度學說的組成部分。列寧曾經分析了作爲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生產基礎的大工業的意義。他在一九二一年時就寫道：「因爲大規模機器工業也能改組農業，所以它才可以成爲社會主義制度唯一的物質基礎。但是決不能限於這一普遍的原理。必須把它具體化。適應着最新技術水平並能改組農業的大工業，即是全國電氣化」（「列寧全集」，三二卷四三四頁）。列寧的這個原理，爲斯大林具體化並進一步加以發展。「列寧所瞭解的全國電氣化，不是孤立的建成各個電站，而是『全國經濟，也包括農業在內，逐漸過渡到新的技術基礎，過渡到近代大生產的技術基礎』，而近代大生產就是這樣或那樣、直接或間接和電氣化事業相聯繫的」（「斯大林全集」，十一卷二五四頁）。第一次戰後五年計劃的完成，是實現斯大林創造物質生產基礎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宏偉計劃的一大步驟。本文詳細叙述了斯大林建設計劃的種種成就，並且指明出來：這些偉大的計劃，只有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才能實現，因爲這裏消滅了生產手段所有制、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民公共的需要和個人需要。這些建設之所以能够實現，乃是由於全體人民的參加，而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即是鼓舞和組織的力量。

在偉大的斯大林建設中，出現了建設工程的新的具有高度生產率的技術設備，這些技術設備是蘇聯強大社會主義機械製造業，在極短的時期內創造出來的。在五六年內要實現負有改造大自然和農業之使命的偉大水電技術設備的計劃中，顯示了斯大林時代壯麗無比的特徵——巨大的規模和高度的速率、偉大改造計劃的深刻的科學根據和蘇聯人民創造性的活動。全世界的人民歡迎着蘇聯人民偉大的創舉，把這一創舉看成是蘇聯澈底和平政策最重要的行動。這個偉大的斯大林計劃，使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滿懷信心地向着共產主義前進。

蘇聯・「國家與法律」雜誌

一九五一年　第八期

本期重要論著有哲學博士費・費・尼柯拉葉夫的「論蘇維埃國家發展的主要階段」。

作者指出：斯大林總結了過去蘇維埃國家發展的行程，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態，階級構成與國際形勢，把這個行程分爲兩大階段，即：(一)從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到消滅剝削階級時止；(二)從消滅城鄉資本主義因素時起到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完全勝利與通過了斯大林憲法時止。

第一階段的基本任務在於鎭壓剝削階級的反抗；組織國防力量，抵禦外國侵略；恢復工農業生產，爲消滅資本主義因素準備條件。

第二階段的基本任務是在全國範圍內，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消滅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後殘餘，推進文化革命；建立現代化的強大國防武裝部隊。

在每一階段，又可分爲若干時期。各個時期又都依據其基本任務，提出了並解決了一些具體的任務。

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轉變，體現於富農之被消滅。富農是當時存在於蘇聯的最後的嚴重的資本主義因素。作者根據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指出：這是一個革命，但它不是以突變的方式來完成的，而是通過舊質因素逐漸消亡與新質因素逐漸積累而完成的。所以，在第一、第二兩個階段之間，並沒有截然的界限。如把消滅富農片面地歸入第一階段，這種分期法是謬誤的。

本期還發表了法學候補博士依・格・蘇達李可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機關之建立與鞏固」。作者首先分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反動的國家機器，他從國家機器的性質及其活動中說明蔣匪政權的反人民的性質。因此，中國人民必須把它打碎，重新建立自己的新的國家機器。其次，作者把兩年多來中國人民政權機關的建立與鞏固過程，作了詳盡的敍述與科學的分析。

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

一九五一年　第十六、十七期

第十六期所載的重要論文，爲格・格列塞爾曼的「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時期之基礎與上層建築」。作者指出：從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推移時，如果具備下列條件，其轉變將是逐漸的：

(一)經濟基礎不是敵對性的，社會沒有分裂爲敵對的階級；

(二)上層建築促進着、而不是妨礙着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發展。而且，這種轉變是由政權機關自上面發動，同時獲得羣衆自下面支持；或者由勞動羣衆自下面發動，同時獲得政權機關自上面支持。

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就正具有這種性質，因而，從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轉變，將採取穩步的逐漸的方式。

在第十七期上，發表了尼古萊和謝爾巴科夫合撰的長篇論文，作者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就」爲題，闡述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對於亞洲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作者特別提到，中蘇兩國人民兄弟般的友誼正在一天天地擴大和鞏固，中蘇兩國的友好同盟，主要是爲爭取和平而共同鬥爭。最後，作者詳盡地介紹了新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成就，說：「蘇聯人民熱烈預祝中國人民在建設偉大、繁榮的人民國家事業中，在保衞世界和平的鬥爭中獲得進一步的成就。」

「羅馬尼亞評論」雜誌

一九五一年　八月號

本期的社論，題爲「從五年計劃看文化敎育的前景」。該文首先指出：愚民政策是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所必需的。而勞動階級和他們的黨爲着人民民主國家的生存，把羣衆從愚昧的深淵中拯救出來，發展科學和文化，這却是與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分不開來的。

該文繼續指出：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是不能與文化改革分割開來的，因爲：「它需要不斷提高羣衆的政治和思想水平，需要訓練新的知識份子，敎育和訓練千百萬的幹部；這樣他們在科學和技術方

面，才能够勝任國家事務，才能够創造新的工作方法和應用現代技術。」

文中列舉了改革文化教育的方式和具體內容：如推廣夜校和函授學校，幫助工人階級增進他們的技術知識，並且把他們提昇爲新知識階級；或者利用文化宮和閱覽室，把文化普及到四鄉去。

該文結論說：「文化改革的巨大發展，將更有力地武裝了我們的人民來爲和平事業而鬥爭。」

在同一期上，還有一篇史迪芬教授的「我們國家歷史科學的成就」，這是關於考古學展覽會的介紹文章。

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羅馬尼亞曾進行過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它在羅馬尼亞考古研究工作上，具有決定意義的貢獻，這也就是羅馬尼亞文化改革工作中的重要項目之一。在一九五〇年，羅馬尼亞所進行的考古發掘工作，費時五個月，獲到了重大的科學成果。從整個工作過程和成果的處理上看來，作者得到一個結論：「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考古學家們，不再與羣衆隔離而生活和工作了。」

在人民民主制度建立之前，羅馬尼亞的考古學充滿了世界主義的氣氛，並且是採用了資產階級考古學者的那一套唯心論的反科學的方法，他們不把研究的對象視爲人類勞動的成果。資產階級的考古學家們是個別地工作着的；他們工作的目的是基於趣味，他們祇是探求奇異的事物或詳述君王的生平軼事。作者特別指出：「資產階級考古學的觀念和方法是反動的，現在是替帝國主義服務的。」

作者認爲：蘇聯的考古學是基於完全相反的觀念和方法來進行研究工作的，因此，蘇聯的考古學家及其所應用的研究方法，就是羅馬尼亞的考古學家們應該效法的。作者着重地說：「作爲歷史科學的一個部門，我們的考古學必須充滿愛國主義的精神；它的目的，是要在這個國家中，重建眞實的社會發展的歷史。這樣，考古學就能符合於勞動人民的利益，而不像帝國主義國家那樣，只爲少數資本家服務。」

印度·「團結」雜誌

一九五一年　八月號

本期載有奧茲洛夫的「論現代蘇維埃藝術」一文。這篇文章是作者在參觀莫斯科一九五〇年蘇聯藝術展覽會以後，對於蘇維埃藝術的論述。

作者認爲：這次藝術展覽首先證明了蘇維埃藝術家在藝術技巧上是不斷提高的。同時，在作品的數量和藝術家的人數上，也有驚人的發展。特別是，絕大多數的作品都是出於新起的藝術家之手，初次拿來供人鑑賞，更是這次展覽的一個特色。

接着，作者論述了蘇維埃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藝術的輝煌成就。作者特別指出蘇維埃藝術的高度思想性。認爲展覽會中每一件作品，都具有高度的民族形式和深刻的社會主義內容。每一件藝術品都生動地反映着生活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人民的自由的勞動、創造性的努力和幸福的生活。每一幅畫都正確地描繪出蘇聯勞動者爲共產主義而鬥爭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和斯大林式的民族友愛精神。

最後提到人物肖像，作者說：作品中每一幅畫像，每一座彫塑，都刻劃出人們在蘇維埃制度下陶冶出來的新性格。

美國·「羣衆與主流」雜誌

一九五一年　八月號

本期發表了羅伯遜的一篇文章，題爲「團結一致，爭取和平」。

該文首先指出，美國人民對於聯合國蘇聯代表馬立克關於朝鮮停戰的提議，也跟全世界其他各國人民一樣，是熱烈擁護的。

作者深信，經濟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之間是能够求得協議的。所以，他主張發揮偉大的羣衆力量，來破除種種障礙，爲爭取和平而堅決奮鬥。

該文同時指出：美國人民目前的中心任務，就是配合歐亞各國人民，掀起代表全國各階層的强有力的和平運動，把爭取朝鮮停戰的鬥爭發展到爭取全人類持久和平與自由的鬥爭。

最後，作者特別强調：無論從那方面說，無論我們社會的背景如何，今天我們在這裏，不分有色人和白人，不分工農、自由職業者和實業家，也不分青年和男女，大家在爭取持久和平的神聖事業上是團結一致的。

在同一期上，還發表了愛倫堡的「論作家與生活」、S·芬克爾斯坦恩的「藝術之精神分析」等重要論著。

美國·「科學與社會」雜誌

一九五一年　春季號

本期登載了M·多布的「論蘇聯戰後建設」一文，立論警闢。我們知道：英美報刊和所謂「專家」的評論，對於蘇聯戰後的和平建設，都極力加

以誹謗和歪曲。本文就是作者爲揭穿這種無恥的謊言而作的。

作者寫道：蘇聯戰後五年計劃是在極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其中所遭遇的最大困難就是一九四六年的旱災。這次旱災的嚴重是近五十年來所罕見的。糧食因災荒而奇缺，也使工業建設陷於莫大的困難。軍需工廠雖多已轉爲平時生產，可是某些主要消費品工業的產量，還達不到戰前產量的半數。

到一九四七年已見好轉。每俄畝糧食產量已恢復到戰前水平。該年內所採取的重大措施，爲加速恢復消費品工業。因爲對於這種工業的重視，消費品產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僅以收音機和家庭用具爲例，就已達到戰前的生產水平。該年年底除了廢止配給制，同時還實行了貨幣改革。接着就是減低物價。截至目前爲止，物價已先後減低四次。平均每次約減低百分之二十。

到一九四九年年底，由於前兩次的減低物價，工資的實際價值已較戰前提高百分之二十四，農民的實際收入已提高約百分之三十。

隨着工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更飛躍上昇，生產方法也大有改進。作者引某一個汽車工廠作例，說該廠經重新裝置以後，汽車生產可以整日不停，一直繼續下去。

談到一九四九年幾種主要產品的產量，如煤、生鐵、鋼、糧食等，作者均舉出實際數字來說明其驚人的提高。使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每種產品的產量都大大超過了戰前的水平。

就農業方面所得到的拖拉機、運貨汽車和農業機器三項而論，一九四九年已比戰前增高三到四倍。此外，供給農業的礦物肥料，也增高了百分之三十三。

最後，作者特別指出關於建設水電站、灌溉系統和防護林等偉大計劃。單就防護林的建設而論，一九四九年一年中，由國家栽植起來的防護林已長達三千七百餘平方公里。至於各農場準備在週圍自行栽植的小防護林，如全部完成，其所佔的總面積約大於比利時領土的兩倍。

但是，按照作者所說，以上這些計劃的實施，只不過是「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的一個勝利的開端。

在同一期上發表的主要論著，有V•沙萊克曼的「商業與薪水階級」、S•伯恩伯恩的「美國勞動與巴黎公社」等文。

英國•「勞動月刊」

一九五一年　八月號

本期發表克里格的「我所看到的新中國」一文。作者首先提出一個問題：「人民中國有多强」？他隨即指出：在美國患戰爭病狂的人和他們在各國的走狗把中國說成是貧弱和分裂的，說中國因派遣赴朝志願軍而精疲力竭了，因受美國的禁運而經濟崩潰了。對於這種誣衊，他嚴予駁斥，說「這是麥克阿瑟要發動侵略中國戰爭的無恥宣傳」。

作者今年曾在中國逗留一個多月，他遊歷了各省，他得到的印象是怎樣呢？他告訴我們：他所參觀過的工廠，不論是公營的或私營的，生產量都超過國民黨統治時期或日僞時期。他還舉出了工人們對工作的熱情和創造性的範例。他說就紡織業方面的原料而論，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代大部份要依靠進口的棉花，現在已可以自給自足了。他說到淮河的偉大工程，又說到上海人民怎樣戰勝了美國的經濟封鎖。

作者認爲在中國的反革命活動是美帝國主義在背後支持和策動的。可是，這一年來，中國人民已經基本上把反革命力量鎮壓下去了。他特別指出：由於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的結果，「廣大的中國人民得到了政治覺悟」。

最後，作者說到中國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他參觀了人民大學和工人文化宮，他見到了農民們的互助小組，他欣賞了工人們的繪畫，他也見到年青的礦工們和老礦工的女兒們在音樂堂裏跳舞。他說新中國到處洋溢着愉快、熱情，兒童們露出期望的臉。他下結論說：「中國人民確實已經站起來了，並且知道怎樣生活了。」

在同一期上，還載有杜德的每月時事述評、H•潑西爾的「前進中的工會」、D•N•普立特的「巴基斯坦審判」和J•高蘭的「佛蘭克福『國際』」等文。

訂　正

本刊五卷一期二十七頁上欄八行及下欄註（三十二）「曹靖華」均應爲「黃源」。同頁下欄十七行「一萬二一種」應爲「一百二十種」。註（三十六）應爲「集外集拾遺」二百六十三頁。二十八頁二十行「藝術節」應爲「藝術裝飾」。二十九頁上欄二十五行「那個例」應爲「兩個例子」。同頁上欄二十九行，「則刊物來後，比要日少不了多少」應爲「則刊物出來後，比要日少了不少」。同頁下欄四行「烏烏叢書」應爲「烏合叢書」。三十頁上欄十八行「在北京及」應爲「在北京辦」。

新學術小叢書

中國新文學史研究

李何林等著　定價六千六百元

本書首載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所共同草擬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接着，就中國新文學發展的階段，分為下列各篇：1、五四時代新文學所受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2、一九二三年『中國青年』幾個作者的文學主張，3、左聯成立前後十年的新文學，4、中國文藝第一次和兵農的結合，5、由『七七』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新文學。由李何林、張畢來、丁易分別執筆。書末並附有郭沫若、茅盾、周揚在文代大會對近十年文藝運動情況的總結報告。本書是學習中國新文學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關於人民民主建政

本社編　定價四千元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權最好的、基本的組織形式。必須大家正確地認識和掌握了這種制度，才能完成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設工作。本書內容包括有關人民民主建政的重要論著、文件和法令，是學習人民民主政制的重要參考資料。

美帝國主義的政治與經濟

張志讓　陳翰笙　沈志遠等著

定價三千二百元

學習「實踐論」第一輯　定價三千二百元

學習「實踐論」第二輯　定價四千元

本書第一輯包括：毛主席的『實踐論』全文，李達、王學文、郭大力、王亞南、馮友蘭等學習『實踐論』的心得，和對『實踐論』內容的發揮。書末並附有『實踐論』學習提綱。第二輯包括李達、謝覺哉、潘梓年、何思敬、華崗、王思華和北大哲學系等所寫的關於學習『實踐論』的方法、學習『實踐論』如何與具體工作相結合以及運用『實踐論』批判舊哲學等。是學習『實踐論』必備的參考書。

學術譯叢　第一輯　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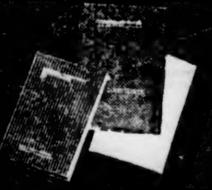
斯大林對歷史唯物論的發展	蘇・卡　加　林作 沈　志　遠譯
辯證唯物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武器	楊　興　順作 李　何譯
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戰爭和軍隊的理論	蘇・赫魯斯多夫作 曹　汀譯
列寧對資產階級經濟科學的揭露	蘇・魯賓斯坦作 郭　從　周譯
凱恩斯學說是反動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蘇・郭契可夫作 徐　毓　枬譯

定十一月十日出版　　每册定價六千元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二一九號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徵求一九五二年蘇联期刊定户



自十月十五日起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爲掌握發行情况，滿足讀者需要，特決定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起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徵求一九五二年蘇聯期刊定戶。凡需要蘇聯期刊的各機關、團體、工廠、學校及讀者，均請在此期間預定，以便按時代爲定發，否則因限於定數及國外定閱費時，難以保證供應，滿足需要。諸祈諒詧！

印有一九五二年蘇聯期刊目錄，函索即寄。

國際書店

總店：北京蘇州胡同三十八號

各地分店門市部

北京門市部：王府井大街	漢口分店：交通路	瀋陽分店：馬路灣
天津門市部：興安路	重慶分店：鄒容路	哈爾濱門市部：尙志大街
上海分店：福州路	廣州分店：惠愛東路	大連門市部：天津街

代定處：各地新華書店外文部

新建設 月刊

第五卷 第二期

負責人 費青

編輯委員（以姓名筆畫爲序）

千家駒 向達 *沈志遠
*吳晗 狄超白 李廣田
金岳霖 范文瀾 胡繩
袁翰青 孫曉邨 *陶大鏞
*費青 費孝通 *張志讓
*傅彬然 聞家駟 雷潔瓊
樊弘 *鄭昕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儲安平
鍾潛九 *謝覺哉 嚴景耀

（有*者，爲常務編輯委員）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定價每冊四千元

訂閱：

三個月三期 一萬二千元
半年六期 二萬四千元
全年十二期 四萬八千元

平寄郵費免收 掛號郵費另加